

# 总 论

## 建国以来大学德育的发展历程

在学校教育中，德育历来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里，大学德育总是居于主导地位。今天，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 21 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因此，认真研究大学德育的发展历程，科学地总结大学德育的历史经验，探讨德育的基本规律，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建国以来，我国大学德育在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后来实践证明却是错误的；有当时被批判为错误的东西，后来又证明是正确的。如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轨迹一样，大学德育也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曲折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 一、奠定基础时期的大学德育

从共和国成立到 1956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7 年时间，我国高等教育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这一时期，大学德育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承担着改造旧教育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肩负着创建新教育的任务。党和政府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的优良传统，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方针和大学德育的主要任务及其在高等学校的重要地位，逐步建立了实施大学德育的机构和制度，形成了以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为主体，密切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和各项社会运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使大学德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德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大学德育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 （一）确立建国初期大学德育的基本任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新中国的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sup>①</sup>。根据这一规定，教育部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新中国的教育目的和任务，强调教育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中央于1949年10月和1950年2月召开的常委会和第一次全国学校工作会议上，一致认为，“共同纲领所明白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同时也是现在学校中思想教育所应遵循的准绳”，明确指出，“学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而“坚持地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是现在学校中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的主要关键<sup>②</sup>。可见，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就对学校的德育工作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要求，确立了建国初期大学德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大学德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教育，主要锋芒直接指向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对于转变青年学生的立场和观点，坚定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培养新中国所需要的专门人才起了重大的作用。

### （二）清除国民党反动的政治教育，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

1950年7月，根据政务院（后来改称“国务院”）批准的《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各高等学校先后废除了国民党的反动训导制度和旨在限制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入学保证书”制度，取消了“国民党党义”和“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取缔了一切反动党团组织，开始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最早开设理论课的是华北地区大专院校的文、法学院。他们根据1949年10月12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把《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三门课列为公共必修课。同年1月，教育部在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强调在高等学校开设政治理论课的重大意义，从而确立了政治课在大学德育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广泛开设，对于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起了极大的作用。

为了总结一年来高等学校开设政治理论课的经验教训，教育部于1950年7月24日至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讨论会，并就此发出通报和附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的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提出了在全国推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和一些规定及原则，对当时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针、任务、内容、方法以及应当注意防止的偏向，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开始形成了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雏形。此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又对高等学校的政治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成绩评定，直到师资培训和教学组织领导等，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成为对大学生进行经常的、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和最基本的形式。

（三）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社会政治运动，在运动实践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建国初期，在新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许多

高等学校的师生都参加了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在运动中一方面热情宣传土改政策，访贫问苦，帮助农民翻身解放；另一方面也从中了解到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实际，了解了农民的爱与恨，沟通了与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初步划清了敌我界限、劳动与剥削的界限，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

在参加土地改革的同时，还组织学生参加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实践，这是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好课堂。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后，各高等学校积极动员师生参加这一运动，他们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一方面协助学校清洗少数隐藏在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通过这些活动，广大师生又一次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

参加抗美援朝的伟大爱国运动。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军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此，教育部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是“要迅速改变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以抗美援朝为具体内容的政治教育”，“反对美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思想，肃清美帝国主义所传播的一切有害的影响和殖民地奴化的买办思想以及其他国民党反动思想的残余”。当时各高等学校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组织时事学习，通过座谈会、展览会等形式，控诉美帝罪行；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动员全国大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写慰问信、送慰问品、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订立爱国公约，要求学生以爱国热情学好功课，把这项爱国运动与学生的经常学习结合起来，持久地开展下去。

参加“三反”、“五反”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展的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1951年底和1952年初，在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资本主义工

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腐化堕落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批判，对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并引导学生学习新社会的道德规范，学习工人阶级热爱劳动、大公无私、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使大学生受到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思想教育。

结合上述各项政治运动，还在高校师生中进行了一次较为集中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次运动是由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师生中首先发起的，教育部决定先从京、津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于是从1951年9月开始，京、津地区的20余所高校开展了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改造旧思想为目的的学习运动。中央对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重视，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主持研究学习计划，而且还于9月29日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以其丰富的经历，亲切、诚恳、令人感动地阐明了知识分子解决革命立场、态度和为谁服务等问题的重要性与艰巨性，给广大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全国参加这次学习的高校教职员占91%，大学生占80%左右，由于学习目的明确，师生自觉地以自我批评为主，辅以相互间的热情帮助，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都有较大提高，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或单位曾出现过要求过高过急，方法简单粗暴等现象，使少数师生在感情上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 (四) 按照“三好”的要求开展大学德育工作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提出：“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sup>①</sup>他号召全国青年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从此，高等学校把实现“三好”作为大学生的奋斗目标，把开展“三好”活动，评选三好学生，作为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激励

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要求按照“三好”的方向来进行工作，要“以共产主义教育青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革命斗争经验武装青年”，要“教育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成为具有文化科学知识，体魄健全，勇敢、勤劳和热爱祖国的人”。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这对于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 学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1953年8月，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向学生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努力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又有一定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在宣传教育中强调正面教育，以理服人，循循善诱，树立先进的榜样，鼓舞学生追求上进。通过学习和宣传，广大学生进一步划清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受到了一次生动切实的社会主义教育。为了适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需要，教育部召开了一系列各类高等学校专业会议，进一步确立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并把对学生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明确地列为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也开始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转变。随后，在学生中进行的“一化三改造”教育和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活动，就是这种转变的具体表现。

(六) 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从1954年11月到1955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三个有关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文件，在全国135个大中城市开展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全国青少年中开展的群众性的道德教育运动。

高等学校普遍组织学生参加了这一教育活动。在帮助学生充分认识开展这一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的同时，利用反面典型，联系思想实际，开展广泛的讨论，使大家看清资产阶级腐蚀青少年的严酷事实，认识到自己不是生活在“红色保险箱”里，而是处于被争夺的“拉锯箱”中。在讨论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理论课和时事报告会，向学生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教育，批判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增强大学生的革命道德意识。与此同时，引导学生开展健康有益的课外文娱体育活动，要求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在学生中起表率作用。通过这次集中的道德教育，给大学生及时敲了警钟，打了预防针，在校园里形成了良好的风气，师生的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 (七) 在高等学校开展学术领域的批判运动

从 1954 年 10 月至 1956 年，中共中央和教育部多次提出要在文化教育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文化学术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批判。高等学校组织文科各专业师生参加了这些批判活动。从 1954 年 10 月对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始，连续批判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批判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批判了梁思成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建筑思想，批判了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等。这些学习、批判活动帮助学生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增强抵制唯心主义思想的能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批判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把某些合理的、正确的学术观点也一概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用政治批判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特别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发展到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更是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扩大了打击面，使一些学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在新中国大学德育史上第一次开了用政治批判代替说服教育的先例。

### (八) 强调教师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

## 知识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高教部在《1954年的工作总结和 1955年的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应树立教师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的思想，通过课堂讲授及各教学环节、课外辅导、教学实习、生产实习、个别谈话和课外活动等方式，从学术思想到道德品质，每个教师都应有向学生进行文化科学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责任。教师必须在业务上既能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传授给学生，政治思想上又能以身作则地给学生以良好的教育和影响，这样才能切实贯彻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方针。

1955年 1月，高教部批发给全国高等学校的《四个师范院校的视察报告》提出，全体教学工作人员要关心学生，对学生随时随地进行思想教育；各高等学校的正、副校（院）长要对全部思想政治教育负责；要求每个教师在进行讲授时不应是单纯地叙述知识，而要有丰富的思想性。同年 4月 25日，高教部副部长刘子载在《关于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只有通过全体教师渗透在各个教学环节和适当的课外活动中来进行，才能使政治思想工作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多样化，更适合青年特点，使工作更为有效。可见，在这个时候，校长对学生德育工作全面负责的思想，教师、职工全面关心学生，教书育人、管教管导的思想，通过业务教学活动渗透政治教育的思想，已经初步树立起来。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大学德育

当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高等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大学德育在保证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党缺乏实践经验，加上国际国内种种不安定因素的影响，党在指导思想时而出现在“左”的错误，导致这一时期全党的工作，包括大学德育出现了许多失误和挫折，经

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一)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大学德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要求青年学生“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还说，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sup>①</sup>”。毛泽东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论述，对德育的地位与作用、德育的领导与管理的论述，是对建国以来德育思想的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大学德育的重要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还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思想问题的方针和原则，那就是“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解决，并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提出了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标准。这些论述继承和发扬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为大学德育提供了正确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是开展大学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学德育出现严重偏差

1957年6月，中央决定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加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把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些学生对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提出批评，被无限上

纲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某些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表示不满，被无限上纲为反对党的领导；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是非问题发表议论，被当作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等。在方式上采用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进行批判斗争，根本不允许被批判者有任何解释和澄清事实的权利。就这样把一大批正直、优秀的青年学生打成“右派分子”，致使有的学业中断，被发配到工厂、农场劳动改造，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估计过于悲观，提出了青年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于是，大学德育便走上了以思想改造为主要目的，以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为主要途径，以开展“四大”为主要方法的“左”的道路。

（三）通过“红专问题”大辩论，使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严重对立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又红又专的问题。他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sup>⑤</sup>毛泽东对红专问题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人们把红的问题看得更加重要，对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作了“左”的片面的理解，只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忽视了红与专的统一。因而在红专大辩论中错误地提出“插红旗，拔白旗”的口号，把那些刻苦钻研业务、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当作“白专典型”进行批判，甚至作为“白旗”拔掉，严重挫伤了广大师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还在学生中提出“自觉革命，向党交心”的口号，批判“资产阶级业务观点”，向所谓“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为此，在学生中开展了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事事强调

“政治挂帅”，把政治思想、“红”的要求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对学生提出许多偏激的、过高的要求，出现了唱高调、说空话等浮夸作风，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给大学德育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

(四) 学习贯彻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强化大学德育的作用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在一切学校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走出课堂，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迅速掀起了参加生产劳动的热潮。许多学生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培养劳动习惯，增强了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但是，把劳动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无限制地增加劳动时间，用劳动来冲击教学，冲击业务，完全违背了教育的客观规律，打乱了教学秩序，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由于《指示》过分强调政治挂帅，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强调参加生产劳动，学校出现了用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代替教学的错误倾向。加之，又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规定为高等学校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最基本的方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德育工作中出现滥用批判斗争，以势压人的现象，助长了主观武断和简单粗暴的作风，使大学德育工作愈来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走偏方向。

(五) 总结经验教训，初步纠正大学德育工作中“宁‘左’勿右”的倾向

1959年1月12日，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教育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再次重申学校应该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正确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纠正在部分党员和干部

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会议指出，我们在学校工作中不但要善于领导劳动，还要善于领导教学，不但要善于解决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问题，还要善于解决工农分子知识化的问题；对于学生，不但要求他们身体好、工作好，而且还要学习好。这些指示，对于纠正大学德育工作中“宁‘左’勿右”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同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关于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对大学德育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提出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四点意见：一是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思想工作应当有利于教学工作的进行，有利于在学生中造成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风气，不能事事搞运动，天天搞运动，而应当经常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二是要善于运用各种思想工作阵地，多方面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三是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进行教育的时候坚持说服的方法，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压服办法；四是要注意在学校中造成民主的、自由争论的风气，培养学生敢想敢说敢干，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高等学校贯彻以上指示精神后，德育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初步得到纠正。

(六)学习贯彻《高教六十条》，大学德育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1961年9月15日，《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经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条例》对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重新作了明确规定，即“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这是建国以来对大学培养目标最全面、最具体也是最适当的

规定，它保证了大学德育工作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条例》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的任务、内容、原则、方法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强调指出，凡属人民内部的问题，都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采取民主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的界限，政治问题又必须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一切思想政治工作都必须有利于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条例》还对前一段搞乱了的“红专关系”重新作了正确的解释并指出，红，首先是指的政治立场。对于高等学校的师生，红的初步要求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思想政治工作不但要管红，而且要管专，红与专是统一的，只专不红，只红不专都是不对的。高等学校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只有坚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反对社会主义，才叫做“白”。把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进步较慢，或者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指为走“白专道路”是不对的。《条例》的这些规定不仅恢复了大学德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对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提出了正确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与此同时，陈毅同志在对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讲话时，又就红与专、思想改造与思想批判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说，不能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而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从来没有空头政治，政治总是通过业务来体现的。学好专业是一个学生的政治任务，培养出大量专家，就是学校的政治任务。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他的政治觉悟越高，就越应该懂得专业学习的重要，就越

要刻苦学习。他还说，帮助别人进行思想改造，不能损害人家的感情，打击人家的心灵。对待青年学生采用简单的行政的办法，想通过几次批判解决思想问题是一种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法。

学习贯彻《高教六十条》和陈毅同志的讲话精神，对高等学校贯彻“八字方针”，清除“左”的影响，起了极大的作用，使大学德育工作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开始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迈进。尽管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物质生活条件急剧下降，可是学生的精神面貌却日益振奋，学校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奋斗和革命传统教育，许多大学生主动为国分忧，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共度难关，革命的政治信念毫不动摇，学习热情日益高涨，涌现了一批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这是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大学德育走向正轨之后出现的新气象。

(七)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大学德育工作出现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于1962年8月5日因公殉职，次年2月5日共青团中央发出通知，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雷锋的教育活动，3月5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学习雷锋题词，从此，学雷锋活动迅速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高等学校的共青团组织首先响应这一号召，在学校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活动，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学习雷锋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立场；自觉服从祖国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关心同志，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坚韧不拔，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坚持又红又专，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模范地完成各项任务的主人翁精神，等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使雷锋的光辉形象在大学生的心灵深处扎下根来，雷锋精神成了他们对照和衡量自己学习、生活、工作和思想品德的标准。在学校中出现了大量的自愿结合起来的各种学雷

锋小组，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义务为他人理发、修理，为学校植树、修路、打扫室内外环境，到公共场所和烈军属家里义务服务等，形成了人人学雷锋，人人争着为同学、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的良好风尚。许多学生从雷锋身上吸取了新的力量，他们更加自觉地把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与搞好专业学习结合起来，把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服从祖国分配，支援山区建设结合起来，表示一定要像雷锋那样，把祖国的需要、革命事业的需要当作自己最大的志愿。由于学校的正确引导，使整个学习活动开展得健康活泼，成效显著，大大促进了大学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建立，推动了学校优良校风的形成。这是我国大学德育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大学德育再次偏离正确的方向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成为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教育战线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急剧偏“左”，认为在高等学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已从公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转为教学、科研领域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少数学生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要求各高等学校把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大任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部决定把阶级斗争作为学生的一门主课，要组织大学生到农村搞“四清”，到城市搞“五反”，还要参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于1963年10月14日和1964年1月14日分别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学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间为半年至一年，并正式列入教育计划。许多大学生走出校园，停课下乡接受阶级斗争的洗礼，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经受了一定的锻炼，对于培养学生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增强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运动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它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夸大了敌情的严重性，在运动中错误

打击了不少革命干部和群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当时，学校花大量的时间动员学生参加这样的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来代替思想政治教育，代替专业知识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学生的“左”倾偏激情绪。在运动中对学生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也上纲上线地进行分析，“挖阶级根源”、“查和平演变”，造成许多大学生表现拘谨和沉闷，不愿敞开心扉，不敢讲真心话，人云亦云，千人一腔，使思想政治教育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在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过火的政治批判。从1963年开始的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到1964年夏季迅速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等各个领域。高等学校的学生被驱向这场批判运动的最前列，指引他们站在所谓“反修防修”的高度积极投入这一运动，除了对全国点名批判的对象进行批判外，还联系本校实际，对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展开批判，从他们的言论、文章和讲稿中找出所谓的错误观点，无限上纲，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进行点名批判，把许多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都当作政治问题加以批判，并以学术观点定罪，错误地给被批判者扣上所谓“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政治帽子，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感情。发动学生起来批判教师，造成师生关系日益紧张，大学德育完全变成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场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使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实际上它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九）在工作中大力“突出政治”，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放在首位，个人崇拜现象在青年学生中不断增长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下，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从1964年以后逐渐被学习毛泽东著作所代替。当时林彪在部队大力推行“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运动，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高等学校迅速响应，决定把教好学好毛泽东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把长沙政治学校的所谓经验生搬硬套地拿到大学里来，大

搞什么课前背语录，考试引语录，强调“活学活用，对号入座，立竿见影”，单纯追求形式，不讲实际效果。甚至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来组织学习，把学不学毛泽东著作当作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重要表现，稍有不慎，就将会落得个“不忠”的罪名。高等学校从六十年代初兴起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完全被引向歧途。

更为严重的是林彪一伙大搞“突出政治”，神化革命领袖，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神圣化，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对于“最高指示”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等等。这些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违背辩证法的谬论，竟然被当时报刊、广播鼓噪得火热，大谈什么“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说“这就是信仰真理，崇拜革命”。学生中有人不同意“顶峰论”便遭到政治批判。在这种“左”倾思想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大学德育愈来愈脱离实际，逐步变成突出政治，宣扬个人崇拜的工具。大学生的思想情绪在这种“左”的舆论和教育的引导下，日益变得狂热起来，反修防修的调子越来越高，个人崇拜的热潮不断升级，这一切都说明，他们充当“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 三、严重破坏时期的大学德育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高等学校推行极“左”路线，全面否定建国以来大学德育的优良传统，取消系统的政治理论课和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青年学生的单纯和热情，鼓吹“停课闹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用大批判开路，煽动红卫兵起来冲击党政军机关，打击革命干部和群众。在所谓“斗、批、改”的幌子下，全面破坏党的教育方针，篡改大学的培养目标，主张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斗走资派的战士”。这一时期，高等学校党的组织被冲垮，思

想政治工作机构和队伍彻底瘫痪，大学德育遭到严重破坏。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大学德育受到全面冲击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5月下旬，清华、北大附属中学的一些学生，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在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接着，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纷纷响应。“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得到毛泽东的热情支持。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称赞他们的“革命行动”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样给予热烈的支持”。为此，从8月18日到11月下旬，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共1300多万人，从而掀起了震动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连活动。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青年学生对党对领袖的无限热爱和信仰，极力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煽动红卫兵起来反对学校党委，批判专家、学者、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到几乎无法控制的地步，造反行动不断升级。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炮打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所谓“牛鬼蛇神”，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与此同时，部分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大搞打、砸、抢、抓、抄，却被当时的宣传舆论工具赞扬“好得很”，称赞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在这种错误舆论的导向下，“红卫兵”运动达到疯狂程度，无数青年学生被进一步引向邪路。他们大肆冲击寺院，捣毁神像，破坏古迹，砸烂文物，勒令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人员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挂黑牌、游街示众，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出现了许多严重的违法行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使高等学校面临全面冲击，党的领导被否定，政工人员被打成“保皇派”、“黑帮分子”，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而被冲垮，大学德育已经陷入全面瘫痪的境地。

(二)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进一步搞乱了学生的理论是非和思想是非

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阶段。高等学校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开展了所谓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次“大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污蔑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高等学校的“大批判”，除了把矛头指向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外，主要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煽动学生批判17年的教育路线、方针和制度，否定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否定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原则、途径和方法，否定对学生进行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大学德育的优良传统遭到彻底破坏。

为了缓解在夺权斗争以后出现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中共中央于1968年8月25日发出《关于工宣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要求“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取代了党在高等学校的各级领导，取代了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在“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再次开展了所谓的“革命大批判”运动，集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重点批判“全民教育”、“专家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要求做到“时时、事事、处处批”，“日日、月月、年年批”。这种无休止的“大批判”，实际上成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和主要内容。

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同时，还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学生，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上挂下联”，参加以“斗私批修”为纲的学习班，进行所谓“世界观的改造”。不仅如此，还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求他们做到“划、清、站”，即：同“反动家庭”划

清界限，肃清刘少奇和“反动”老子对自己的影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把那些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学生打成“反动学生”，要“批”字当头，立足于“拉”，执行“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的方针。总之，凡是对极“左”路线表示不满的学生，都难以逃脱批判、围攻和迫害的厄运。可见，这种“大批判”完全是歪曲事实，无限上纲，用戴帽子、打棍子的方法进行政治围攻，挑动群众斗群众，混淆了是非观念，毒害了学生的思想，打击了学生的心灵，流毒深远。

(三)由“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全面否定17年大学德育的伟大成绩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炮制出了这次会议纪要，作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林彪、“四人帮”毁灭教育的黑纲领，他们把建国17年来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污蔑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把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教师污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高等学校污蔑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这就为进一步毁灭教育、打击迫害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仅如此，《纪要》还提出“要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要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认为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不仅有学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肩负着改造旧大学，创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历史使命。要让他们参加教学的全过程，编教材，登讲台，评论教学，把课堂变成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并且提出要批判“师道尊严”，对原有教师“实行边改造、边使用、边提高的方针”，“使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逐步适应教育革命的需要”。提出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口号，彻底取消了党对高等学校的

领导，取消了大学的德育工作和正常的教学活动，违背了教育的客观规律，颠倒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否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严重搞乱了学生的思想，使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四)周恩来、邓小平批判极“左”思潮，整顿教育，大学德育曾出现转机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学德育曾出现过两次小的转机：一次是1972年至1973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开展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中央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专论，强调要充分认识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对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重要性，提出要又红又专，为革命学业务、学文化、学技术。认为“冲击社会主义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只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修正主义政治”，“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要促进这种统一，就必须反对不问政治和脱离业务的两种倾向”。在这些文章的影响下，各高等学校开始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逐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各项合理的制度，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另一次转机发生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各条战线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其中包括教育。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sup>⑧</sup>“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sup>⑨</sup>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合格人才。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教育部长周荣鑫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深刻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澄清了教育领域中许多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通过整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高等学校加强了党的教育方针的学习，开展了理想教育，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把

搞好学习与实现远大理想结合起来；加强了纪律教育，消除部分学生存在的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又出现新的转机。

可是，这两次转机都好景不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转机，于1974年被“四人帮”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所夭折，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转机，很快被“四人帮”煽动起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取代。尽管如此，这两次转机在大学德育史上仍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五）“四人帮”大肆宣扬“白卷英雄”，鼓吹“朝农办学经验”，彻底篡改大学德育的目标和任务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为了“抓复辟势力的代表”，首先拿出由周恩来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大学招生要进行考试的文件开刀，污蔑文化考查是“复辟回潮的典型”，并把张铁生这个“白卷英雄”抬出来招摇撞骗，蛊惑人心。1973年在高校招生考试中，“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首先将考生张铁生的信交《辽宁日报》发表，并加编者按说：张铁生“对物理和化学这两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的招生路线，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11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再加按语说张铁生的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攻击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江青则称张铁生“是个英雄，他敢于反潮流”。在“四人帮”的鼓噪下，张铁生被说成是“真正的又红又专”。就这样，他不仅上了大学，还担任了铁岭农学院的领导职务，并混进了中国共产党。“四人帮”一手制造的这个“闹而优则仕”的典型，在全国刮起了一股否定文化知识学习的歪风，妄图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白卷英雄”和“敢于反潮流”的文盲加流氓，极大地毒害了学生的心灵。

“四人帮”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同时，大力鼓

吹“朝农经验”，认为朝阳农学院采取在农村办学，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的作法，“具有战略意义”，是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典型，强行向全国高等学校推广。毛远新在所谓学习朝农经验的现场会上胡说要使朝阳农学院办成“政治大学”、“夺权大学”，说“学生光会科学种田，不会夺权，粮食打得再多，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提出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造反，敢于反潮流”的“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四人帮”的大肆鼓吹下，“朝农经验”流毒全国，在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等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根本上篡改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改变了大学德育的目标和任务，使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一片混乱。

#### 四、恢复发展时期的大学德育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进入了拨乱反正和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大学德育经历了一个从整顿恢复到开始新的探索的发展过程。在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中，大学德育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大学德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的轨道上来，并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和新时期大学生的特点，对大学德育从指导思想到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探索新时期大学德育走向科学化的途径积累了新的经验。虽然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大学德育在80年代后期曾一度受到削弱，但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正确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又使大学德育在新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整顿和恢复大学德育工作

粉碎“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各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揭露“四人帮”制造“白卷英雄”和“朝农经验”的

骗局，批判“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和把学生培养成为“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战士”的反动谬论，推翻“两个估计”，彻底砸烂“四人帮”强加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的精神枷锁，澄清了17年教育战线究竟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还是革命对象，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还是“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等大是大非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思想认识，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78年3月18日和4月22日分别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这两次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大推进了高校德育工作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sup>⑧</sup>。他还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sup>⑨</sup>又说：“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他强调“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这次教育工作会议还修订并重新颁布了《高教六十条》，强调要加强对学生管理制度的建设，加强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重新弘扬雷锋精神，把“学雷锋，创三好”的活动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推动了学校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使大学德育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大学德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

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果断地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正确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彻底冲破了“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形成的“左”的禁锢，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从此，大学德育工作也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高等学校进一步开展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学习，推动思想解放。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和一般化的做法，坚持实事求是、说服教育的原则。特别是1980年10月在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正式把“疏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强调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强迫的、简单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广大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勇于探索，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学校中各类学生社团开始建立，并迅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开始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

### （三）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大学德育的正确方向

当我党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时候，在思想政治领域中又出现了“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社会上一些人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乘机煽动闹事，造成一部分青年学生思想混乱。为了正确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丝毫动摇。

这时，在一些高等学校出现了重视智育、放松德育的现象，“专就是红”、“以专代红”的思想在部分师生中开始蔓延。有的还主张取消政治课，取消政治辅导员，在高等学校引起了较大的思想波动，不少学生由思想偏激到行为放纵，出现违法乱纪现象，思想政治教育一度面临较大困难。针对这些情况，各高等学校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并把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与形势任务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和“学雷锋，创三好”、“五讲四美”活动结合起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地开展教育，收到一定效果。同时，根据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取缔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加强，影响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基本得到控制。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达以后，教育部及时召开了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蒋南翔部长在会上总结了建国32年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七条基本经验，并提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门科学，要求各高等学校以《决议》为思想武器，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努力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同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引导学生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通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宣讲《决议》，学生的思想面貌发生较大的变化，正气上升，学风好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学德育又出现了新的起色。

（四）研究和改进新时期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索大学德育科学化的途径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新形势对大学德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的条件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生；在扩大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

经验的条件下，如何教育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还存在各种矛盾，社会生活出现消极现象的情况下，如何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在观念、知识、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尽快适应新的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大学德育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要求把它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和探讨。从 1980 年 6 月开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率先开展讲座的情况下，全国高教战线纷纷开展了新时期大学生思想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研究。

为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大学德育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1984 年 12 月，中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成立，中宣部、教育部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接着，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或称德育研究会）先后成立，绝大多数高等学校也成立了此类研究组织。各级研究机构成立以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多次举办研讨会和讲习班，创办了不少德育研究的刊物，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大学德育的研究著作。这些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对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探索大学德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两大新生事物：

一是在大学生中开设思想品德课，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课堂，创造了新的经验。1980 年大连工学院首先开设了“思想修养课”，以后，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也不定期地开设了这一课程。1982 年 10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从此，思想品德课就在各地高等学校迅速发展，成为对学生有计划地进行理想、道德、人生观教育的一门课程。1984 年 9 月，教育部在总结各校开课经验的基础上，正式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对课程的任务、内容、教学原则、师资队伍和体制等作出了具体规定。思

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开设，有效地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帮助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在部分高等学校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推动了大学德育的学科建设。1984年教育部连续发出三个文件，布置在一部分高等学校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办本科、第二学士学位班、大专起点本科班。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要求有关院校在办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培养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造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开辟一条新路”。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60多所院校开办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多所院校获得这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这些院校为国家输送了数千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使大学德育师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199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在北京和武汉建立了两个博士点。

#### (五) 加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方针，要求向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1983年7月，中宣部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要求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任务。高等学校在学习十二大文件，开展共产主义教育活动中，把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融为一体，广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总结了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断升华的经验，推动了全国高等学校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

在教育活动中，各高等学校广泛组织大学生向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学习，先后开展了向“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

生”张华，“中国的保尔”、“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80年代的活雷锋”朱伯儒等，以及华山抢险战斗集体、老山前线英雄群体的学习活动，对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人生观起了良好的作用。

为了总结十二大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加强大学德育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1987年5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和方法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对如何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八点要求：有的放矢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教学工作结合起来；把发扬民主与加强法制纪律教育结合起来；对学生要严格要求，积极疏导；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认真培养学生骨干队伍；加强和改进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决定》的发出，对于改进大学德育工作，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此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已开始泛滥，《决定》的精神未能得到全面贯彻执行。

（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高等学校日益泛滥，大学德育面临严重挑战

由于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没有坚持到底，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继续泛滥留下了后患。1985年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有的人大肆鼓吹“政治多元论”、“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利用我们改革中出现的暂时困难和党风不正等问题，蓄意夸大我们社会的阴暗面，极力丑化党的形象，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和价值观念，主张“全盘西化”。他们利用大学讲坛，竭力在大学生中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策动青年学生起来“斗争”。而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党中央个别领导人对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思潮的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一味强调“宽容”，使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处于消极防范的被动局面，没有理直气壮地给予应有的回击。结果导致 1985 年 9 月、1986 年底到 1987 年上半年几次波及全国的学潮。经过学校和社会大力做疏导工作，才使学潮平息下去。

学潮之后，中央指示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各高等学校抓住时机进行工作，收到一定效果。但是，由于思想理论战线软弱涣散的状况未能根本解决，加之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不断渗透和社会“大气候”的消极影响，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严重挑战。许多政工干部顾全大局，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收效甚微。1988 年发生“蛇口风波”，否定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大肆鼓吹电视片《河殇》，严重削弱了青年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于是，从 1988 年末到 1989 年初，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在部分高等学校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的“民主沙龙”、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学生的“参政热”、“民主热”和盲目的政治情绪不断升温，终于导致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严重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给大学生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七)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学校工作的第一位，全面加强和改进大学德育工作

总结经验教训，大家认识到高等学校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沿阵地，我们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始终如一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根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各高等学校首先加强了政治形势教育、基本国情教育，清理思想，稳定局势。接着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端正学生的政治思想，弄清一些重要的理论是非，解决一些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在

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切实加强社会实践教育，把组织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列入学校教育的整体计划，通过社会考察和社会调查，使学生了解国情、民情，了解改革开放的实际，培养他们的工农感情和艰苦奋斗精神。与此同时，在 89 级新生中开展军训的试点，加强对学生的集体主义和组织纪律教育。在学生中加强党的建设，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重新树立党的形象。在教育中，始终坚持疏导方针，说服教育，启发自觉，发动教师、干部跟学生交朋友，开展谈心活动，耐心做工作，收到良好效果。从此，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八) 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德育的新格局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高等学校的德育工作者进一步开展了认清形势、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教育活动，开始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大学德育新格局的探索。几年来，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建设，充分发挥德育主渠道的教育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和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心理咨询活动、影视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德育新载体的功能，探索寓教于文、寓教于乐的新路子，取得显著成效。

199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大学德育目标和发展方向作了明确规定。1994 年 8 月，相继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全面加强和改进大学德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全国各高等学校在这些文件精神指引下，正在加大改进工作的力度，逐步完善德育工作体系，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贡献。

## 注释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 ② 转引自《中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9页。
-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1页。
- ④ 同③,第780—781页。
- ⑤ 同③,第803页。
- ⑥⑦同①,第478页,第478—479页。
- ⑧⑨ ■ ■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 92 104 105页。

# 第一章

## 大学德育地位的历史演变

199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把德育放到高校工作的主导地位,这是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我们的教育方针所决定的。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德育在实现培养目标的过程中,起着导向、动力、保证的作用,它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现在高等学校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是跨世纪的接班人,是实现经济发展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的生力军,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坚定地把德育放在高等学校工作的主导地位,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不放松。建国以来,我们党一直十分重视高等学校德育工作,在党的教育方针中也有明确规定。但是,关于高等学校德育的主导地位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能说已经完全得到解决。努力探讨建国以来大学德育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认真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真正确立高等学校德育的主导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 一、大学德育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

### (一) 大学德育地位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改造旧大学的过程中，对新中国大学的性质，对大学德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有临时根本大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是实现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转变时期开展大学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这一基本指导方针要求高等学校德育工作必须是民族的，即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民族尊严、独立和解放，肃清殖民地买办奴化思想，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必须是科学的，即着重宣传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唯心论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努力发展自然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爱科学”的国民公德；必须是大众的，即是为人民服务，主要是向工农开门，为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服务，切合工农利益的需要，反对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教育，树立爱人民、为人民的思想。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在1949年10月的常委会和1950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学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共同纲领所明确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同时也是现在学校中思想教育所应遵循的准绳”，“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的，这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区别于旧中国封建性和买办性的教育方针的根本特点之一”。1950年2月20日，全国学联十四届第三次执委会也指出：“妨碍正课或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完全恢复旧的一套的做法都必须纠正。”可见，当时国家、青年团、学生群众组织都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放到了应有的

重要位置。

大学德育地位确立的主要标志是：

1. 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作为开展高等学校德育的主要渠道

周恩来同志 1956年在《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思想转变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自己的业务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他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解放以来，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对于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起了重要作用。通过经常的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大学生的政治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才能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掌握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才能获得行动的自由，才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因此，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是大学德育的主要渠道。建国后在高等学校开设了三门政治理论课，即《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逐步从课程设置、课时安排、教学方法、成绩评定到师资培训，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和制度。这就成为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型大学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任务，同时也是大学德育地位确立的主要标志之一。

2 初步建立了德育工作机构和制度，作为开展高校德育的组织保证

高等学校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极为重要的阵地，担负着为新中国建设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要任务。加强和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十分重要。而建立和健全德育工作机构和制度，是开展大学德育，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建立和健全德育工作机构和制度，就是为了统筹各方面的力量，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顺

利完成。建国后，高等学校先后建立了党委，积极慎重地开展建党工作；全国各高等学校还普遍建立了学生会组织，学生会成为党领导下维护学生合法利益和开展自我教育活动的群众组织。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的政治领导，改进和提高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育部决定在高等学校中设立政治辅导处和政治辅导员，形成了高等学校德育工作机构和制度的基本格局，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在组织上有了保证。这是大学德育地位确立的又一主要标志。

## （二）确立大学德育地位的重大意义

1. 确立大学德育的主导地位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教育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最终要通过它培养的学生能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表现出来，而学生的这种素质的培养主要是靠高校的德育工作来实现的。在新的时期，高等学校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学生，才能保证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办学方向。为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指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学校德育即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高校处于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前沿，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各种渠道对学生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国际上的敌对势力，会千方百计地毒害、腐蚀我们的青年一代，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依然存在；国内由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激化，思想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对此，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1994年6月

1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只有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四有”人才的培养，有赖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可见，在新形势下确立大学德育的主导地位，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

2 确立大学德育的主导地位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需要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社会主义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它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健康体魄教育三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德育、智育和体育。它们之间的关系，既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又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从德育与智育、体育的关系看，德育不能不占更重要的地位。它在高校全面发展教育中占主导地位，是主导因素，起主导作用。因为一个人是否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的智力和体力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总是要受到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制约。一个人的智力高、体质好，只是表明他具备了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但他愿不愿意用他的本领为社会、为人民群众服务，却要取决于其政治思想觉悟的高低和道德品质的好坏，而这一点则主要靠德育来解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努力使教育质量在九十年代上一个新台阶。”从党的教育方针看，它既要求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也指明要把德育放在主导地位。事实证明，任何时候动摇

或削弱了德育的主导地位，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和高校培养目标的实现就会受到干扰和影响，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目标就难以达到。

3 确立大学德育的主导地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需要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要求对青年学生进行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教育，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进行到底。80年代后期，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力，这股思潮已经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动摇、涣散和瓦解了一些大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只有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生命线，始终贯穿于高校工作的各个方面，才能保证高校的社会主义性质，才能使大学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事实告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实际工作中，集中表现为，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忠实信仰者和坚决捍卫者。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需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可见，在新形势下确立大学德育的主导地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需要。

4 确立大学德育的主导地位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基础，思想道德建设是主导。高等教育承担着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双重任务，高等学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大学德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德育在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高级人才上。加强大学德育,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今天的在校大学生是跨世纪的人才,若干年之后他们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的骨干。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生的文明程度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未来。通过大学德育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既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负责的表现,也是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重要的贡献。

## 二、大学德育地位演变的历史经验

建国 40 多年来大学德育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吸取与借鉴的经验:

(一)正确分析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是摆正大学德育地位的基本前提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历来主张革命政党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从而指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指导中国革命离不开对形势的正确分析,指导高校德育工作也是如此。建国初期,根据当时国家政治形势的发展和阶级斗争任务的变化,党和国家适时地把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作为高校德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并结合当时各项中心任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确立了大学德育的主导地位,在高校师生中进一步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再一次划清了敌我界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剥削群众、唯利是图、腐化堕落的思想,初步划清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开始树立劳动光荣、为工农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在正确分析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这个问题上,我们既有成功的

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历史上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确立大学德育地位时曾经出现过两种明显的偏差：

一是在“左”的思想支配和干扰下，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导致人为地拔高大学德育的地位和作用。比如，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使大学德育一度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倾向，阶级斗争成了整个学校教育的中心课题，从而大搞“政治挂帅”，把高校德育变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工具。这种“左”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学德育地位被人为地抬到了惊人的高度。

二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和干扰下，我们党的个别领导人对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不够，甚至提出“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主张。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乘机散布“民主”、“自由”、“人权”的错误论调，把青年学生的“参政热”、“民主热”引向邪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大学德育遭到严重削弱，有人提出学校思想工作要“业余化”、“兼职化”，有的政工部门被撤销，政工干部被调离，不少政工人员被搞得灰溜溜的，大学德育丧失了它应有的地位，结果导致八十年代后期学潮不断，最后酿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 and 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sup>①</sup>错误地分析形势，必然导致大学德育地位的“左”右摇摆，使德育工作遭受严重的挫折。可见，正确分析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是摆正大学德育地位的基本前提。

(二)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摆正大学德育地位的关键

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一贯的目标和要求。红与专作为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它是一个

统一的整体，任何时候也不能分割。这是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如果企图用人为的力量来不适当地拔高“红”的地位，结果不仅不能达到真正的红，反而使科学文化素质也大为降低，这样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

50年代前期，我们对红与专的关系是处理得比较好的，既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又重视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生政治思想素质和专业知识素质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在强调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重视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要求在校学习的青年学生掌握各种专门知识和科学技术，成为有文化、有知识、懂科学、懂技术的人，更好地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由此可见，在50年代前期，我们比较正确地处理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把对学生的红与专的要求统一于整个教育与教学过程之中，把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作为评价和考核学生的同等重要的标准，不论从舆论氛围上还是从学校教育的措施和环节上，都体现培养目标的一致性。结果，我们培养出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中间的许多佼佼者已成为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这是我们在建国初期培养人才方面最宝贵的经验。

可是，到了50年代后期，主要是整风反右以后，在高等学校开展了一场红专大辩论，这场辩论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把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把那些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当作“白专道路”典型进行批判，严重影响了广大师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特别是在1958年教育大革命时期，强调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砍大并专业课程，任意压缩教学时间，严重打乱了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为了纠正“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宁‘左’勿右”的思想，1961年9月15日，中央批转了《高教六十条》，对红与专的关系又作了明确的规定。条例强调要切实保证教师的业务工作时间，注意发挥每个教师的专长，鼓励他们在学术上作出成绩。由于中央对“宁‘左’勿右”局部的纠正和《高教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学

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得到恢复。各高校又重新确立了教学为主的原则，减少过多的政治活动和劳动时间，刻苦攻读的学习风气又开始形成。所以，在60年代前期，高校的教学质量又有了新的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合格人才。然而，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又把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割裂推向了极端。在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影响下，政治被抬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地位，在学校里大批“智育第一”、“业务挂帅”，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白卷英雄”。他们这样做的结果，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事业上整整耽误了一个时代，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下，对人才的培养又重新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sup>②</sup>因此，他主张“还是红与专的统一”。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红与专关系的深刻阐述，对指导高等学校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后来又出现了忽视政治的倾向。不少学生不重视政治理论课学习，不愿参加政治活动，迷信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重专轻红或先专后红的错误倾向。在这股错误思潮的冲击下，不少学生被卷进了学潮和动乱。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表明，把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对立起来、分割开来，不论是重政治轻业务，还是重业务轻政治，都是违反教育的基本规律的。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

互相促进的，红必须通过专来体现，专更需要红来保证。我们只有把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作为学校教育的整体目标贯彻到各项工作之中，才能摆正大学德育的地位，培养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三)正确发挥大学德育的功能是摆正大学德育地位的重要条件

能否摆正大学德育的地位，与正确发挥大学德育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德育的正确地位是通过德育功能的正确发挥来实现的。长期以来，我们在大学德育中多强调它的运动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忽视它的塑造功能和保证功能，导致德育地位发生“左”的倾斜。

强调德育的运动功能，忽视德育的塑造功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表现尤其突出。从50年代后期反右派斗争开始，大学德育几乎都在政治运动中进行，如大跃进运动、教育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大学德育带有很强的运动功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学德育完全违背学校教育的客观规律，这种运动功能就更加突出了。林彪、“四人帮”大肆鼓吹“政治冲击一切”，无休止地开展大批判运动，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甚至把课堂也变成了大批判的战场，完全用大批判代替了思想政治教育。大学德育运动功能的强化，使它在实际上成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政治工具，给大学德育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导致德育地位的严重丧失。

德育的功能表现在个体发展方面，是人格的塑造。教育是塑造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事业。塑造大学生的心灵，培养大学生完善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德育的主要功能。然而，人们往往忽视德育的塑造功能，这与强调德育的运动功能是紧密相联的。建国以来，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大学德育的运作方式也多带有政治运动的痕迹，习惯于采用运动式的教育方式，使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是一门科学，要做到入

耳、入脑、入心，就得深入细致，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可是，这种个别的、深入细致的、塑造式的思想教育方式仍未被很多德育工作者所认识。一旦出现问题，则采取运动式、突击式的办法去解决，结果形成了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德育效果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大学德育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能不重视德育的塑造功能。

片面理解“政治教育是中心一环”，忽视德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主导作用，这也是大学德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过去，我们一直着眼于大学德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制度服务。这本来是教育的政治职能所决定的，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将“政治教育是中心一环”加以夸大，使其片面化、绝对化，以政治教育取代整个德育，把“主导”夸大成了“唯一”；同时，也忽视了德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也将这个“主导”夸大成了“唯一”。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完全违背了学校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给社会进步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要正确发挥大学德育的功能，在学校教育内部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两个关系：一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品质与道德品质的关系，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要懂得，政治品质在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中起主导作用，然而，道德品质又是不可忽视的，它在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中起着基础作用。因而，抓德育既要重视政治教育，又要重视道德教育，不可偏废。二是正确认识、处理德育与智育、体育的关系。要懂得，“德为智之帅，智为德之资”，在全面发展教育中，德育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政治方向；智育提供智力基础，是教育的主体部分；体育提供健康体魄，是德育、智育的物质载体。德育不合格固然是“危险品”，但智育不合格是“次品”，体育不合格则是“废品”。因而，应该对学生的德、智、体全面负责。而德育是保证全面发展的动力，德育的主导作用与对学生德、智、体全面负责是统一的，而

不是对立的。只有正确处理上述关系，正确发挥德育功能，才不会时而夸大、时而削弱德育的地位。

毋庸讳言，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德育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功能。否定这点无疑是错误的。但是，如同任何真理超出了它适用的范围就会变成谬误一样，把德育的政治性功能绝对化，也是错误的。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十分重视德育的塑造功能和保证功能，才能正确发挥大学德育的作用，摆正大学德育的地位。

(四)正确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是摆正大学德育地位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了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反右要防“左”、反“左”要防右，这是正确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基本指导思想；反对“左”、右倾向必须实事求是，这是正确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我们党正是根据这个基本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正确地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战胜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也有教训，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就不仅未注意防“左”，反而在1958年初搞“反对温情主义”，以致愈搞愈“左”，犯了反右派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以致后来出现了“谈政治保险，谈业务危险”、人心惶惶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力求符合客观实际，防止在注意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忽视另一种错误倾向。邓小平曾经对此明确指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sup>⑩</sup>这既是对我党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建国以来摆正大学德育地位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因而，邓小平的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我们在大学德育工作中正确反对来自“左”、右两个

方面的干扰，切实摆正大学德育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大学德育工作中，我们多次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由于党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左”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高等学校接连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进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育，企图教育培养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的“反修防修战士”。从此，大学德育被逐步纳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文化大革命”十年，由于党的指导方针失误，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把大学德育作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导致对德育主导地位的理解和执行发生了重大的偏差。拨乱反正以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为四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这个中心任务上来，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疏导方针，对学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逐步恢复并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又出现了右的错误倾向。社会上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思想政治工作处于涣散软弱状态。经过“文革”，人们对“左”的一套感受非常具体，有警惕性。可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却缺乏认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工作重点转移以后，对阶级斗争也不愿意多提，再加上宣传舆论和理论工作的导向失误，包括贬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大公无私，批雷锋精神，淡化党的领导，“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因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断泛滥，造成了严重危害。

如上所述，无论是贬低、抹煞大学德育的地位，或者是任意抬高它的地位，夸大它的作用，都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在大学德育工作中积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正确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是摆正大学德育地位的重要条件。

如何正确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呢？首先，反右要防“左”，反“左”要防右。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在党

内发生错误倾向的时候，一个时期总是有一种错误倾向是主要的。然而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滋长。例如，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当我们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及其他“左”的错误时，又有些人误认为斗争已不复存在了，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取消了，“专”可以代替“红”了。只有认识和掌握了“左”和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和相互补充这一特点，才能自觉而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反右时，在指出右的错误时不要再用“左”的做法；反“左”时，在克服“左”的错误中防止右的干扰，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而正确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

其次，反对“左”、右倾向必须实事求是。根据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在反对“左”、右错误倾向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存在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右倾就反右倾，有“左”倾就反“左”倾，没有就不要硬找。头上没有虱子，如果硬要去抓，势必抓得头破血流。过去，我们在高校德育工作中之所以出现某些失误，跟我们未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关系极大。例如，对1957年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对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给予国内影响的估计，对学生中出现的某些忽视无产阶级政治的思想倾向的估计，都未能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一些青年学生错误地划为右派。再如，“文化大革命”中，大学德育在指导思想主要是“左”的错误，可是在实践中却是一个劲地反右倾，甚至把很明显的“左”，也硬往右上挂，说是“形左实右”、“极右实质”，这就不能不给高校德育工作造成严重恶果。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还是从主观臆断出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与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区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就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曾经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sup>①</sup>因此，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大学德育工作者，要

敢于从实际出发，敢于实事求是，既不能随风倒，更不能凭主观乱反一通，这才是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干扰的正确态度。

### 三、新形势下大学德育地位的走向

1994年6月14日，李鹏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作《动员起来，为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而努力》的主题报告中明确指出：“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德育工作的新思路。”在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研究德育工作的新问题，探索德育地位的新走向。

#### （一）坚持德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建立服务型德育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sup>①</sup>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总要求，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主要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我们的任何工作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学德育工作也不例外。大学德育如何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呢？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服务型德育。

##### 1. 建立服务型德育是大学德育工作的优良传统

在革命战争年代，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和鲁艺等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的。他们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优秀政工干部和军事指挥员，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当时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紧紧围绕这个中心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了一代热爱祖国、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前进。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全面的加强和改进，努力为国家培养全心全意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人才。

## 2 建立服务型德育是大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

大学德育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主要是通过为经济建设培育合格人才来实现的。它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核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教育学生，使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化建设人才。大学德育工作历来是我党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实现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而服务的。因此，高等学校的德育任务不是凭空提出来的，它首先是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提出来的，是依据一定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确定的。要实现大学德育的基本任务必须建立服务型德育，使德育工作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成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教育学生，用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塑造学生，帮助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创造能力，锻炼健康体魄的强大动力。

## 3 建立服务型德育是大学德育地位的集中体现

建国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倾向是片面夸大政治的统帅作用，政治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政治，因而把政治工作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工具。这是大学德育地位问题的主要教训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由“纲”的地位转到服务于四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坚持德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并根据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着眼于教育人、塑造人、促进学生人格的完善，努力培养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这是落实大学德育地位的重要经验。

建立服务型德育，必须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1) 正确认识和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德育为主导的关系。把德育放在教育的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端正办学方向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保证。这一思想的确立与贯彻，调整了学校的教育结构，保证了德育作用的发挥；改变了学生的思想状况，带来了学生精神面貌的可喜变化；扭转了德育教育的被动局面，出现了德育教育的生动景象。因此，确立大学德育的主导地位，是经过多年探讨摸索，总结经验教训而得出的主要经验。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德育为主导的关系呢？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局，以德育为主导是局部。德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把德育放在主导地位是我党总结建国以来德育经验教训得出来的科学结论，是特指德育对于整个学校教育工作的正确导向、动力、保证作用而言的。因此，以德育为主导，是就教育内部诸因素之间的关系说的，讲的是德育在教育内部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局部必须服从全局，德育作为局部的主导必须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全局的中心，二者是没有矛盾的。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德育为主导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前者是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客观规律；后者是指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德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也必须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全面实现培养目标服务。因此，以德育为主导决不是说，德育可以脱离经济建设，搞“自我中心”。那种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德育为主导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再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德育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要求更高了；德育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德育的难度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大了；德育工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坚持，必须在改革中加强，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中不断完善。

(2) 正确认识和处理德育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关系。德

育的政治功能是不容否认的，它同教育的阶级本质紧密相联。教育产生之初并无阶级性可言，自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教育便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并促进社会发展。德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用一定阶级的思想影响下一代，为本阶级和社会培养所需人才。新形势下大学德育的政治功能，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大学生，培养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德育同时也具有经济功能，这种经济功能虽长期为人们所忽视，但确实存在着。可以说，最初的德育就是从生产劳动中产生的，它授予人们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经验知识和行为规范。以后，德育才逐渐演变为阶级斗争的一个“附属品”。然而即使产生了这种变化，德育的经济功能也未曾丧失。作为高等学校所培养的新型高级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基础，还要具有高级人才应有的思想和品德。后者正是大学德育所应当承担的主要任务。大学德育所完成的这一塑造新型高级劳动者、高级科技人才内心世界的任务，将成为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物质文明的强大动力。这就说明了德育的经济功能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德育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关系呢？首先，德育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新时期的大学德育，就是要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努力培养四化建设人才，这既体现了德育的政治功能，又体现了德育的经济功能。因为德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理应为经济基础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德育本身不是目的，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合格人才。人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因此，那种把德育的政治功能同经济功能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次，德育经济功能的增强并没有否认其政治功能的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因素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大。作为参与科技工作的个体不仅要有智，还要有德，他们的世界观、方

方法论、道德品质、组织纪律、服务方向和对科学的献身精神，都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人的主体性增强，德育的经济功能也随之增强。这种经济功能说明了德育对于掌握科技、运用科技、发展生产和提高生产力都可以产生直接作用；而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正在突破那种道德教育属于上层建筑而与生产无直接联系的观点。特别是在今天，德育的政治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其政治的中心内容则是列宁所说的“经济建设的政治”。由此，德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将逐渐趋向统一。

(3) 正确认识和处理德育在服务于经济建设中“有位”与“有为”的关系。既然德育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是通过培育合格的人才来实现的，那么，德育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在学校则主要表现在为育人服务上。学校的中心工作是育人，德育、智育、体育等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共同为这一中心服务，并在服务中紧密配合、互助合作。德育服务于这一中心，其地位不是降低了，而是很适当、很科学。在服务于育人这一中心中，德育大有可为。因此，德育工作者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有位”与“有为”的关系，树立“有为才有位”的观念，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有力地服务于中心工作的实践中，用业绩证明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体现其重要的地位。德育的地位和作用紧密相连的，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有位才能有为，所以，要有必要的机构、队伍来专门领导、管理德育工作；另一方面，有为才有位，地位不是靠机构多、级别高、专职干部多来体现的。因此，在领导重视，已有必要的机构和队伍的前提下，关键就在于有所作为了。在处理“有位”和“有为”的关系上，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把德育凌驾在经济、业务工作之上，片面地争人数、争职级、争机构扩充，以为这就是地位的象征，实际上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不符合精干、高效的原则；另一种是轻视、忽视德育工作，任意削弱德育队伍，认为经济、业务工作做好就一好百好。

这两种片面认识，都不能处理好“有位”和“有为”的关系，因而，都不能自觉有效地使德育服从和服务于育人这个中心。

## (二) 树立大德育观念，建立渗透式德育

树立大德育观念，建立渗透式德育，是大学德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的大学德育，仍然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学校加强德育不能简单地靠增加人员和投入大量的时间，只能在加强相对独立具有实体性地位的专门德育工作的同时，又着重把德育渗透到其他教育和工作中去，通过其他教育和工作广泛开展育人活动。这就要求学校各个管理部门、全体教职员工都要增强全员德育意识，把德育工作与教学、管理和服务结合起来，通过本职工作，渗透德育内容，形成全方位渗透的大德育模式，使德育的作用大大增强。

树立大德育观念，一是要在学校内部形成德育的“全员”意识，就是要把全校的教职员工动员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实现其德育任务。德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是少数政工人员的专利，更不是靠专职政工人员唱“独脚戏”所能奏效的，它应当是广大教学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共同的职责。只是这种职责过去不够明确，或者仅仅停留在号召上，因而难以落实。1994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德育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同时，要从政策和制度上保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落实。”因此，高等学校必须建设“大队伍”，形成各种教育力量全方位的有机整合。建设“大队伍”，决不是要扩大政工队伍，而是要求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少而精的专职政工人员为骨干，去团结广大教职工共同做好工作。要提倡从事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同志在德育工作中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发挥各自的特长，形成各自的优势。无数事实证明，从事业务工作的同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优势，他们接触学生多，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问题也多，只要在活动中进行引导，许多问题就可

以迎刃而解。对于业务人员的这种优势和长处，我们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使其充分发挥。同样，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也应具有德育意识，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自己的工作之中。要彻底克服见物不见人的思想，把育人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并经常考核，形成“一岗两责”的目标责任制度。事实上，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也是具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的，只要大家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做好本职工作，就能对学生产生良好的影响作用。

要把学校德育渗透到智育和体育之中，体现在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中，就要结合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管理工作和服务工作一道去做，并且在这些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体现自己的价值，检验自己的成效。建立渗透式德育，一是要把德育渗透到教育工作的全过程。一般说来，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往往在学习过程中反映出来。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结合教学工作一道去做，并且渗透到教学工作的全过程，贯穿到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里。一方面，作为教学内容的科学知识无不包含一定的思想内容，它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寓教形式之一，这就为德育渗透到教育工作中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充分保持其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要有很强的知识性。只有寓教于学，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既为学生喜闻乐见，愿意接受，又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圆满完成学习任务。二是要把德育渗透到管理、服务工作的各个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管理也是教育，是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学校的工作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其工作目标一致，服务对象一致，都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合格人才。为此，德育工作者不能“单打一”，孤军奋战，而必须与管理、服务工作相结合，渗透到管理工作、服务工作之中，以便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让学生在各个部门和各项工作中，在校学习全过程的每个阶段上，都得到教育、帮助和指导。三是要把德育渗透到学生的全部生活中去。学生在学校里，要学习，要工作，要劳动，要锻炼身体，要娱乐，要休息，其生活是丰富

多彩的。校内外的生活中都包含着大量丰富的德育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不能脱离学生的这些生活实际，而且必须通过寓教于乐、寓教于活动等方式，满足他们在生活中的各种需要。这样，大学德育的影响渠道将更加广泛，显性德育与隐性德育的配合将更加得当，影响的方式将更加科学化和艺术化，德育的作用将大大加强。

二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扩展学校教育，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结合起来，使高校德育社会化。《国务院关于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的实施意见》中强调指出：“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学校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关心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形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更加紧密结合的新格局。”从总体空间上看，影响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学校、社会和家庭。社会、家庭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和不可忽视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性质上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其特点具有自发性、盲目性，不易控制。学校对大学生的影响是主导的，它是按照社会要求，从学生思想实际和特点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计划性、针对性和可控性。学校、社会和家庭对大学生的思想影响是客观的，各具特点，又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可以说，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补充和丰富，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集中和深化。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受社会教育的影响将日益强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学生信息来源越来越依赖各种传播媒介，学校教育提供的信息所占比重日趋降低；另一方面是由于招生分配制度的改革，家庭在子女求学上的投入越来越多，学生毕业后就业已由计划分配体制转向市场调节体制。如果说在计划体制下学校教育左右着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取向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家庭和社会舆论将对学生的道德面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高等学校应该清醒地认识学校教育的局限性，切实搞好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配合。总

之，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既有其独特的角色任务，又在参与德育、联合育人的职责上统一起来，它们应当做到互通信息，相互配合，共同参与，齐抓共管，从而逐步形成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的新格局。

### (三) 坚持高校德育相对独立的实体性地位，实现德育工作科学化

建立服务型德育、渗透式德育是新时期“大德育”观的重要体现，是大学德育实现全程化、全员化、科学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它们不仅不排斥德育具有相对独立的实体性地位，而且对相对独立的德育活动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大学德育必然要坚持它相对独立的实体性地位，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相对独立的德育活动。德育之所以有相对独立的实体性地位，一是因为德育是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德育、智育、体育既有机统一，又各自相对独立，既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又相互区别、不能相互取代；二是因为除了渗透在智育、体育等教育过程的德育因素外，还会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和德育活动。比如，专门的德育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政治教育课；专门的德育活动则包括党团组织教育、业余党校教育、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党章学习小组等活动，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是高校德育的主渠道，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则是高校德育的“王冠”，是确立德育的地位、区别于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重要标志。因此，要求寓教于学、寓教于乐、寓教于服务、寓教于活动之中，与坚持德育的相对独立的实体性地位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那种否认德育有相对独立实体性地位的“完全寓它论”，是不符合教育规律和教育方针的。建立渗透式德育，抓好日常德育活动，更要求“两课”充分发挥它在进行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才能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并为全校德育提供理论导向。建

立服务型德育、渗透式德育，更要求“两课”及其它相对独立的专门德育活动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增强“两课”、“两组”及党团组织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战斗力。只有充分发挥“两课”在高校德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又注意寓教于其它课程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项工作之中，才能使高校德育真正实现全程化、全员化和科学化。

## 注释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 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页。
- ⑤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 第二章

# 大学德育目标的形成与发展

培养什么样的人，历来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教育的目的性也由此体现出来。教育目标体现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并通过教育者的教育活动来反映，在塑造和培养受教育者的过程中，教育目标逐步成为现实。作为思想品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大学德育，对教育的阶级性、社会性的体现尤为深刻。德育目标就是对教育的阶级性、社会性和教育目的的反映，它决定了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什么类型的人才，即高等学校通过德育工作把大学生培养成具备何种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规格的人。大学德育目标，对选择大学德育的内容，实现大学德育的任务，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在教育目标日益明确的同时，德育目标也不断在明确、发展和完善。在这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关于大学德育目标的确定和实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努力探索大学德育目标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以便指导我们把新时期的大学德育工作做得更好。

### 一、建国以来大学德育目标的确立与发展

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创立和诞生，另一个政权的毁灭和倒台，同时也意味着一系列文化、经济、社会因素的改造与诞生。由于以往德育的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道德、新伦理的根本区别，一些陈旧的、腐朽的德育内涵必然要被摒弃，而

反映无产阶级对新一代的要求和期望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德育目标，便在这种弃旧扬新的过程中产生了。随着新中国历史的曲折发展，大学德育目标也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其中，有稳定、有秩序，也有动荡、有混乱，既有丰富宝贵的经验，也有惨痛可叹的教训。

### （一）建国初期高校德育目标的形成

这一历史时期的划分是从 1949 年到 1956 年。这一阶段，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保卫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重要任务。这时，中国人民为了保卫家园，奋起抗美援朝；同时，广泛开展了土改、镇反运动，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段历史，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德育目标。

1949 年初，毛泽东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提出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后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其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的公德，也是确立大学德育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

1949 年 12 月和 1950 年 6 月，先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提出“高校培养目标应当是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要求高等学校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并把这一要求列为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暂行规定》总纲中高等学校任务的首要条款，明确把思想政治教育正式列入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予以法制化。社会主义大学德育目标的总体方向和要求的确立，无疑为以后各个历史阶段德育目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来看，当时的大学德育目标主要有以下内容：

培养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党的思想感情；

树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站稳阶级立场，培养国际主义精神，仇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即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服务；

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

以上每一点，均是从改造旧社会、旧道德，建设新社会、新道德的需要出发的，从而推动了建国伊始社会舆论与风气的转变和一代新人的培养。这一时期的大学德育工作广泛鼓起了学生对新社会、新事物的兴趣和热情，推动大学生逐步达到崭新的思想面貌和精神境界。从广泛意义上来看，为整个政权的巩固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

## （二）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高校德育目标的曲折发展

这一时期的历史划分是从 1957年到 1965年。随着整个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高校德育目标也出现了变动和发展。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鉴于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此时，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成为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对高校德育工作而言，一方面，已有了建国初期 7年的德育工作经验，另一方面，环境、形势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因而，德育目标必须有新的表述和更高层次上的发展，以便与社会现实相契合。

1957年 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了大学德育的培养目标应该包括以下几点：（1）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拥护六条政治标准，最重要的是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2）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3）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和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之间的关系；（4）要树立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后来，由于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等因素的影

响，又提出了一些过高过急和不够全面的德育要求，使大学德育目标渐渐脱离实际。

1958年4月，党和国家提出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集体主义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把政治觉悟放在首位。与此同时，受到国内形势发展的影响，高校实行“教育大革命”，在德育中，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左”的作法和要求越来越明显。德育目标也更加脱离学生实际，要求学生“红透专深”，把“红”作为政治概念确定为对学生的德育要求。在这样的气氛下，讲“红”保险，讲“专”危险，而且还忽视了对学生的基本道德素质的培养。这就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1960年后，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以前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反省。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要求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是这一历史阶段对大学德育目标的最完整的表述，所提要求也比较切合实际。但同时，“知识分子劳动化”、“红透专深”这些过“左”过高的要求依然存在。

此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又使高校德育中一度出现的“左”的倾向抬头，并有了新的发展。德育被逐步纳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阶级斗争教育成了整个学校教育的中心课题，要求学校培养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的反帝反修战士。同时，进一步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形成热潮。学生们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得到强化。

这一历史阶段，先后开展了学雷锋（1963年）学王杰（1965

年）学焦裕禄（1966年）等活动，树立典型人物，促进了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培养了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这十年德育目标的发展是曲折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高教六十条》中所提出的德育目标是较为全面、完整和有代表性的，但由于国家整体工作重点并未真正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政治运动不断，实际上德育要求主要偏重政治要求，而忽视了多方面的品德培养。政治活动过多，劳动过多，要求又过过高急，导致了空头政治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泛滥。

###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德育目标遭到破坏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9月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知识分子当成了“革命”对象，使整个高校工作陷入混乱，并殃及整个大学德育工作。同时，“文化大革命”对过去17年高等教育的成就全面否定，认为建国以来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占统治地位，是为培养“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服务的。在这种情况下，前两个历史时期提出的德育目标已无法坚持下去，出现了政治变异情况下的畸形的德育目标，即“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代替一切”“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把各类大学办成政治大学，只“办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斗走资派的战士”等等。这就是“四人帮”为高等学校所设计的“培养目标”。

在这种错误的目标导向下，学生被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方面，鼓励学生热衷政治，号召他们去“夺权”，说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另一方面，又要学生蔑视一切权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鼓吹无政府主义。同时，又把盲目迷信、个人崇拜等观念极力灌输给青年学生。高校德育成为“四人帮”用来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篡党夺权的工具。在实用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大学德育目标并非按教育规律确定，而是按“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很多提法相互矛盾，是对建国以来大学德育

目标的彻底背叛。与当时整个国家发展状况一样，尽管有人抵制这些错误思想和做法，但是由于整个指导方针的失误，大学德育目标仍然无法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困境。

#### (四) 拨乱反正后，高校德育目标的恢复和发展

从1978年开始，高校德育工作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消除“左”的思想影响的基础上，正确的德育目标得以恢复，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定要围绕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使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处理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他强调了毛泽东提出的“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培养目标，同时，准确地阐释了“红”的概念和标准，为清除在德育目标上“左”的影响起了关键作用。

这一时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使高校德育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指导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促使高校德育从根本上端正了方向，为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提供了契机。高校德育也开始出现较为科学的目标体系。

1980年4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发扬爱国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

二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以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为重点。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都为高校德育目标科学化提供了根本的指导方针。1987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对这一阶段的德育目标作了最完整的表述：“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应当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应当热心于改革开放，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应当自觉地遵纪守法，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应当勤奋学习，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还要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决定》既贯彻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精神，又对大学生提出了较高的德育要求；既提出了基本的德育目标，又提出了先进性的德育目标，一改过去德育目标缺乏层次性的弊病。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德育目标的方向是正确的，对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高校德育工作步入正轨，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也引导了一大批大学生走上了德才兼备的道路。但是在70年代，青年人的思想经历了从失落、迷茫到反思的过程，很难一下子找准人生坐标；进入80年代，在打开国门的同时，西方各种思潮乘虚而入，西方哲学思想一下子引起了年轻一代的极大兴趣，他们饥不择食，贪婪地吸收着这些外来文化，来不及细辨滋味。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高校德育工作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对象的变化，方法落伍，内容陈旧，对青年难以起到引导作用。到80年代后期，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忽略了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使高校的德育工作实际上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放松，引起了学生思想的混乱，这也是1985年、1986年底和1987年初到1989年









目标的时代性,是基于对现实社会和未来发展的清醒认识而言的。脱离了对现实社会的理性认识,没有对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德育目标的时代性就容易丧失。因此,在新形势下,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时代发展来调整德育目标。

### (三) 层次性原则

确定大学德育目标不能不考察大学生的知识水平、思想认识和身心发展等实际情况。然而,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社会环境影响等因素往往导致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不尽一致,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针对学生本身的不同水平层次,德育目标必须分层次提要求,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不能一刀切。要因人而异,有针对性,既不迁就落后,也不过分拔高要求。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学生年级不同、需求不同的客观现实,在大学生政治觉悟、思想道德、心理素质等方面设计不同层次的目标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sup>⑩</sup>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而言,层次性原则是实事求是的要求,只有按学生的不同情况,分层次提出目标,才能使目标更科学、更完善。

从社会环境角度而言,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同时,多种意识形态也并存,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依然存在。整个社会道德是以社会主义道德为主体,多种道德水平层次并存状况,既有属于较高层次的、代表未来方向的共产主义道德,又有在全民范围内、作为调整个人与社会、集体、他人关系的社会主义道德,还有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以及封建传统的道德等等。针对目前这种多元道德的存在,教育目标的多层次也就十分必要。层次性并不是羁留于现存状况,迁就落后,停步不前。而是以现实为基础,既源于现实,

又高于现实，对处于不同道德水平和层次的受教育者提出不同的目标和要求，使每个人都能在原有起点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逐步前进。

#### (四) 相对稳定性原则

确定大学德育目标，既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又要以史为鉴，注重历史的继承性。在过去的德育目标体系中，许多被历史证明较为科学的提法，许多对大学生的基本要求，至今仍在沿用，如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的培养等，这就体现了我国高校德育目标的稳定性和一贯性。坚持德育目标的相对稳定性有利于在几代人之间形成共同点，有利于优良传统的继承，有利于形成全社会整体一致的文明和共同的价值取向。德育目标的基本内容反映了大学生思想品德结构的构成要素。只要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我们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要求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是德育目标体系中保持稳定性的内容。

任何事物在发展的同时又是相对稳定和静止的，作为社会发展产物的高校德育也不可能时时求新、时时求变，它必须在保留一部分基本内容的同时，适应时代要求，补充新的内容。德育目标的相对稳定性，体现的是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在继承以往优秀的传统的同时，又注重时代性。就我国现阶段的德育目标而言，对学生的基本思想品德素质必须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来要求，这是不会变的，是德育目标的最基本内容。坚持将这些要求贯穿在整个德育过程中才能真正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的具体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会有发展和变化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不断会有新的内容来充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其稳定性又是相对的。

### 三、大学德育目标的实施

#### (一) 正确实施德育目标必须对大学生正确估价

大学德育的对象是在校大学生，德育目标就要针对大学生的实际提出要求。只有正确估价、分析、评价学生的主流和支流、优点和不足，对他们的情况有了准确的把握，德育目标才有正确制定和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因为德育目标是对整个大学生群体提出的要求，因而必须正确估价大学生的整体状况。在考察、分析的过程中，要把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时代特点结合起来，透过时代特点看年龄特点，对青年多一些理解和尊重；把多数与少数区别开来，主要要看学生的本质；把发展的和后退的联系起来，主要看进步的希望与可能性；把稳定的和暂时的区别开来，主要看学生身上稳定的东西。建国以来我们对大学生的估价大部分时间是客观、准确的，德育目标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实施，但是也有失误。德育工作在自身不断完善充实的同时，要多调查、多了解、多分析学生，使德育目标的提出和实施有科学的依据。如果对学生的整体评价失误，便会使学生离德育目标越来越远，德育越来越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在变革的时代，要准确把握青年学生的思想特点是比较困难的。有些人认为，大学生是“抱大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对大学生持怀疑、否定态度，作消极评价；另一些人则对大学生大加赞誉，却看不到大学生本身的不足。这种极端现象，离正确估价大学生相差甚远。事实证明，过分看重大学生身上的弊病，德育工作就很容易陷入“找病”、“防病”的死胡同，极易引起大学生反感，“治病”的效果必然很差；而对大学生片面赞赏，不讲疏导，任其自然，也会招致大学生们失望，从而出现迷惘、盲从心态。只有对大学生的整体情况有了准确评价，才可以准确规范德育目标的起点和最高要求，德育目标也才能切合实际，使学生们感到自己通过努力可以达到。这样，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发挥主观能

动性，则有助于德育目标的正确实施。

## (二) 正确实施德育目标必须科学处理目标的整体性与层次性的关系

德育目标首先是对大学生整体的要求，但在实施德育目标时，则要处理好整体性与层次性的关系。

德育目标是整个人才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规范着学生这一群体在政治、思想、品德上的培养规格，对整个德育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高屋建瓴的单一德育目标，不能适应学生不同情况的要求。教育者必须考虑到学生从中学到大学转变的不同环境和大学与中学、大学各年级的不同要求，以及不同学生的接受能力、原有水平的差异，适度要求学生。同时，要把教育者所希望的德育规格与经过培养，学生能达到的德育规格区别开来，把学生可以逐步达到的目标要求与一步能够到位的目标要求区别开来，以提高德育目标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有效性。

根据层次性原则，整体性的德育目标是可以分解成不同层次的。如前苏联在其德育目标中，除要求培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人才外，还明确要求一年级大学生“在班级建立集体主义关系，培养社会主义集体生活的习惯和行为文明”，“具备合作精神”。二年级要“具备爱国主义的理论知识”。三年级要具备“爱国主义的知识体系”。这样不断加深、逐步提高，要求明确，易于操作，是值得我们在实施德育目标的过程中借鉴的。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之前，不大注意德育目标的层次性，往往提出单一性的要求，标准又偏高，收效不佳。拨乱反正以后，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发布以后，大学德育目标的制定区分为基本目标与先进目标；在实施中又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分别制定德育大纲，分步、分层实施，在达到整体目标要求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三) 正确实施德育目标必须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质

我国德育目标的先进性原则要求德育必须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一直是我国高校德育的重要特色，也是我国高校德育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德育目标不仅应包含政治方面的要求，还应包含思想、道德、心理等方面的要求。思想品德的科学研究证明，人的思想品德是由心理形式、意识内容和行为能力等要素构成的，而意识内容又包含道德观、人生观、政治观、世界观等。因此全面提高学生的德育素质就是要使学生不但在政治修养上，而且要在道德文明上都有提高，只有学生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其政治信仰才有坚实的基础。德育本身是集政治、思想、道德、心理素质等教育为一体的，它所要求的是这些方面综合素质的提高。

在以往教育发展过程中，一度出现重政治培养，轻道德修养和心理素质培养的情况。在高呼政治口号、掀起政治狂热的同时，争权夺利、损人利己等不道德行为相伴而行。基础道德文明的缺乏，导致当时和其后一段时间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这也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社会带来的沉重灾难。事实证明，缺乏社会主义的道德修养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也会导致政治信仰的动摇和丧失。

在国外的道德教育中，如在美国和日本，往往是在文字上弱化政治概念，而强调学生个人素质的培养，然后在这种个人素质培养中渗透进本阶级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在德育的政治方向性与学生整体道德素质的培养上注重渗透性，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和熏陶。这种方式常常比单纯的政治说教易于为学生所接受，易于达到德育的预期目标。这也是我国高校在实施德育目标的过程中值得借鉴的。

(四) 正确实施德育目标必须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校德育目标在考察社会要求，发挥服务功能，注重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上，是适应了社会共同要

求的。如注重从整体上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去改造思想、进行教育，这些都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而提出的对全体学生的共同要求。这种共同性的要求，有助于培养一代人的整体素质和精神面貌，使同一代人之间易于沟通、易于一致。社会性、共同性是基于社会发展对一代人的整体要求而产生的，它既是德育目标社会性、阶级性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

但是，在如何强调社会性和共同性的目标上也曾出现失误。如片面强调目标的社会性，强调学生适应社会要求，而忽视学生个性的发展，轻视个性，甚至打击个性、压抑个性，不注重引导学生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发展个性是发展人的创造性的基础。缺乏个性、丧失个性的学生往往缺少开拓性和创造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我们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开拓型、创造型人才，而不是要我们造就“谦谦君子”。可见，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学生个性，已经成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只有让学生个性充分发展，才能激发他们在思想品德上不断自我完善，使之适应现代社会道德生活、精神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需要。

坚持共性，可以使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有较为一致的正确判断，保证其主流发展健康；尊重学生的个性，又可以使学生在具备了一定政治觉悟、良好道德素养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因此，坚持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既是社会发展主流的要求，也是学生个体发展的要求。

在德育目标的实施过程中，坚持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的统一，要求教育者对学生的个性、特点要有切实的了解和分析，既不放松对学生的整体要求，也不排除学生的个性需要，努力为学生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如果我们的学生个个都是“合格+特色”的人才，那么，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便大有希望。

(五) 正确实施德育目标必须坚持德育目标的稳定性、一贯性

## 和连续性

德育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德育目标是通过德育过程来实现的。为达到一定的目标，要求学生在德育过程中，将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观念和道德要求内化于心，又外化为自己的行动。这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认知、体验过程。所以，我们在确定德育目标时要坚持稳定性原则，在实施目标时则要坚持不懈地保持一贯性。

坚持德育目标的一贯精神，至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加强的前提下改进、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德育目标中的好东西、基本精神应有稳定性，不应大起大落、朝令夕改。当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在切合时代要求，变更、增添新的德育目标内容时，不能因此冲击整个德育目标的基本内容和框架。

我国高校德育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紧密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这一点是不容动摇的。但在强调服务功能的同时，也应当尊重德育本身的规律，尊重学生成长的规律，保持德育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坚持目标的一贯精神。服务于中心与尊重教育规律是一致的，不应将二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反动政治，完全否定高校德育的相对独立性，要把学校办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急于把学生培养成一部分争权夺利的打手、小卒，德育成了附庸、仆役，完全不顾学校教育的客观规律，只受政治局势和政治任务的制约，德育目标也难有较为稳定的内容，一些必须培养的基础道德文明也被忽视，根本谈不上保持德育目标的一贯性、连续性，也很难促进社会几代人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最终导致德育目标的丧失。

在德育目标中，需要有切合时代的内容，但不能因之而急功近利、片面追求适应现实需要而削弱基本目标。否则，一旦国家政治局势、经济状况发生急剧变化，社会舆论出现误导时，德育往往张惶失措，极易随之出现失误。坚持德育目标的一贯性是在

强化服务功能的同时保持德育的相对独立性，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办事，注重对学生进行不间断的基础道德文明和基本政治素质的培养，提高学生分析、判断、鉴别的能力，通过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四、跨世纪人才培养的德育目标导向

鉴于确立大学德育目标的先进性、时代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原则，新时期德育目标继承以往德育目标中的科学内容，保持了稳定性、连续性。同时，基于世纪之交的时代特征，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以什么样的面貌跨入 21 世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站在历史的高度，必须精心确立跨世纪人才培养的德育目标。

##### (一) 坚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大学德育目标的理论基础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大学德育作为培养人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也离不开用基本的政治理论来教育、培养学生。这是制定大学德育目标首先应考虑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当然，也是高校工作包括德育工作的根本指针。坚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武装学生头脑，是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至整个德育的根本内容和首要任务。把这一理论作为大学德育目标的理论基础，既符合我国学校德育的先进性、阶级性的要求，又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所要求的现代化素质培养的需要。

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大学德育目标，就是要在德育目标中明确要求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学

生思想实际出发，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指导学生逐步学会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现象，评价各种社会思潮，从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党的十四大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条基本路线恰恰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依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坚持这条路线不动摇，关键就在于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是否真正掌握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武器。如果我们在德育目标中强化这一理论指导，就能引导学生认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二) 必须强调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统一性、一致性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德育的重要内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立场、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德育的重要目标，而在跨世纪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中，要注意把三者统一起来，强调其一致性。

共产主义者对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一向是统一的。如果不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就不可能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终解放自身。她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不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就根本背弃了共产主义的原则。从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来看，不争得并捍卫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更谈不上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迈进。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千百万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道路。因此，在德育目标中这些教育既是分层次递进的，又是相互联系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爱国品质，是实施德育目标的“龙头”、起点和基础，有利于引导学生关心祖国

命运，探索、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兴国、富国、强国之路。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进而信仰共产主义，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升华的过程。强调三者目标上的统一性、一致性，对巩固、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是十分必要的。

### (三) 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现代观念和超前意识

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教育是在传授人类以往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使人们掌握适应现实社会和驾驭未来社会发展的能力，以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德育是使人社会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以符合现存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政治原则去教育和训练学生，以便使他们顺利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时代要求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也在不断发展。因此，培养大学生的现代观念和超前意识必须作为德育目标的重要导向。

从我国内部情况看，现实社会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从世界范围来看，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现代社会较之以往任何人类历史阶段的发展都要快得多。跨进 21 世纪，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先又是人的观念现代化。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思潮在出现、争论、消失、发展，一些旧的思想观念已和时代发展格格不入。摒弃落伍的、陈腐的旧观念和旧思想，用尽可能多的现代思想和观念来充实德育内容，已成为确立跨世纪德育目标的重要任务。德育目标唯有包含面向未来的超前性要求，才能激励学生的主动追求，才能真正发挥引导作用。

在现代社会，价值观念、效率观念、时间观念、人才观念、竞争观念等都已发生了极大变化，德育如果不注重分析现实要求和

未来需要，就会和社会发展脱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德育也是如此。面向现代化，要注重培养学生现代观念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整体素质。面向世界，要培养学生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既善于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又善于辨别、抵制腐朽和反动的糟粕。面向未来，则应使大学生具备接受未来社会种种变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适应未来社会要求的基本知识和观念。

#### (四) 注意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创造性、超前性总是和继承性相辅相成的，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的遗传程序，德育也是如此。重视德育，强调做人以德为本，德才兼备，是中国历代教育的一个共性。中国历史上，做人的道理和学校的德育规格不仅造就了一代代知识分子，而且又以知识分子为载体，一代代传承下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美德。

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sup>①</sup>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从总体上来说，是过时的，现代社会需要发展民主平等的人际关系和伦理关系，应剔除旧时以皇权为核心的宗法等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伦理关系。但是，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反映统治阶级道德意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类共同具有的某些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人民性。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在剔除其封建糟粕的同时，是可以汲取许多宝贵的精华，而具有现代伦理价值的。

中国古代的德育目标是十分丰富的，要求学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重义轻利；在个人品德修养上要“吾日三省吾身”；在人格上，要成为“君子”，做到知行统一，在行动上“积

善成德 ”等等。研究中国古代的德育目标，以今天的实践标准加以取舍，把优良道德传统和在人民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新道德规范结合起来，并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就可以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并体现时代精神的大学德育目标体系。

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美德是跨世纪人才德育培养规格的重要内容。有了这种继承性，就能使民族发展中的优秀文明成果在新的世纪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但是，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既防止民族“虚无主义”，又要克服“国粹主义”，要使学生摒弃“闭关自守”、“狂妄自大”的狭隘民族心理，形成向一切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世界意识，促进民族间、国家间的友谊、交流和共同进步。

## 注释

- ①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6页。
-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 第三章

### 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确立与实施

大学德育方针是为实现大学德育目的和任务而确立的，是制定德育原则和方法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大学德育原则是为了实现德育目标，贯彻德育方针，在德育教育过程中正确观察、处理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德育方针指导、规定着大学德育原则、方法的制定与实施，同时，德育原则、方法又体现和执行着德育方针。它们是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的。德育方针、原则的制定虽属人们的主观认识，但正确的德育方针、原则应是德育客观规律的反映，体现着德育的本质。

德育方针、原则是在长期的德育实践过程中，通过总结经验、认识规律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建国后，高等教育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学德育也相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天，在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全面回顾、认真总结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确立和发展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加深我们对大学德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好地指导我们加强、改进新时期的大学德育工作，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 一、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确立及演变

##### (一) 大学德育方针的确立

在建国初期，我们对旧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根本上进行了改造，把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性质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截然

区别开来，并把人的培养问题和思想建设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中央曾一再指出：必须针对学生的思想情况，用具体的事实，采用启发说服的教育方法，按学生的年龄、经验、接受能力，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反对脱离学生实际，空洞抽象的说教。并强调做思想工作切忌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做法。这为德育方针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党的“八大”正确指出了我国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主题。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又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sup>①</sup>。毛主席还说，“在1942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并指出，“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他“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sup>②</sup>。

同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sup>③</sup>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

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从而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同年4月的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运用和风细雨，交心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的，使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起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正确的方针，它表明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教育的方针已基本形成。这对于大学德育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正确方针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尽管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中央反复强调不要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的复杂形势下，由于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历史形成的政治经验和习惯力量，党的各级领导还是走上了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的道路，把历史转变时期新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出现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这是建国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大教训，说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艰难与实现思想教育方针转变的不易。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为高校德育工作开创新局面提供了转机。1978年，邓小平同志说：“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他批评有些人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和压制，对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加以坚决制止。他还指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sup>⑩</sup>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新时期德育方针的确立指明了

方向。198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指出:“对于干部和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要坚持实行疏导方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简单粗暴、堵塞压制。”1982年,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疏导方针进一步进行了解释,他说,我们要坚持疏导的方针,反对堵塞的方针。疏和导的方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针。我们要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又疏又导。疏通就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引导就是循循善诱,说服教育。由此可见,在拨乱反正开始不久,疏导方针作为新时期思想教育的方针已经确立。它是我党长期思想政治教育正反两方面丰富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5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教育方针的继承和发展。它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时,为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目的,必须坚持民主的方法,采取疏通与引导相结合即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说服教育、循循善诱的方法。疏导方针指导我们在德育工作中确立正确的原则、选择正确的方法;同时,一切正确的原则和方法都必然体现疏导方针。疏导方针的确立,表明我们党对德育的客观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二) 大学德育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高等学校德育原则是高校德育工作规律的具体体现,是德育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准则。高等学校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德育原则。

### 1. 方向性原则

方向性原则是反映大学德育本质的一条原则,它最直接、最集中体现教育的根本目的。我国高等学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引导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批判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

建国伊始,德育的方向性原则就受到人们重视。1950年,第一届全国高教会议指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以理论与实际一

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国家建设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高校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知识教育。并针对部分学生中当时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如有的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存在享乐至上的思想，有的有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有的存在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等等，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斗争，还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在实际斗争中认清剥削阶级的丑恶本质，从而提高政治觉悟，克服错误思想。可见德育的方向性原则在建国初期就已确立。1957年，毛泽东告诫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他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sup>④</sup>他经常教导青年学生，要正视国情，认清人民的事业、国家的发展前途和个人的责任，要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既不当“空头政治家”，又不做“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在制定德育原则时始终坚持这一政治方向，把塑造什么人、如何塑造人这一根本问题放在首位，使德育的方向性原则能始终得到一贯的坚持。直到现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仍然是大学德育的一个重要原则。正如《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的，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也指出：“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深入进行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逐步确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些指示对德育原则的确立都有长远指导意义。

## 2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提高大学德育有效性的重要原则。德育一方面要有计划地系统地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又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从事社会实践的锻炼，把理论教育

和社会生活实际、学生思想实际结合起来，帮助大学生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化，形成知行统一、言行一致的思想品德和高尚人格。

早在建国初期，《共同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践的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既是教育方法，也是教育原则，是对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扬。1942年的延安整风坚持了这一原则，取得了整风学习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又重申这一原则，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中贯彻了这一原则，对大学生进行了系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集体主义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要求教师根据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原则，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学生的思想，搜集、整理、研究各种问题，然后针对主要问题，运用系统的理论知识有的放矢地加以解决，使理论学习成为改造思想的武器。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后，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开辟了广阔的道路。80年代兴起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更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动体现。可见，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原则反映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新中国一贯倡导的德育原则。

### 3 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主要是调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两个积极性。这一原则的侧重点是自我教育。大学德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使大学生学会自我教育，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讲的，教是为了不教。

50年代初，党在全国高校中进行了一次较为集中的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周恩来同志亲自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号召高校师生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学习，做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这次学习运动是建国以来在高校师生中进行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自我教育运动，所采取的方式是：自我批评与群众批评相结合。由于学习目的明确，方式方法对头，师生自觉地以自我批评为主，教师间、师生间、同

学间相互热情帮助，因而取得了很大成绩。通过这次学习运动，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大增强。

到了 80 年代，由于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自我教育的作用体现更为突出。在大学生乐于参加的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各种表演竞赛活动中，学生自我参与的积极性极为高涨，他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通过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实践证明，教育如果不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其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愈高，教育的效果愈好。

#### 4 言教与身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要真正说服人，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所谓真理的力量，就是教育者讲的必须合乎实际，反映事物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的趋势；所谓人格的力量，就是教育者必须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带头实践自己提倡的道德标准与价值规范。

建国初期，我党就非常重视高校教师的思想、业务学习，要求教师要“管教管导”，“教书育人”，起表率作用。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正式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学校领导人员要尽可能在生活和劳动中间同学生打成一片。党和团的工作者、学生政工干部和政治课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曾一度形成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政工干部与学生打成一片，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思想状况，从而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高校广大政工干部与学生骨干一起，在艰苦奋斗的教育中，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对于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战胜困难，共度难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大家回顾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还赞不绝口，其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很好地贯彻了以身作则的原则。

#### 5 正面教育、榜样激励原则

正面教育、榜样激励原则就是要求在德育过程中，主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引导和影响学生，用榜样的事迹、形象去激励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发挥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革命传统教育。在教育方法上注重正面启发，循循善诱，树立先进榜样，鼓舞学生追求上进。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最基本、最生动、最有效的方法是开展树典型、学先进的活动。在五六十年代，我党培养和树立了一批又一批先进典型，如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大庆“铁人”王进喜，中国的保尔吴运铎，“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伟大而平凡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爱国科学家李四光，等等。各条战线的模范人物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分子，他们产生并生活于群众之中，他们的事迹群众熟悉，易于学习，是最实在、最具体的活教材。

高等学校在运用榜样的力量对学生进行教育时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 50年代学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60年代学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和学大庆、学解放军；80年代学张海迪、张华、朱伯儒，学华山抢险英雄集体，学老山前线英雄群体等等，都对大学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特别是 60年代前期的学雷锋活动，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效果之好，都是空前的，在整个大学生中树立了一代新风。

#### 6 严格要求与热情关怀相结合的原则

教育者要全面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他们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关怀，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提出：“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sup>⑩</sup>并向青年发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把“身体好”放在第一位。可见毛泽东对青年成长的关心。毛泽东对青年的关怀更表现在对青年的信任与作用的论述上，他

对青年大学生满怀深情地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sup>①</sup>但是，青年同老年相比，显得幼稚，尚不成熟，知识不足，缺乏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年轻自负，好走极端，爱轻率下结论；不了解过去，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等等，往往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容易迷失正确的方向。因此，江泽民同志在 1990 年 5 月 3 日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报告会上讲话指出，党和国家对青年知识分子“一贯采取热情关怀和严格要求的态度”。在大学德育中必须把严格要求与热情关怀结合起来，既充分相信学生，又严格要求学生；既充分肯定他们的长处与优点，又恰当地指出他们的不足与弱点；既热情关怀，又不迁就；要严格要求，但不苛求。运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学生，教育学生，就能使师生增强相互理解，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 7. 一致性与连贯性原则

学校、家庭、社会以及学校内部各个部门对学生的教育影响在性质和方向上要保持一致。大学前、大学后及大学学习的各个阶段上的教育要注意循序渐进，相互衔接、首尾连贯。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社会风气较好，又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管理，大、中、小学德育都强调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原则。一方面，强调学校在上级党委、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下，发挥主导作用，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形式，引导大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参加各项社会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大学生到工厂、机关、学校实习，社会各有关部门都很支持，且不收费；高等学校开展学习解放军和学大庆、学大寨的活动，把工农兵的思想工作经验运用到大学德育中去。这些学校与社会相互配合的行动，对于推动校内校外形成德育合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除了恢复、发扬这些好的作法外，还加强了对大、中、小学德育衔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大、中、小学学生守则和德育大纲，正在分别实施或试行。《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对这些经验加以总结，指出，“学校要主动同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密切合作，使三方面的教育互为补充，形成合力”，“动员、组织、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学校做好德育工作”。还指出：“各种教育内容的深浅和侧重点，要针对不同年龄及学习阶段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有所不同，逐步提高。各教育阶段的德育课程、教学大纲、教材、读物、教育和管理方法、学生思想品德表现的评定标准及方式等都要据此加强整体衔接，防止简单重复或脱节。”

## 8 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在意识形态上消除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思想影响，适应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需要建立一支精干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与此同时，却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只靠专门德育队伍去做就够了，同其它课程的教师和其他教育（如智育、体育、美育等）完全分割。这种“分割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带来的问题，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似乎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被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所掩盖。而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容易被忽视，迫切要求全体教师发挥教书育人的积极性，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教学工作结合起来，要求各个学科结合各自特点，有机地渗透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专业学习与今后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为谁服务的问题。要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有益的文化知识，抵制一切消极的东西。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学校要进一步发挥全体教职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作用，尤其是要“按照不同学科特点，促进各类学科与课程同德育的有机结合”，力求“在教育改革中积极探索，总结经验，并及时加以规范，形成稳定的机制”。贯彻这一原则才能较好地解决思想工作与业务工作长期存在的“两张皮”现象，以及政

工干部“单打一”的局面。这是德育以及整个高等教育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贯彻这一原则才能把德育落实到业务上去，有力地克服脱离实际的弊病，提高德育的力度和有效性。

## 9 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与宝贵经验。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写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论著，认为给予被领导者物质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从来就注意把发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与按劳分配原则结合起来，把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结合起来。但是，到6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一伙鼓吹“精神万能论”，合理的个人利益遭到否定与批判，把贫穷与社会主义划上等号，结果思想政治教育成了“假大空”，这种情况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败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象和声誉。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sup>⑤</sup>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确立，对加强和改进德育以至整个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学生最根本的利益就是成才，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才。所以许多学校都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成才教育结合起来，鼓励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品德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全面提高，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又把思想教育与物质鼓励结合起来，广泛开展评“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和优秀干部的活动，开展评选文明班级、文明寝室的的活动，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

给予物质奖励。同时，还在大学生中实行奖学金制度，开展奖优罚劣活动，免收家庭困难学生的学杂费，不少学校还为特困生设立了助学基金，并为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方便。这些对于鼓励大学生奋发学习，健康成才，起了良好的作用。大学德育坚持了物质利益原则，使德育工作的活力大大增强。

#### 10 层次性原则

我们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历来有注意针对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做深入细致工作的优良传统。但由于建国后较长时期“左”的思想影响，对这一优良传统继承发扬不够，主要表现为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过高过急，不分层次地“一刀切”，使德育工作往往事倍功半。虽然在1961年《高教六十条》中提出“不能操之过急，对于不同的人，不能一律要求”，但并未真正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在新时期确立层次性原则指明了科学化的方向，他要求“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sup>④</sup>”。1986年9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从此，层次性原则得以确立。1987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把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明确区分出一个基本要求、一个先进性要求。许多地方的高等学校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制定德育实施纲要或规划中，更是针对不同专业、不同水平甚至不同年级，区分出具体的层次，分别提出不同的目标要求，安排不同的德育内容。比如，清华大学从政治思想上把学生区分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个层次和阶梯；在道德观上把学生区分为社会主义人道

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三个层次，并总结出鼓励先进、团结多数、共同向上的经验，在全国高校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上述这些原则，是建国以后在继承学校德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高校德育卓有成效地开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实践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对德育规律的认识还会不断加深，大学德育的方针原则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得到丰富与发展。

## 二、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实施效果

### (一) 大学德育方针的贯彻情况

回顾大学德育方针的贯彻情况，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进一步贯彻好德育方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1. 正确实施大学德育方针，必须坚持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作指导

今天我们讲的疏导方针，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依据的。疏导方针是过去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运用的“团结—批评—团结”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继承和发展。疏导方针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待人民群众的正确态度，也符合人们思想活动的发展规律。大学生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加之他们正处在成长阶段，对他们进行德育工作更应该坚持疏导方针。

建国以来的多数时期，我们实施德育方针的情况是好的。但也有少数时期出了偏差。比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大学生错划为右派分子；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高校将个别所谓“思想反动”的人定为“反动学生”，等等。尽管当时党和政府声称不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但在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受到不应有的劳动教养等处分。而到了“文化大

革命”时期，公安部门更是直接把这些列入“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而予以专政。之所以德育方针在有些时期得不到正确实行，根本原因是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形势分析失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因此，背离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指导，高校德育就会走向歧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疏导方针。即使在处理非法组织、非法刊物之类的问题和高等学校出现的事端包括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中，除极个别有明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者，以及组织和煽动闹事、扰乱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安定团结者，证据确凿的由公安、司法部门依法惩处外，对于一般参与活动的大学生，我们都严格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坚持贯彻疏导方针，进行切实的思想教育工作。对那些确实犯有严重错误的学生，在他们转变立场、有悔过表现的情况下，一概不究既往。因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由此可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实施德育方针的基本保证，今后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 2 能否正确贯彻德育方针，取决于是否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规律

疏导方针之所以是解决人民内部思想、认识问题，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确方针，还因为它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也符合青年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因而，要正确贯彻疏导方针，还必须努力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任何个体的思想品德都是由道德品质、思想品质、政治品质、心理品质构成的。而且这些品质的形成、发展不是无序的，而是随着个体成长的社会化过程先后出现和形成的，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成为一个有序递进、协调发展的整体。比如，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只有建立在一定的道德、思想和理论品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熟和坚定的。大学德育既

要根据学生在中学时代形成的思想品德基础,又要从不同年级、不同年龄阶段身心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不同成长阶段的实际需要,循序渐进,才能实现培养目标。

任何个体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外因和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思想品德已有一定基础,生理、心理和思维方式已日渐成熟,他们接受知识、信息的渠道也远比中学时代广阔。大学德育工作者只有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才具有针对性,才能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发挥疏导方针的威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发展“两因论”规律,认识到德育过程是个双向的思想、情感交流的过程,这就为贯彻疏导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过程,不仅是个认识过程,而且还是个实践过程。实施正确的德育方针,不但要把社会的要求逐渐“内化”为个体的思想、观念、理想、信念,而且还要把这种内在的认识、信念“外化”为行为习惯。一般来说,“文化大革命”前大学德育引导学生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实践锻炼都较好,但往往劳动、实践锻炼偏多,有时甚至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荒废了学生的学业。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种种原因,又出现了实践锻炼偏少、重理论而轻实践的现象日益严重。1987年以后,各地、各高校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引导大学生积极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疏导方针的全面引导作用,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

3 能否全面贯彻疏导方针,取决于对疏导方针是否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疏导方针在德育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长期存在的“左”的偏向得到了克服。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一度放松、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经在大学校园严重泛滥。于是,有的同志对疏导方针提出了质疑、批评甚至否

定的意见，认为疏导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应提疏导与灌输相结合，认为疏导只适用于经常性的思想工作，不适用于系统性的政治教育，认为疏导未包括灌输；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提疏导与思想斗争相结合，认为疏导不包括批评、思想斗争和必须的“堵塞”。应当说，这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是有益的。在贯彻疏导方针中，对思想战线出现的软弱涣散状态，或者由于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因而放弃了批评、思想斗争、法纪武器等现象提出批评是可以的。但若因为有人歪曲或片面理解疏导方针，就认为疏导不是（或不能作）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就未免有失偏颇了。

因此，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疏导方针，才能全面、正确地贯彻疏导方针。应当看到，疏导方针是一个容量很大的积极的方针。它在拨乱反正、批“左”反“左”的背景下提出，但并不是一个消极、软弱的方针。它是针对过去存在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打击压制等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错误方针而提出来的，是与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相联系的。疏导方针并没有排斥灌输、思想斗争和法纪处理，恰恰相反，它正是以灌输、思想斗争和法纪处理为自己的引导手段的。试想，如果离开了灌输、思想斗争、法纪处理，那么，它靠什么去引导呢？岂不成了疏而不导了么？灌输，在疏导方针中是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的灌输，不是教条主义的硬灌，更不是拿着教条当作帽子、棍子、标签到处挥舞，乱戴、乱打、乱贴。灌输主要是向人们头脑中输入方向、灵魂、思想理论武器，并以理论作指导，把疏通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分析，以便将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对符合实际的意见采纳之，不符合实际的意见将其引导到马列主义轨道上来，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思想斗争，在疏导方针中是实现在原则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手段。疏导不是“劝小姑”，特别是引导，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否则，也会变成只疏通不引导，结果是错误思想泛滥。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强调开展

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也就是说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引导的手段，是团结的手段，不是整人的手段，仍然需要充分说理，循循善诱，说服教育，而不是压服。可见，批评和思想斗争自然是包含在疏导方针之内的，是全面贯彻疏导方针的重要方面。法纪处理，在疏导方针中属于说服教育的辅助手段。对人民内部（包括大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法纪处理为辅。有的人犯了严重错误，触犯了行政纪律以至法律，该处理的都要依照法纪严肃处理。这与对敌人的专政是性质不同的，不但不违背疏导方针，而且也是疏导方针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疏与堵也是对立的统一，如果说法纪处理是“堵”，那是堵住了违法乱纪自由泛滥之路。“堵”是一种辅助的引导手段，是在特殊情况下才用的。而这时，处理了一人，教育一大片；即不仅教育本人从此不可重犯类似错误，而且也教育了其他人，懂得不可重蹈此人的覆辙。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才说：“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如果不这样去理解和把握疏导，便不能全面、正确地执行疏导方针。疏导方针既然包括运用正面灌输、开展积极思想斗争、辅之以法纪处理等手段来引导人们，当然在表述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方针时，就不必把每一种手段都与疏导并提，而只须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恰当选用必须的手段去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目的即可。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二大，对于思想战线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鲜明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不力。对于德育、思想政治教育方针来说，也是这样，只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疏导方针，才能防止和克服片面性以及疏导方针贯彻执行不力的问题。

## （二）大学德育原则的实施效果

德育原则是德育客观规律的反映，它所反映的不外是德育与社会大系统的本质联系、与平行系统（如业务管理系统）的本质联系以及德育本系统内各个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德育内容和目标、方法等）之间的本质联系。德育原则体系既然是客观规律的反映，那么，人们只能努力正确反映规律，尽可能全面地把握规律，而不能对德育原则采取随意性的态度。建国以来，高校贯彻执行德育原则的丰富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

1. 对大学生的正确分析和评价，是正确贯彻德育原则的前提。要正确贯彻德育的原则，取得良好效果，首要的是要把大学生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予以正确看待，既要正确估量形势，又要正确评价大学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脱离社会历史的要求及学生所处的环境，便不能对学生的思想动向和特点作出正确的分析。然而，若对形势估计错误，也不能正确估计大学生。建国初期，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估计也是正确的，认为他们多数经过思想改造和学习，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那时大学德育原则贯彻效果较好，充分调动了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自觉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走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以派划线，对学生吹捧一批、打击压制一批，全面破坏了德育的方针原则，使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整人的代名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逐渐恢复和发扬，大学德育原则体系逐步健全和发展。事实再次表明，大学生中一些量大、面广、反复出现的思想认识问题，都与社会思潮的动荡起伏有关。党的个别领导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估计不足，或熟视无睹，对大学生估计过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得力、不一贯，大学德育原则便得不到正确贯彻。相反，我们认清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需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坚



论上阐明了要“种牛痘”，“增强免疫力”，反对“在温室里培养人才”的道理，决定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面，但一些人在实际执行中却大打折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大学生不仅不能看《参考消息》，而且，诸如《红与黑》等一批外国名著在一个时期也不向学生开放。这种只管传导不管反馈，只是灌输不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独立判断能力的做法，不仅不能充分调动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而且难以增强学生的道德判断力和是非鉴别力。事实证明，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给学生“金子”不如教给“点金术”。

改革开放以来，德育工作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思维方式向唯物辩证法靠拢，贯彻德育原则更加贴近了社会生活和大学生成长的实际需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发表后，广大德育工作者开始懂得了“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更加注意了德育过程的双向交流，了解学生的反馈信息，加强书刊评介和阅读指导，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自我教育能力逐步有所提高，从而增强了贯彻德育原则的实效性。

3 防止和克服德育“自我中心”现象，是科学地实施德育原则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大学德育的主要弊端之一就是德育与智育脱离、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业务工作各自为政、互不相干。从根本上说，这一积弊源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时代，尤其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过分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拔高德育的地位，使政治凌驾于教学业务之上，逐渐脱离教学业务工作的实际，自成体系、自我中心；加上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未能发挥行政管理系统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导致政工人员“孤军奋战”，德育工作事倍而功半。建国之初，民主革命收尾任务较重，政治运动多，高校用了很大精力和较多时间抓运动，应该说，这在当时

是必要的，对于转变学生思想、端正政治方向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学生干部负担过重、专业学习受到较大的影响，为此，各高校也多采取了补救措施。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展以后，德育本应紧密结合教学业务工作一道去做，但是，1957—1958年以后，“左”的思想逐步发展，政治工作被逐步拔高。毛泽东于1958年初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1961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也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教学、科研和后勤工作中去。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事实上，德育与智育、思想政治工作与教学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象，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因为学生出现的思想问题多数与教和学有关，学习与成才是学生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德育如果与教学业务工作不紧密结合，就是脱离学校和学生的最大实际，不仅收效不佳，而且还因影响学生成才而损坏德育的声誉和形象。同时，对于解决学生在学习期间存在的学习、生活、思想上的问题，德育又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取代教学管理、行政管理、后勤管理上的职责，各项业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由各自健全制度、改进管理去解决。如果德育离开了业务管理、行政管理孤立去做，是苍白无力的；而各项管理制度如果离开思想教育也不能变成学生的自觉行动。“文化大革命”中把学校各项教学业务管理制度统统斥之为“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加以“砸烂”，思想政治教育就变成了鼓吹假、大、空的代名词。深刻的教训教育了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在科学解释红与专、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同时，还强调了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的原則。198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不要搞‘两张皮’。要

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经济活动和各种业务工作中去……”。1983年6月《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也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脱节便是无的放矢或隔靴搔痒，明确规定必须执行“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原则”。1987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也强调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教学工作结合起来。要按照各个学科的特点，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在校学习与今后工作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央的一系列文件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高等学校在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中进一步明确了，学校的中心任务是育人，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围绕育人这一中心来进行，并为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教学业务工作，既是育人的主渠道，当然也是德育的主渠道；教师不仅是教学的主力军，也是德育的主力军；成才教育是德育与智育的结合点，既符合国家的要求、学校的任务，又符合学生的切身利益和愿望；课外活动也要围绕这一中心，开展有益于学生成才的活动。总之，只有把德育渗透到育人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克服和防止德育“自我中心”和“两张皮”现象，才能使德育原则的贯彻实施走向科学化，收到实效。

4 坚持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是正确贯彻德育原则的保证。德育原则的正确贯彻是在不断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中实现的。坚持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是保证党的队伍团结一致的手段，当然也是德育原则正确贯彻的可靠保证。历史证明，在高校德育过程中，“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是经常发生的。其原因主要是德育工作队伍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不够高；经验不足，对大学德育的客观规律认识不清；资产阶级思想和错误思潮的影响等。在执行德育原则时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脱离，或者认识超越实际发展，表现为“左”的错误倾向；或者认识落后于形势而表现为右的错误倾向。而大学德育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往往又与党的领导工作，尤其是思想战线上的错

误倾向紧密相联。在反对错误思想倾向中要坚持实事求是，有什么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没有就不要硬反；在反“左”时要防右，反右时要防“左”，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较多出现的是“左”的片面性，使许多德育原则难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学德育在总体上反“左”防“左”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涣散软弱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的右的倾向，又使德育原则难以全面贯彻执行，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高校蔓延开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历史经验证明，大学德育只有正确地、及时地反对“左”、右两种倾向，才能保证各项德育原则得以正确地贯彻执行。

#### 5 注重加强德育队伍建设是贯彻执行德育原则的决定因素

建国以来高校德育原则实施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要加强德育队伍建设，提高德育队伍的整体素质。在党的路线正确的条件下，德育队伍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德育队伍总的来说素质较好，政治上坚定，思想作风过硬，处处以身作则，所以，德育原则的贯彻实施比较顺利，效果也比较好。比如，清华大学的德育工作队伍建设，40多年来一直坚持“双肩挑”的制度，使这支队伍既懂专业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还为党政机关和教学、科研部门输送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高级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由于商品经济负面效应，拜金主义的侵蚀，党内存在腐败现象，社会风气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高校德育队伍的建设。大学德育方针、原则再正确，总还是需要素质好的德育工作者去贯彻的。事实一再证明，哪里的党政领导干部、“两课”教师、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稳定，素质高，懂得教育规律，又以身作则，思想作风好，那里的德育原则就贯彻得好，德育效果也好。贯彻好德育原则需要有高超的理论、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需要有实践经验的积累，还需要形成结构合理的工作梯队。因此，不加强德育队伍建设，显然是难以担当如此重任的。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

是决定的因素。现在，整个宣传思想战线和教育战线都是大政方针已定，关键在于落实。可见，德育队伍的建设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对正确实施德育原则有着突出的重要性。

### 三、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发展趋势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学德育的方针原则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丰富的教育实践中发展变化的。遵照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对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成功经验加以吸收与继承；另一方面，它又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对大学德育规律更加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探索和发现新的方针、原则。总结过去，展望未来，面向 21 世纪实施大学德育方针、原则，必将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 （一）民主化趋势

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平等这一新型的政治关系，反映到学校教育中来，就决定了教育的民主化原则。我们党历来强调要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然而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使民主化原则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国人民正向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原则必将作为大学德育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得到强化。

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高校教育制度的深化改革，大学德育对象在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上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越来越具有各种自主权利的大学生进一步强化了主体意识，独立自主、平等参与成为大学生新思维的特点。他们的视野宽了，见识广了，在思想、政治上要求充分的民主权利，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求平等相待，在人格上要求相互理解、尊重和爱护，自我判断意识明显增强。高校招生、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大学生与学校的依附、从属关系转化为新型的平等契约关系，他们热切希望实行民主交流、平等对话的民主原则。教育民主、管理民主、学术

民主、师生关系民主是社会主义高校民主化趋势的必然要求。大学德育将引导学生参与高校的民主管理,加强学生的自我管理,在学生的参与中培养他们的民主素质。同时,疏导方针及其相应的一系列德育原则也只有在民主化得到真正加强之时,才能得到完美的实施。

## (二) 综合化趋势

影响大学德育过程的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从外部看,影响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学校、社会和家庭。今天,大学围墙纷纷拆除,大学德育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开放态势正在形成与发展中。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其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他们的思想品德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社会生活和信息的影响与教育。改革开放和竞争的社会环境,使大学生在思考自我的同时,更在关注社会,把完善自我与实现四化联系起来。大众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一方面冲击着封闭式的学校教育,一方面使大学生大开眼界。当代大学生获得信息渠道之多、数量之大、速度之快,都是以往大学生所没有的。它完全借助于社会、家庭和学校综合影响的作用。社会影响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潮、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是主要的。社会影响的性质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其影响的特点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是立体、多维和动态的。家庭的影响,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则是一种经常性的德育。家庭成员之间的教育,一般说来是易于接受的,这是因为家庭成员间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这种特殊的感情是教育的良好基础,具有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然而,由于经济状况、政治面貌、文化教养、生活环境的不同,其家庭教育的影响也是千差万别、纷繁复杂的。学校的影响是主导的,它是按照社会要求,从学生思想实际和特点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计划性、针对性和可控制性。但是,如果学校无视社会、家庭的巨大影响,而闭门造车,自行其是,往往是达不到理想的教育效果的。可见,学校、社会和家

庭对大学生的思想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各具特点,又相互联系,彼此制约。三者对学生影响的一致性与不一致性的矛盾运动,直接关系到大学德育的成败。大学德育只有正视社会、家庭的影响,认真研究和把握它们影响的本质、特点规律,加强三者的合力,才能真正达到理想效果。

就学校内部因素来说,学校的德育是全校各个部门的事情,不能只靠德育工作部门和少数政工干部去做。应该建立德育工作的综合体系,运用系统论关于整体性与关联性的原则,把参与德育工作的各方面力量组织好,协调好,形成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整体,从而发挥各方面力量的教育作用和教育的整体效应,形成教育合力。党政工团要相互配合、协同努力,一起来做,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学校内整个综合体系中,党的组织,以及代表党组织从事德育工作的专职人员,包括专职干部和专职政治理论工作者,处于教育系统的中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他们不仅担负着德育的主要任务,而且还要动员、组织其他各方面教育力量发挥作用,协调和平衡各种教育内容、教育活动,合理调整教育时间和教育方式,保持各项教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因此,专职政工干部和专职政治理论工作者,只有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德育的综合体系才有中心支柱。否则整个体系就会缺乏协调而出现混乱。共青团、工会等群众组织,在教育系统中处于重要地位,是党组织开展德育工作的得力助手。它们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结合各自的特点,组织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开展自我教育,能使整个教育系统得到充实、巩固和延伸,是综合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行政人员和业务教师涉及面广,人数众多,他们结合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进行德育,对学生将产生着广泛、经常的影响,起着其他部门和人员不可代替的教育作用,是综合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力量。

培养人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持,需要学校内所有部门、所有教职员工协调动作,齐抓共管,共同育人,需要整体改革、整体规划高校德育,充分发挥整体化优势。

因此，德育方针原则的发展也必然日益呈现出综合化的趋势，它是大教育观、大德育观的必然要求。

### (三)对象化趋势

德育过程包含着密不可分的两个过程，缺一不可。一方面，教育者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运用一定的教育手段，有计划地将一定的内容传授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则以已有认识为基础，自觉选择、吸取、消化教育内容和社会信息，把社会要求转化为个体认识，这是内化过程；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把个体认识转化为个体品德行为，这就是外化过程。内化、外化过程的运动规律揭示出，受教育者既是教育活动的客体，又是认识活动和品德行为的主体，是主客体的统一。在内化、外化的矛盾运动中，教育者的教育能否满足受教育者进步、成长的需要，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教育者应从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来提出和实施德育原则。

当代大学生生活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在党的教育关怀之下，具有许多相同的特点，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分工、文化教育等的不同，以及每个人自身的性格特征、觉悟水平、生活经历等的不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特殊性与个性。以前，大学德育比较注重共性教育，却往往忽视了对个性品德的培养，学生仅能背诵一些道德知识，往往停留在道德认知阶段，没有激起炽热的道德情感，形成坚定的道德信念，化作自觉的道德行为，结果在现实中造成言行不一，甚至形成双重人格，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客观事实表明，德育原则对象化是德育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更加重视并加强对教育对象——大学生的研究，研究他们的思想状况、心理特征、价值取向及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作为实施德育原则的基本依据；二是要充分信任、尊重和爱护教育对象，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来实施德育原则；三是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调动其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变“替代选择”为自主选择模式。德育原则的对象化发展趋势，将有

力地推动德育方法的革新和德育科学化的进程。

今天，我们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其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现实，决定了社会中人们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学校是社会的“晴雨表”，社会价值取向必然反映到高校中来。如何根据每个学生觉悟程度不等、价值取向相异、个性特点不同的事实，把握教育对象的特征，激发教育对象的热情，进行针对性、科学化教育，是现实向我们提出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在实践中认真研究，探索新的德育原则，发现新的德育规律。

## 注释

-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 368、370、415页。
-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144页。
- ⑤同①，第 385页。
- ⑥同①，第 85页。
- ⑦ 《毛泽东在苏联的言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第 14—15页。
- ⑧同④，第 146页。
- ⑨同④，第 106页。
-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1181页。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47页。
- ■ 同 ■，第 194页，第 45页。
- 同 ■，第 1177页。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803页。
- ■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275、374页。
- 同 ■，第 1415页。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526页。

## 第四章

### 当代大学德育内容透析

一定社会的德育内容，是由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德育内容，是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所制约，并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和大学的德育目标所规定的，它是为实现大学德育目标服务的。

建国以来，全国各高等院校根据大学德育目标和任务的要求，确定了相应的德育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理想与人生观教育；民主与法纪教育等等。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大学德育内容日益完善，并逐步走向系统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研究建国以来大学德育内容的历史发展，科学总结实施德育内容的基本经验，对于搞好新时期大学德育内容的总体设计，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德育内容体系，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 (一) 社会主义大学德育的灵魂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务院很快批准了《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在高等学校开设革命的政治理论课程，并把它看作是我国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标志。从此，各高校积极加强革命新课程的教学，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代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旧大学充

满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使高等学校根本改变了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性质，一跃而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由此可见，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向全校师生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不单纯是一个课程建设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学校的性质和办学方向的大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大学德育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而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它是大学德育的灵魂。早在 50 年代，毛泽东就曾经说过：“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sup>①</sup>所以，在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当作高等学校进行经常的、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与其他各种专业课、基础课一样，统一列入教学计划，成为各系、各专业的公共必修课。

40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在高等学校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大学德育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是大学德育的核心内容，对整个学校教育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社会主义大学德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在德育工作中着重对学生进行了阶级观点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进行了劳动观点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培养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进行了群众观点教育，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主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帮助大学生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社会现象和指导行动。这些教育，在新中国的大学德育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良好效果。

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成败，与大学德育工作是紧密相关的。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开展得有成效，就能推动学校的整个德育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什么时候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或者使这一教育庸俗化、简单化，那么，这个时期的德育工作就必然要受到影响或者走入歧途。这种历史的逻辑是不可违背的。

## (二) 课程改革的成果

### 1. 适时进行教学内容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的科学体系

建国以来，各高校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任务正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还很不熟悉，他们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好奇心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当时，在高校普遍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马列主义基础》，总学时达472学时。这些课程讲的都是革命的真理，给当时的大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在社会发展史部分中所讲的“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光荣，剥削可耻”、“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观念深入人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50年代的大学生就是接受了这种革命理论的启蒙教育而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的。

到了80年代，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越来越不适应，不少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85年8月发出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要求各类高等院校都要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使学生了解中国是怎样

根据历史的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鉴别和分析的能力；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政策和实际知识的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业和青年一代的密切关系及崇高责任。同时，还应向学生介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使他们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有坚定的立场和较强的适应能力。

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精神，各高校对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进行了重大改革，确定设立《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三门课，作为本科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文科专业还开设《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课程，此外，各校还开设了一大批选修课。经过这样改革，使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更加适应了当前形势的需要和学习的要求，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比如，将《中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后，通过大量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向学生全面讲述中国革命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基本经验，既讲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也讲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既讲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的历史，也讲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历史；既讲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讲各派政治力量的主张。通过历史的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同学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历史的洪流从何而来，时代的潮流向何奔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实践证明，按照新编教材的科学体系进行讲授，不仅比党史课的内容大大扩展，而且教学效果显著增强。党的“十四大”郑重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理论课改革应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为教学纲

要，把特色理论编成教材，进入课堂，用以教育武装青年学生。各高校在教学中系统讲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帮助学生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增强抵制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能力，取得良好的效果。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能否受到学生欢迎，关键在于课程的内容体系是否科学，讲述的道理是否具有客观性和真理性，能否反映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这是改革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重要经验之一。

## 2 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建国以来，高校政治理论课继承和发扬了革命大学的优良传统，较好地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和方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为中心，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培育人才。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既要强调理论教学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要十分重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和社会实践解决学生的主要政治思想问题，使学生能够掌握正确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基础，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死记硬背书本上的各种条文。

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许多高校做出了比较成功的尝试，他们所取得的主要经验有：

(1)在理论联系实际中主要是联系三个方面的实际：一是当代世界的实际；二是发展变化着的中国的实际；三是大学生思想、心理发展状况的实际。这三个方面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也是不断发展的。在 50年代，主要是联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实际，联系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际，帮助学生树立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 80年代，联系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运用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中丰富生动的实践，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回答学生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与“热点”问题，也受到学生的欢迎。实践证明，只要在教学中能够紧密联系发展变化了的实际事物，敢于和善于回答学生们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就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帮助学生分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从而引导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

(2)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降低理论的要求，相反，而是使它的理论性更深刻、更有说服力。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强调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注意用理论来说明一个个实际问题，而不是只注意罗列一些具体事例，而忽视理论的说明。在高校德育史上曾经有过一些时期片面地强调联系实际，在政治理论教育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参加社会的实际阶级斗争和体力劳动为主要形式，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反修防修教育，忽视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理论上造成了很多混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系统的政治理论课被取消，林彪、“四人帮”用断章取义的“语录”和“革命大批判”来代替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简单化为学习“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强调学习要“对号入座”，“立竿见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甚至强迫人们“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恶劣的作法，造成了对待革命理论的庸俗化和实用主义学风，坑害了一大批缺乏理论修养的青年学生，使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毒害了一代人的思想，也败坏了革命理论的声誉。这一深刻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

(3)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因而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应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只有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与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如果在理论

上墨守成规，就必然会脱离当前的实际。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尤其要注意克服僵化、保守思想，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从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诸多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在新的实践中研究新问题，概括新理论，使理论在联系实际中永葆青春的活力。比如，原来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是沿用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结构编写的，有很大缺陷。它缺少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人为地割断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运动实际的联系，为理论联系实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在吴树青教授的带领下，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和大胆创新的精神，编写出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大纲，新教材着眼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密切联系社会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趋势，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规律。这门课在学生中试讲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学们反映，教师讲课观点新颖，信息量大，能够正面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学习收获大。事实证明，陈旧的理论教育是不可能正确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当现存的理论教育与发展了的现实和造就新人的要求不相适应时，就应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更新教学内容。只有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才能真正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3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有效性和吸引力

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核心是教学内容的改革，而教学方法的改革则是突破口，是完成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的的重要手段。建国以来，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的探索和总结，已经形成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和目的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些方法是：

(1)启发式教学法。教师讲授突出重点，然后通过提问和质疑的方式，把主要应该了解的问题提出来，启发学生开动脑筋，主动积极地去思考和回答问题，使课堂教学生动活泼。

(2)讨论式教学法。讨论课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答疑式讨论，辩论式讨论，理论专题讨论，典型事例讨论等等。讨论前应向学生提供有关参考资料，要求学生事先准备好发言提纲，讨论时要注意创造平等和谐的讨论气氛。

(3)实践性教学法。在学习和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到社会实践中去，进行参观访问、调查研究，使理论更好地与实际结合起来，通过实践性教学进一步丰富理论教学的内容。

(4)“电化”教学法。在教学一个单元或一个专题之后，可组织学生观看相应内容的教学录相片或有关的电影、电视，利用电化教学手段，使教学形式更加生动活泼，更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感性体验，使理性认识建立得更加牢固。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总结，有的高校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教学方法，即“五步教学法”：

第一步为教师启发课。由教师讲述本章的教学目的、步骤和对学习的要求，讲述重点、难点和热点，介绍有关参考资料，布置思考题及课堂讨论题。

第二步为直观教学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参观建设成就、革命纪念馆、历史文物，采访典型人物，观看影视资料等。

第三步为学生自学课。这一步主要在课外进行。教师提出自学课的目的要求，要求学生边自学边思考，准备好发言提纲和质疑卡，在课堂讨论后交教师审阅。

第四步为课堂讨论课。教师要选好讨论题，讨论题既要涵括本课的基本理论，又应是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使学生在讨论前有兴趣、有激情，讨论时有话说、有争论，讨论后有收获、有提高。

第五步为教师总结课。教师对教学全过程进行简明精辟的小结，既要坚持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又要突出重点，灵活解答学生的疑问，以保证整个教学过程能达到预期目的。

经过实践检验，运用五步教学法效果是好的，它达到了四个统一，即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的统一；理论教育与能力训练的统一；课堂教学与课余活动的统一；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统一。这四个统一体现了理论教学的基本规律，增强了教育的有效性和吸引力。

## 二、关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 (一)“三个主义”教育是大学德育的主旋律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简称“三个主义”教育）三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在今天，爱祖国与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的，因为我们的祖国是社会主义的祖国，不爱社会主义，爱国就成为一句空话。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坚决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因此，爱集体又是爱国家的出发点。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同时又是一个热爱集体的社会主义者。坚持对大学生进行“三个主义”的教育，是大学德育的基本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提出的80年代的三大任务：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是加紧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三大任务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要实现这三大任务，既需要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更需要树立坚定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我们自觉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可见，“三个主义”是一个中

国公民在思想品德上最基本的要求，我们把“三个主义”的教育作为大学德育的主旋律，常抓不懈，是符合我国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三个主义”的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4条明确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教育。”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强调，要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旋律。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中，爱国主义教育为基础和龙头。爱国主义教育搞好了，才有可能深入进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为了加强“三个主义”的教育，各高等院校在大学生中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比如，在建国初期，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对大学生进行了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中，对大学生进行了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特别是1963年在全国青年学生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雷锋同志热爱祖国，关心集体，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使广大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三个主义”的教育，又于1981年在全国大学生中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再次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批判了“人的本质是自私的 极端利己主义思想和极少数人丧失国格人格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大学生的“三个主义”的觉悟，激发了他们“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革命热情。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对大学生集中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一步弘扬了“三个主义”的精神，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效地增强了大学生对祖国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进一步树立了在党的领

导下实现四化的信心。

为了使“三个主义”的教育走向规范化、制度化，1994年党中央连续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两个重要文件，对“三个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新形势下学校的德育工作特别是对“三个主义”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新时期加强大学德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此，各高等院校认真深入学习和贯彻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并结合各校的实际，制定德育实施细则，把“三个主义”的教育作为大学德育的基础工程，全面列入教育计划，坚定不移、长期不懈地抓下去。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吻合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高校德育应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切入点，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之中，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他们更加自觉地把爱国热情倾注到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全面发展上来，决心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二）“三个主义”教育的成功经验

1. 进行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课题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sup>①</sup>这是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总结。事实证明，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现代史，记录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精神和业绩，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历

程。中国人民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蕴含着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优良道德，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史迹和经典著作，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多年来，各高等院校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充分运用了这些教育资源，对祖国的悠久历史，著名的爱国历史人物，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爱国的革命传统等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有效地激发了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比如，北京大学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他们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坚持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每年的“三·一八”、“五四”、“一二·九”纪念日，该校都组织学生举办缅怀先烈业绩，学习先烈爱国精神的纪念活动，举办具有爱国主义内容的五四学生科学讨论会、演讲比赛、文艺晚会等。每年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向学生介绍北大的校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介绍以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和爱国青年，是怎样从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成长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对学生教育深刻。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少数学生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甚至有崇洋媚外的思想和丧失人格国格的行为。北京大学通过组织历史专题讲座，开展中国古代文化评介和自然科学成就介绍，组织学生参观通史展览等，使学生不仅熟悉中国的近百年史，而且了解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对学生进行自尊心教育，使绝大多数学生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有的学生深有体会地说，爱国主义是一种激励人们向上的强大精神力量，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是抵制腐朽思想影响在思想上筑起的一道堤坝。他们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胸前的校徽，而是肩负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攀登科学高峰，振兴中华的重任。

2 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特点和优势，加强教学的主渠道建设，

是对大学生进行“三个主义”教育的基本途径

中共中央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幼儿园直至大学的教学、育人全过程中去，特别要发挥好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多年来，各高等院校都非常注意把爱国主义教育与各门学科的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适当地渗透“三个主义”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教育课是对学生进行“三个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许多教师以他们深厚的理论功底，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学生进行教育，取得了显著效果。他们的讲课不仅材料充实，语言生动，而且能够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在教育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其他专业教学中，也注意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深入挖掘“三个主义”的教育内容。比如，历史专业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以及地理、语文、教育、经济、管理等专业，都有非常丰富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操的重要场所。他们在教学实践中都能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特点，精心设计教育内容，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文化科学教育之中，使学生受到教育。

此外，从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高等学校还积极创造条件，开设丰富多彩的人文知识选修课和专题讲座，为进行“三个主义”教育开辟了广阔的渠道。有的学校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文史、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管理、音乐、艺术、体育、科技、信息等30余门选修课，还举办了大量的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讲座，全校90%以上的学生都参加了选修课学习，专题讲座场场爆满。特别是邀请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讲授，深受学生欢迎。这些课堂，不仅是对正规课程的重要补充，而且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有效场所。

3 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分层次设计教育目标，引导学生

##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逐步前进

德育的层次性原则告诉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切忌一刀切、一锅煮。“三个主义”教育也不例外。由于大学生来自各方，他们的思想基础、个性特征和心理素质各不相同，因此，他们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就要针对不同的对象，设计不同的教育目标，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施教，让他们从各自的起点出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地接近最终目标。这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共同经验。

历史证明，知识分子是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是现代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历程，也是当代大学生成长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遵循知识分子这一思想发展规律，在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首先从基础文明——“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教育抓起，然后再逐步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由爱国逐步发展到爱党、爱社会主义，一部分人最后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比如，清华大学就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在教育中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设计了三个层次的教育目标，要求学生上好“三个台阶”：第一，对于刚刚进入大学生活、思想才开始起步的学生，主要对他们讲革命史、校史、专业史，宣讲大学生守则和校纪校规，使学生懂得爱祖国、爱学校、爱专业、爱集体，遵守学校的组织纪律和大学生道德规范，做爱国的、文明的、守纪律的大学生，上好第一个台阶；第二，对于已经具有初步爱国主义思想的学生，则集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国内外形势与政策教育，引导学生把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立志做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上好第二个台阶；第三，对学生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则集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帮助他们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够条件的学生及时吸收入党，培养新一代共产主义战士，走上第三个台阶。实践证明，这样分层次、有目的地进行教育，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机统一起来，使学生的思想由低到高，由浅入深地逐步前进，这种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是符合大学生思想发展规律的，因而取得了显著成效。

#### 4 加强形势与政策的宣传教育，及时解决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要开设时事政策课或讲座，以国内外形势及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为内容，对学生进行生动、现实的国情教育。”在大学生中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大学德育的重要内容之一。1987年，国家教委在《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中，把《形势与政策》作为一门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要求学生了解国内外重大时事，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发学习，健康成长。

多年来，许多高等学校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教育的重点放在解决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问题上，努力提高学生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优越性、长期性、曲折性的认识，取得较好的效果。他们的经验是：

(1)在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时，要实事求是地把实际情况告诉学生，既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又如实地介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通过具体事实，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使学生因懂得取得成就的由来而受到鼓舞，因明白产生问题的原因而吸取教训。这样的报告既生动具体，又亲切可信，受到学生欢迎。

(2)在教育中敢于回答学生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帮助学生提高识别和抵制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民主”、“自由”、“人

权”等问题一直是大学生中的热点问题，有的学校就这些问题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详细地介绍了 140 多个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的的基本情况，把它们一一同中国进行对比，从中可以看到，凡是条件与中国相同或相近的国家都比不过中国。他们还运用大量事例，说明这些问题在许多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完全解决。通过科学的对比，学生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3) 挑选优秀教师和各战线的领导干部给学生讲形势政策课，保证了教育质量。许多学校为了开好这门必修课，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师集中编写教材，挑选政治上坚定，思想理论观点正确，受过专门培训的教师讲课。有的还采取集体备课，上示范课等办法，精心组织教学。并适当聘请一些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厂长、经理、企业家来校开讲座，运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大量事实，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四化建设的成就，取得较好的效果。通过大课堂与小课堂相结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保证了教学质量。

5. 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有了好的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才能更好地为学生所接受。各高校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中，针对青年学生的特点，采取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如组织学生观看爱国主义影视片，开展读书征文和影评、书评活动；举办书画展览、音乐戏曲比赛和体育竞赛活动；利用校外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参观、瞻仰和考察活动；结合特定的教育主题，组织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课内外学习，举办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和专题讲座等。通过这些活动，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于其中，把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统一起来，增强了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深受学生欢迎。

### 三、关于理想与人生观教育

#### (一) 理想与人生观教育是大学德育内容的精髓

理想和人生观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意识形态，是人们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方向和人生道路，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对大学生进行革命理想和人生观教育，是实现德育目标、培养“四有”新人的关键。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sup>①</sup>“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sup>②</sup>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对大学生进行革命理想和人生观教育，并把这一教育贯穿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成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早在 50 年代，青年团中央就明确提出：任何团员和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当时，在大学生中除了接受正规的课堂教育外，还通过向先进人物学习、读革命书籍、过革命团日等活动，向大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理想和人生观教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书籍，成为当时大学生最喜爱的读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把青春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等美好格言，成为当时大学生最向往的座右铭；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当时称为中国的保尔）、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向秀丽等革命英雄，成为当时大学生最崇拜的人物。这些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典型，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对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到了 60 年代，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王杰的英雄事迹，又成为当时大学生人人效仿的榜样。广大学生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下，自觉地把雷锋当作一面镜子，努力学习他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立场；自觉服从祖国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关心同志，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共产主义风格；坚韧不拔，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这一切，正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生观的光辉体现，使大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像雷锋那样工作、学习和生活”，“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成为广大学生的行动口号。在雷锋的革命精神感染下，助人为乐，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为发扬，好人好事不断涌现，要求入党入团的学生大量增加。这次全国性、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对大学生树立革命的理想和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60年代前期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获得空前解放，大学生渴望成才，向往四化的热情大为高涨。但是，在心理上由十年动乱所造成的阴影是一时难以消除的，他们痛感于人的尊严的丧失，人生价值的丧失，要求恢复人的尊严，实现自我价值。他们不仅从文艺作品中探索人生意蕴的奥秘，而且从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中寻找思想武器。80年代初，西方的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被当时的大学生作为最新的时髦理论加以接受。许多大学生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意蕴等问题，存在着种种模糊观点和错误认识。什么“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大公无私的人是没有的”、“人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等观点，在大学生中颇为流行。一时间，“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等口号成为大学生的人生信条，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完全陷入了“自我”的迷宫。针对这种情况，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理想与人生观教育就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1982年7、8月间，教育部在大连、西安分别召开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在大学生中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问题。同年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要求针对大学生普遍关心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着重进行人生观和道德观教育。从此，思想品

德课在全国高等学校迅速发展，成为对大学生集中进行理想、道德、人生观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由于各高等学校认真编写教材，精心组织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因此，这门课程受到学生的认同和欢迎。

帮助大学生树立革命的理想和人生观，既靠说理的教育，又靠榜样的引导。正当各校在集中进行理想与人生观教育的时候，富于理想、勇于献身救老农的优秀大学生张华出现了，身残志坚、无私奉献的中国当代保尔张海迪出现了，华山抢险的大学生群体出现了，老山前线的革命英雄群体出现了……这些与大学生同龄的英雄群体和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使大学生深受感动。他们表示要“学习同龄人”，从内心里喊出了“理解万岁”的口号。这时，许多大学生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价值理论中获得了认识人生的武器，从无数英雄人物的闪光人生中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逐步走出了“自我”的迷宫，开始了新的探索。张华、张海迪和老山前线的英雄们成了一代大学生的楷模，通过对这些光辉典型的学习和思考，使不少大学生逐步认识到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于是，他们把注意的目光转向了成才，形成了波及全国的成才热。许多大学生满腔热情地走向社会，参加实践，学习工农，建设四化，把知识献给人民。他们刻苦学习，渴望成才，献身四化的思想，成为当时大学生人生追求的主流。这是 80年代中期大学生找到了自我与社会的最佳结合点之后在理想与人生观上的一次升华。

历史证明，坚持对大学生进行革命理想和人生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是大学德育内容的精髓。多年来，各高校不论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还是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法制教育等等，都坚持贯穿理想与人生观这个核心内容，为把大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 (二)理想与人生观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1. 深入调查和全面了解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现状,是正确进行理想与人生观教育的基本前提

大学阶段是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由于大学生正处在青年时期,他们的某些生理心理因素还处于极不稳定的变化之中,加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较浅,社会实践经验比较缺乏,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大学生的人生观呈现着矛盾、困惑、多重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尽管社会变革的积极效应和正面影响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人生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他们的人生观还是处于一种不自觉、不定型的状态,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可变性。因此,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既是动态的、变化的,更是可导可塑的。我们必须针对这一特点,对大学生的理想和人生观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和掌握大学生复杂多变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使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能够得到正确的发展。

为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高等院校对各个时期大学生人生观形成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仅从改革开放以来,组织全国性的大型调查就有 10 余次,各省市、各高校的调查就更多了。通过调查,获取了大量的信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一系列的有关大学生理想、人生观教育的研讨会,发表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调研报告和研究论文,为正确开展理想与人生观教育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和理论指导。这是我们能否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因势利导地对学生进行理想与人生观教育的重要前提。

2. 充分发挥“两课”的主渠道作用,是系统进行理想与人生观教育的重要途径

大量调查表明,在大学阶段,多数大学生并未形成完整的、稳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许多问题认识混乱、迷惘、彷徨,认为“说不清楚”,甚至只是“跟着感觉走”。这种状况,显然与我们的理论武装和价值导向不够有关。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对大学生人

生价值观理论的系统教育，使他们在人生探索历程中能获得强大的思想武器。在这方面，除了其他有关课程适当渗透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各高校在“两课”的建设中，努力把理想与人生观教育作为长期稳定的内容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取得了好的教育效果。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课，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人生观教育更为直接。从80年代初在部分高校开课以来，从无到有，从试验到普及，从不正规到正规，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发展和加强。据有的省市调查，大约有三分之二左右的课堂教学效果是好的，受到学生欢迎。他们在教学实践中，加强教学研究，合理设置课程，提高教师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把课堂讲授与课外研讨、社会实践以及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结合起来，把理论导向与具体指导结合起来，为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与人生观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理想与人生观教育必须适应这一变革的需要，从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客观现实，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吸取养料，把教育的重点放在解决学生的热点和疑点问题上，并尽可能地运用多种形式和有效途径，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课堂教育与自我教育统一起来，着重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不仅是教育学生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更重在教育学生正确地认识人生，提高选择的能力。这是从理想与人生观教育的实践中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 3 优化学校育人环境和社会舆论氛围，加强理想与人生观教育的正确导向

大学生的理想与人生观的形成和演变，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不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学校小环境，都具有直接的育人功能，都对大学生的理想与

人生观的形成起着重大的作用。

总结大学生理想与人生观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特别是社会的舆论导向，对大学生的理想与人生观的确立和演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前期，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较好，社会舆论导向正确，从社会大环境到学校小环境，都呈现一派团结进步、积极向上的气氛，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与人生观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可是，到了 80 年代特别是 80 年代后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洪流，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大学生的心扉；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使社会上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开始蔓延，导致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滑坡，这一切直接冲击着大学生的理想和信念。加之，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宣传舆论导向失衡，以至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进行了误导，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严重削弱，终于导致 1989 年“政治风波”的出现。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环境是影响和支配大学生的理想与人生观的重要因素。要优化育人环境，就必须加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弘扬社会正气，抵制消极腐败现象，努力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有利于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这是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与人生观的重要条件。

4 深化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在认识社会、学习社会、服务社会的过程中逐步树立正确的理想与人生观

当代大学生最突出的弱点之一，就是缺乏社会实际生活经验，理论脱离实际，对自我、对社会的认识存在着许多盲目性，容易受到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在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时，容易产生迷惘和困惑。如何帮助大学生克服这些弱点，使之能在更广阔的空间准确地把握自己，摆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经验告诉我们，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接触社会，接触群众中了解

国情民意，增强社会责任感，正确认识自我价值，这是加强大学生理想与人生观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许多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亲眼目睹了我国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在四化建设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看到不少基层干部和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思想上的种种疑虑与困惑便不难找到答案。他们从社会实践中找到了认识事物的客观依据，实践给他们提供了科学对比的参照系，使他们有可能在一个比较客观的条件下重新审视社会、审视人生。他们在认识社会的同时，也逐渐认识了自我。什么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自我与社会的价值、奉献与索取的关系等等问题，都在这种新的审视中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合乎科学的解释。通过社会实践，广大青年学生普遍反映，从基层党的干部和党员身上看到了党的形象和风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许许多多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才是中国的脊梁，是建设四化的主力军。深感只有把自己融汇于社会之中，才能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

#### 四、关于民主与法纪教育

##### （一）民主与法纪教育是大学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和纪律，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大原则问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大学生的民主、法制和纪律教育，是大学德育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四有”人才的需要。对于广大青年和大学生来说，他们是继往开来的跨世纪的一代，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关系到四化建设的成败。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sup>⑧</sup>

法制教育与法制建设是紧密相关的，什么时候的法制建设搞



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离开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二者必须有机地统一起来；进行了民主与集中的教育，使学生懂得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离开了民主的集中，就会走向专制和独裁，离开了集中的民主，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纪律与自由的教育，使学生懂得革命纪律是维护个人自由的保障，只有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才有个人自由，不要纪律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那种以争民主、争自由为名，破坏组织纪律的行为，正是对党的领导，对民主集中制的否定，是不利于安定团结的。

实践证明，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教育，使学生懂得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明确宪法和有关专门法的基本精神，弄清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纪律的相互关系，从而确立和增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念、法制观念和纪律观念。

## （二）民主与法纪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1. 在高等学校普遍开设法律基础课是加强大学生民主与法纪教育的重大举措

过去，法律基础知识不仅理工科学生一无所知，就是非法律专业的文科学生也知之甚少。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基本上都是法盲。这种状况是根本不适应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要求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更多的是要依靠法律进行调整。不论是从政、经商、执教和管理，都要依法办事。因此，在高等学校普遍开设法律基础课，既有利于改变大学生单一的知识结构，又有利于增强法制观念，培养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专门人才。

开设法律基础课，对大学生进行民主、法制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以提高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为基础，以学习宪法为核心，以守法、护法为落脚点。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是一门内容丰富、知

识性很强的科学。对学生进行民主法制教育，首先要帮助学生掌握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包括法的本质和特征，法制的基本内容、要求和作用，以及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的一切立法工作，都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教育学生掌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体系是法制教育的首要任务。

社会主义法制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十分广阔，除了宪法以外，还有各种普通法律。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是难以学完这些内容的。许多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时，注意抓重点，以学习宪法为核心，带动其他法律知识的学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一切法律依据。以学习宪法为核心，主要引导学生了解我国宪法的地位和作用，立国行宪的根本指导思想，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机构的组织、职权及活动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守法、护法的神圣职责等。掌握了这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再学习其他法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此，学好宪法是对大学生进行民主法制教育的基础，把基础打牢了就能推动整个教育活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对大学生进行民主、法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强其法制观念，提高其守法、护法的自觉性，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高等学校的法律基础课教学不仅在于教给学生的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把教育的落脚点放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人才上来。现在的大学生将是跨世纪的国家建设人才，他们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状况如何，对我国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安危关系极大。我们在进行系统的法律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必须把着眼点放在提高学生的法制意识上，用法制来规范学生的行为，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使之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合格的“法人”。

2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校内与校外相结合，是对大学生进行

## 民主与法纪教育的重要方法

在民主与法纪教育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二是联系社会执法情况的实际；三是尽可能地把所学的法律知识运用于实际。

只有注意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社会上守法、用法的实际，才能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提高教育效果。比如，在对待民主与法制教育的认识上，大学生就存在着许多思想困惑。他们看到一些地方缺乏民主、以权代法、权大于法、无视法律、践踏法律的现象，看到有的司法部门执法不严，甚至知法犯法的情况，思想上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对法制的不信任感，认为法律都是空洞的条文，学了也无用。针对这些问题，在教育中应对学生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使他们认识到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这些问题，是我国几千年来建立在封建专制主义基础上的法律文化给我们留下的积弊，同时也与建国以来我们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分不开。我们现在实行改革开放，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制教育，正是为了清除这些旧的沉积。只要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日趋完善，人们的思想素质和法制观念不断提高，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逐步解决。

为了加强教育效果，除了在校内进行教育外，还与校外的教育活动结合起来。比如，与当地人民法院取得联系，组织学生参加有关案件的法庭审判会，根据需要组织学生参观监狱和劳教所，让改造得较好的在押犯人和劳教对象进行现身说法；围绕有关法制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以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等等。通过校外教育活动，使大学生从实践中更好地认识社会，认识自己，以增强大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

实践经验表明，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方法是引导学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服务于群众。在这方面，最受学生欢迎的是组织模拟法庭，让学生直接充当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独立审判一个案件，把学法与用法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提高了学生

学习、理解和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与此同时，许多学校还开展了法律知识竞赛和法律咨询活动，这也是学用结合的好方法。通过这些灵活多样的形式，有效地促进了大学生认真学习法律知识、研究法制问题的积极性，使教育的效果大大增强。

### 3 把思想教育与严格的法纪管理结合起来，创造良好的法纪教育环境

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对大学生进行民主与法纪教育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常言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个规矩就是制度，就是纪律。在进行民主与法纪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制度和纪律建设，要用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来规范学生的行为，使他们知道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遵守什么，禁止什么，把教育的要求变为自己的行动，提高遵守法纪的自觉性。只要大家都严格的遵守法纪，能够同一切违法违纪现象作斗争，就会在全校形成一种良好的法纪教育环境，一切正气都会得到弘扬，一切歪风邪气都将受到抵制。这样，既有系统的法纪知识与理论的灌输，又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和法制纪律的约束，还有良好的法纪教育环境的熏陶，可以说是三管齐下，这无疑会大大提高法纪教育的效力。

坚持教育与严格法纪相结合的原则，必须对违法违纪的人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严格地按照法律和纪律进行处理。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时候，就应该对各种罪犯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sup>⑦</sup>对犯错误的人要认真地揭发他们的错误，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鼓励和欢迎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在此基础上根据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和本人态度严肃处理。这样，既可以教育犯错误的人，又可以教育大家，因为“疏导，包括法律的处理”。只有对那些触犯刑律、破坏纪律的人绳之以法纪，才能使更多的人警觉起来，自觉地遵纪守法。这对于维护法制和纪律的尊严，更好地巩固与发

展民主、法纪教育效果，都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 五、关于道德教育

### (一) 道德教育是大学德育的基础内容

道德教育，就是把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道德规范，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一种教育活动。加强对大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直接关系到祖国未来的面貌。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sup>⑧</sup>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青年一代的道德教育。早在建国初期就把“五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公德，在大、中、小学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五爱”教育。1954年，当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少年比较严重的时候，党中央又连续批转了三个有关加强道德教育的文件：1954年11月批转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加强青年的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55年1月批转青年团上海市委《关于加强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报告》；同年9月批转团中央《关于开展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工作总结报告》。在这些文件精神指导下，从1954年10月起，在全国135个大中城市先后开展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道德教育活动。全国高等学校都集中精力对学生进行了这一教育。通过学习文件，结合反面典型进行座谈讨论，做好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积极引导学生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到了60年代前期，结合学雷锋、学王杰等活动，又在大学生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道德风尚教育，不少学生关心集体，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了一代新风。

历史经验证明，道德教育是培养学生健康成长的基础工程。大

学生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门人才，就必须集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才干于一身。而品德修养历来就被有识之士看作是人才成长的基本条件。因此，各高等学校都把加强道德教育作为大学德育的基本任务，坚持不懈地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的国民公德教育，进行集体主义教育，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直至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帮助学生把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为。40多年的教育实践表明，凡是道德教育抓得有成效的时候，培养的学生素质就高，比如像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培养的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大学生；凡是忽视道德教育或教育失误的时候，学生成长就受到影响，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重新提出加强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从1981年开始，就在全中国开展了文明礼貌活动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高等学校在这一良好的社会氛围影响下，在大学生中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大力创建文明单位和文明班集体，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广泛进行社会公德教育的基础上，教育部于1982年颁布了《高等学校学生守则》（试行草案），同时，又发出了《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通知》，要求把该课定为学生的一门必修课。从此，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便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 （二）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1. 通过思想品德课教学，加强对道德理论和道德知识的灌输，提高道德认识水平

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构成的。道德认识是道德行为的先导，确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是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大学生虽有一定的道德认识水平，但世界观、人生观正处在形成之中，加之形形色色的道德现象交织在迅速发展和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之中，更增加了人们对于善恶、是非的识别难度。因此，对大学生进行道德

教育，首先要重在理性，加强对道德理论和道德知识的灌输，从思想上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提高道德判断能力。

为此，各高等学校从80年代初开始，普遍开设了思想品德课，着重对学生进行理想、人生观和道德品质教育。在道德教育中，主要阐明了道德的产生与发展；各种社会形态道德类型的区别与联系；道德的批判性与继承性的关系；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与道德行为；职业道德与大学生成才的关系等等。在系统讲授这些基本理论的同时，还针对学生普遍关心的思想道德问题，进行重点剖析，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道德认识水平，对于增强学生的道德感情和道德信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起了重要的作用。

## 2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加强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做到知与行的统一

社会实践是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的熔炉，在社会实践中加强道德修养是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大学生学到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知识，还不是道德品质，只有在实践中把道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才能形成道德品质。道德认识的深化和提高，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养成，都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这一道德品质形成的客观规律，已为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改革开放以后，高等学校更加重视在社会实践中加强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注意引导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使学生在社会交往中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言行哪些符合社会规范，哪些不符合社会规范，哪些是道德的，哪些是不道德的。对于道德的行为进行褒扬，对于不道德的行为予以批评，从而有效地增强了大学生的道德评价能力和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大学生思想品德的一面镜子，而且是推动道德向前发展的客观依据。道德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并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也必然会不断发展和变化，并不断向人们提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道德要求。比如，对竞争观念的确认，对平等思想的认同，对进取精神的肯定，对个人利益的评价等等，都需要从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中来重新予以判断，并引导学生不断把这些新的社会规范转化为自己的行为。经验证明，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更深切地体验到道德的新发展和新变化，才能使道德教育适应道德发展的新要求。

### 3 把教育与管理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大学生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

大学生道德行为和良好习惯的形成，不仅要靠思想教育，还应该进行必要的管理。通过严格而科学的管理，帮助学生提高自理、自律的能力，自觉地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80年代初，教育部首次颁布了《高等学校学生守则》，这是大学生的行为准则和进行道德修养的客观标准。根据《守则》的要求，各高等学校又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加强大学生道德修养的重要措施。在教育和管理中，不少高校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作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作法是：第一，制定行动规划，提出奋斗目标；第二，定期检查，张榜公布；第三，互相评比，群众监督；第四，褒贬善恶，奖惩分明。在这些作法中间，从头到尾贯串了四个字：严格、公正。通过这样管理，使那些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更加主动自觉地去，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使那些比较放松自己的学生感到有一种压力，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我约束的能力。这样，就使管理变成了动力，不断推动着学生把道德规范转化为道德行为。如果把这种管理长期坚持下去，久而久之，大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就能形成。

大学德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以上仅就五个主要方面内容的施教情况进行了一些透析，从这些分析中可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 大学德育内容决定着国家未来专门人才的政治思想和道

德素质，用什么思想理论观点教育学生，是能否实现大学德育目标的重大问题。因此，对大学德育内容要按照培养规格的要求，精心设计，合理安排，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保持其教育内容的方向性和科学性，切不可脱离培养目标，主观随意地自行安排。

(2)大学德育内容是实现高校培养规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培养规格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大学德育内容的相对稳定性。我们所培养的大学生，在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等方面都应当达到一定的要求，都应安排一定的教育内容，切不可顾此失彼，畸轻畸重。也不能迁就眼前的需要，随意改变预定的计划。在德育过程中，结合当时政治运动的实际来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以政治运动来代替德育内容。当然，大学德育内容的这种稳定性，是从整体意义讲的，至于每项内容的具体内涵，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而有所更新和变化，则是正常的，也是它的灵活性所要求的。

(3)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循序渐进的成熟过程，安排大学德育内容必须遵循这种规律，保持相应的层次性和连续性。大学德育内容的结构有它自身的逻辑性，各项教育内容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彼此制约的。在德育过程中，各项内容的安排应有科学的逻辑序列，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应安排不同层次的德育内容；即使在同一年级，根据不同的对象也应有不同的要求。这样，才能保持内容结构的连续性和内容层次的递进性。

(4)设计大学德育内容，必须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增强德育内容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对大学德育内容的设计和实施，既要考虑其理论的深刻性，又要考虑其现实的针对性，只有使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增强德育内容的可接受性。任何德育内容，如果失去了其可接受性，就谈不上有什么吸引力，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好的效果。这是多年来德育实践的经验总结。

## 注释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第 780页。
-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369页。
-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206页。
- ④⑤同③, 第 110 111页。
- ⑥同③, 第 163页。
- ⑦同②, 第 253页。
- ⑧同②, 第 337页。

## 第五章

### 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发展轨迹

所谓大学德育的社会适应性，就是指大学德育必须与一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与社会意识形态对青年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等方面的素质要求相适应。也就是说，大学德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历史责任，这就要求大学德育能够保证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具有社会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同时，大学德育就其本质而言，是青年大学生个体社会化的一种主要形式，只有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保证德育对象能够具有当代社会所倡导的政治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才能保证大学生个体社会化得以圆满完成。因此，大学德育的社会适应性是由其本质和任务所决定的，是大学德育的基本规律之一。

建国以来的教育实践表明，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问题始终是高校德育工作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大学德育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不仅有利于大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和完善，而且也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回顾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发展的基本轨迹，总结建国以来大学德育适应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探索新形势下大学德育如何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建国以来大学德育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

建国以来,大学德育工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紧紧围绕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广泛深入的教育活动,对于坚持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同时,由于在指导思想曾经受到“左”的或者右的干扰,也走过了一些曲折的道路。40多年来,根据大学德育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 (一)正确适应阶段

从1949年到1956年的建国头七年里,我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国家教育部门明确阐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性质、任务、目的和方法,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为大学德育明确规定了社会适应性的要求。同时,结合党在建国初期的各项中心任务,在高校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共同纲领》明确指出,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这里所说的“革命的政治教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教育,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这是适应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的。所以,1950年6月,全国高教会议进一步指出:“我们高等学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第一次对大学德育明确提出了社会适应性的目标要求。

建国初期大学德育的任务是双重的,既承担着改造旧德育的任务,又肩负着创建新德育的任务。为完成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做好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高等学校把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作为加强德育社会适应性的基本任务,在学生中普遍开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思想教育,帮助学

生端正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以适应培养新中国新一代建设人才的要求。同时，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党的中心工作，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划清敌我界限、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剥削和劳动的界限，有效地提高了革命的阶级觉悟。这些教育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

1952年12月，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据此，高等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有计划地为国家工业化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大学德育工作主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一是进一步加强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注意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把政治理论教育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结合起来。二是在学生中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帮助学生认清社会主义前途，在三大改造运动中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定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服务的方向。三是为了适应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要求，大学德育紧紧抓住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要求，开展“三好”活动，把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主要任务。

总之，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结合党的中心任务，有针对性地、生动活泼地开展德育活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工作方法，是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特点，较好地体现了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要求。

## （二）基本适应阶段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时期，大学德育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强调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学德育工作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但是，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在正确处理大学德育同社会要求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之路。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

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一重大转变的客观形势，给大学德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这些任务和要求，集中反映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文件中。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sup>①</sup>他提出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思想问题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为大学德育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方向。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要求在学生中进行正确处理红专关系的教育。同年4月，党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对学生进行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条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情况，提出了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树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教育内容与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基本相适应的。在党的“八大”精神和教育方针指引下，大学德育明确地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强调要按照学校特点进行工作，形成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风气；要善于运用各种思想工作阵地多方面进行教育；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注意在学生中造成民主的、自由争辩的风气。在大学德育基本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时，学生的政治热情、劳动热情、学习热情同时高涨，在与工农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成为广

大青年学生的普遍要求。

这一时期的大学德育从总的方面来看，紧紧围绕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这一中心任务来开展，贴近社会现实，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发展对高校的要求和对人才的需要，因而，表现出了较高的社会适应性。但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常常受到“左”的干扰，加上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党的“八大”所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没有能够得到坚持，不时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冲击，走了不少弯路。如1958年“大跃进”和“教育革命”中，“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白专道路”，伤害了一些师生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的热情。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9年反右倾斗争，都错误地批判、处分了一些人。这种把政治斗争引入大学德育领域，甚至用政治运动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表面看起来似乎适应了当时的政治气候，但因违背了学校教育自身的规律与特点，也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实际上破坏了大学德育的社会适应性。特别是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片面地理解学习知识与参加劳动之间的关系，无限制地增加劳动时间，以生产劳动来代替教学，代替思想政治教育，严重打乱了教学秩序，降低了教育和教学质量。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 (三) 严重背离阶段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时期，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失误，在政治上推行极“左”路线，学校工作受到直接影响，党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十分混乱的局面。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动，高等学校掀起了红卫兵运动。他们利用“四大”的极端方式，冲击学校和社会。高校政工机构陷于瘫痪，学生管理制度被废止，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课和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取消，党团组织活动被停止，原来意义上的大学德育工作被全部砸烂，取而代

之的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斗争。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以后，全国各条战线以“大批判开路”，开展“斗、批、改”，全面否定建国后17年的光辉成就。由“四人帮”一手炮制的“两个估计”，从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和大学德育的成果，污蔑党在学校的工作是“黑线专政”，把革命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要充分发挥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强调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这时，由“四人帮”所掀起的“革命大批判”和政治运动取代了学校德育，学生从德育对象变成了批判者、教育者，思想政治工作成了“四人帮”推行反革命政治的工具。无疑，这个时期的德育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完全不相适应。

#### (四) 拨乱反正后新的适应阶段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十多年来，我们党不仅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实现了把党的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目标，而且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新的形势下，大学德育明确了指导思想，确定了培养规格，更新了教育内容，基本适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入新的社会适应阶段。

##### 1. 明确了指导思想

建国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大学德育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指导思想问题一直成为人们困惑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学德育要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必须首先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

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明确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定要围绕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使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这个主题。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大

学德育的指导思想 奠定了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科学基础。1982年6月，在中共中央颁发的工业企业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和财贸企业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中，进一步论述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基本任务、工作原则、工作方法等问题，强调“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紧紧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恢复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在实践中努力摸索新形势下的特点和规律，使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这是党中央在拨乱反正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对于高等学校德育进一步端正指导思想，明确服务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等学校的德育工作得到加强，有的学校还增设了专门的机构，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德育教育逐渐活跃起来，高校德育工作的新局面开始出现。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方针，强调了思想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十二大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明确、具体地回答和解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是指导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也是指导高校德育工作的总方针。

1987年，在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高校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把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合格人才，作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问题。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新时期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保证教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保证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动员、团结

全体师生员工，完成国家给予的培养人才的任务。”该文件再次明确提出了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使大学德育进一步确立了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保证培养合格人才的方向。虽然高校德育工作先后受到过几次冲击，但总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发生过大的动摇。改革开放愈深入，大学德育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指导思想愈明确。由于指导思想问题的正确解决，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2 确定了培养规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十分关心高等学校的培养问题。党中央就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有过多明确指示，各级教育部门也对培养规格进行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并逐步确定了我国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规格和德育目标，为大学德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确立了明确的方向。

1980年4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大学与资本主义大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为人民服务，刻苦钻研业务，立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国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必须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使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专门人才。”这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对高等学校培养人才提出的基本要求。

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同年5月11日，为张海迪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三有一守”后来演变成“四有”。邓小平同志的两次题词，是新时期人才培养规格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确立大学德育目标的重要依据。

1987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应当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应当热心于改革和开放，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应当自觉地遵纪守法，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应当勤奋学习，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决定》所提出的“四个应当”是“四有人才”要求的具体表现，也是党和人民对高等学校和大学生提出的要求与希望。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各高等学校紧紧围绕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四有人才”这一中心任务来组织实施德育，形成了新时期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 3 充实、调整了德育内容

德育内容是根据德育目标和教育对象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的一般规律而确定的，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不断地加以充实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学德育着重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加强政治观、人生观教育。这是贯穿新时期大学德育的主线。高等学校把政治观教育作为德育的中心内容。通过马列主义理论课、形势与政策课、党（团）校等途径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针对几次学潮和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对学生进行政治观教育；结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精神的贯彻，进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教育，收到了一些成效。在进行政治观教育的同时，高等学校还紧紧抓住当代青年在探索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种种困惑与问题，组织人生观大讨论，开设人生观教育课程，对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竞争意识、进取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是加强道德观教育和学生道德行为的培养。针对“文化大革命”后青年学生中道德品质的实际状况，从1981年开始，高等

学校纷纷开设了思想品德课，试图对学生进行社会公德、社会主义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还普遍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学雷锋”活动，开展了以学张华、张海迪等为内容的学先进活动，以青年学生乐于参加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基础文明和基本道德教育，培养学生新的道德观念和良好的道德行为。同时，还进行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关系，如何处理义利关系的教育，使学生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竞争观念、时间观念、效率观念、人才观念等，培养学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道德品质。

三是强化成才观教育。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三个面向”和培养“四有”人才的要求，高等学校普遍把成才教育作为新时期大学德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展新时期高校培养目标和人才模式的讨论，学生了解到社会对当代学生的要求，从而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成才观。通过组织学生学马列，参加勤工俭学、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倡导大学生科技活动和第二课堂活动等，鼓励学生勤奋学习、奋发成才。把成才观教育作为大学德育的重要内容，帮助学生探索成才途径，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同时也增强了大学德育的社会适应性。

新时期的大学德育始终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培养“四有”人才服务，在探索学校德育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少好的经验。但是，由于多次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工作上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使大学德育在探索的道路上遇到挫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sup>①</sup>”。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学德育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了全面的加强和改善。但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大学德育新格局，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总结经验，继续探索。

## 二、大学德育适应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

科学地、辩证地处理德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大学德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大学德育的基本规律之一，也是大学德育在理论与实践上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建国以来，我国大学德育在探索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一)正确分析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是加强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前提

德育既是一种特殊的理论活动，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无论是作为理论活动，还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它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和发展。构成德育社会环境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首先，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着德育的性质与目标。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决定大学德育的根本宗旨是为社会主义社会培养接班人，使当代青年学生能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富于开拓创新精神和历史使命感、胸怀远大理想又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代新人。其次，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着大学德育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地去探索与发展。建国4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与此相适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改善，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国际交往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发展变化是渐进的、曲折的，经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都会给大学德育提出一系列的新问题，促进大学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因此，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加强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重要前提。

建国以来，大学德育实践表明，只有在正确把握一定历史阶段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现实情况和基本特点，并

能以此为依据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合理的评价和分析，才能科学地设计大学德育目标和内容，实施正确的德育原则和方法，从而加强大学德育的社会适应性。分析得当，设计的德育目标和内容才会正确，德育也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分析发生偏差，设计的德育目标和内容就会跟着出现差错，大学德育工作就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比如，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的情况下，由于错误地估计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仍然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运动为中心，使德育工作完全脱离了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方针，造成了重大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从计划经济转到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这些变革也促使大学德育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相应变化。如果错误地估计形势，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大学德育必然会脱离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轨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格局大相径庭。

(二)明确德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是加强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关键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又反过来为社会政治和经济服务。教育担负着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职能，担负着培养和训练维护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人才的任务。因此，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德育，体现着教育的阶级性质，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我国的高等教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大学德育必须紧紧围绕党

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为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教训是比较多的，比如，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正确决策未能付诸实施。由于强调“政治挂帅”，大学德育完全脱离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趋向，经历了许多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搞好经济建设是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其它一切工作都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大学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使大学德育进一步适应了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实践证明，加强大学德育的社会适应性，关键是要坚持德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大学德育应紧紧围绕培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立志振兴中华、献身四化建设的合格人才这个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根据德育工作的总体目标，科学地规划德育的具体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把德育目标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中去，充分发挥德育对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的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

(三) 认准方向，排除干扰，坚持积极、全面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加强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重要原则

大学德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德育工作与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先进科学技术

以及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当今世界乃至在一个国家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社会意识形态的状况，往往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常常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并存的局面。在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十分突出。在今天，中国大地上，既有代表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大批工矿企业，也还有人拉牛耕、粗放经营的大片农村。既有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又有二亿多文盲的存在。在经济结构上也是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社会意识形态的状况更是复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国的主导思想，但是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残余犹存，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也不断侵入意识形态领域。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大学德育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德育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既要注意德育的层次性，更应把握德育的先进性；要认准方向，排除干扰，坚持积极适应，反对消极适应。按照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要求，以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坐标，设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趋利避害，始终保持德育的先进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德育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坚持积极适应原则，就要做到主动适应，反对被动适应。所谓被动适应，那就是消极等待，犹豫观望，口头上说要跟上形势，实际上行动迟缓，形势逼得没有办法就小修小补地改一点，在一般情况下仍然是按老套套、老模式办事。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面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纷繁复杂的新情况，思想活跃、富于幻想的青年学生热情奔放，大学德育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虽然大学德育工作者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不少同志思想解放不够，面

对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广大学生高涨的热情，表现得力不从心，有时甚至显得软弱无力。在一段时间内，大学德育未能很好地主动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进行积极引导不够，致使不少大学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面前出现困惑、苦恼，乃至思想混乱，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教训。

要做到主动适应，就必须大力提高德育主体的判断与选择能力。要注意选择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积极方面，回避消极方面，要根据德育自身的规律来进行鉴别，对有利于德育发展的积极方面就要主动去适应，对不利德育发展的消极影响必须加以抵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校德育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大学德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还要做到全面适应，反对片面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是多方面的，大学德育必须辩证地处理好彼此间的关系，全面正确地理解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否则，大学德育就会脱离社会和学校的实际，偏离正确的方向。例如，1958年批判了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对大学德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片面理解教育同生产劳动的关系，过分强调生产劳动的育人作用，忽视理论教学在培养又红又专人才中的重要性，用生产劳动代替课堂教学，代替思想教育，降低了教育质量，使大学德育走入误区。经验证明，对党和国家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社会发展提出的某些要求，都应全面地进行理解和分析，正确地加以宣传和贯彻，才能使大学德育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正确路线服务，为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服务。否则，德育工作就会出现挫折或失误，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 三、加强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新思路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纲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大学德育工作有许多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和解

决。我们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探索大学德育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路子。

(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加强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理论导向

要使大学德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发展要求，必须明确德育的理论导向。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适时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逐步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毫无疑问，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大学德育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加强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理论导向。

首先，要根据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充分发挥德育工作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育人才过程中的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我们确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路线。发展才是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他又告诫我们：“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sup>⑧</sup> 1989年，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泛滥，大学德育受到削弱时，他尖锐地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sup>⑨</sup> 我们要始终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既做到大学德育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使大学德育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在育人过程中真正发挥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

其次,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确立大学德育的任务和目标。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和新时期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战略方针的论述,关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人才目标的论述,为我们确立新时期大学德育的任务和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德育工作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指示精神,使大学德育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

第三,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学生的头脑,坚定学生的社会主义政治信念。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中心任务,也是大学德育工作的中心内容。今天,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学好特色理论,这是增强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关键。学习这一理论,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自觉抵制各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适合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学生,还要做到特色理论进课堂,把这一理论作为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以及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过程,正确认识这一理论对中国以及对世界的伟大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切实了解邓小平同志在创立这一理论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要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指导学生逐步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现象,评价各种社会思潮,坚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信念。

(二)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实施德育,坚持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政治方向

党的基本路线,也称总路线,是规定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

阶段中总的任务，以及围绕总的任务所要坚持的总的原则、方针、政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根据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适时地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党的十三大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是在对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基础上形成的。这条基本路线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指导思想，它对于确定党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布局、政策策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因此，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实施德育正是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要求与体现。大学德育只有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来开展，才能真正做到德育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才能确保德育的政治方向，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来实施德育，就是要按照基本路线的要求来规划大学的德育体系，组织德育的内容。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持久地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开展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教育；进行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

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使他们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具有文明道德、遵纪守法的修养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勤奋好学，勇于探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功立业。

(三) 加强素质教育，使大学德育更好地适应跨世纪人才战略的要求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确定了今后 15年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蓝图。高等学校培养人才质量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而且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对人才的素质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实施跨世纪人才战略的高度来审视大学德育工作，调整和充实德育内容，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到底对人才的素质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首先，在思想品德方面更强调了时代观念与现代意识，要求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及与此相联系的时间观念、效益观念、人才观念，具有敢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国际文化意识。同时，要求具有正确认识国情、分析形势的能力，具有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伦理道德准则与行为方式。其次，在专业素质方面，更强调专与博的结合，要求在精通一门专业的基础上，向综合化、多能化发展，由专才逐渐变成专、通相结合的人才。其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还必须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心理承受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复杂变化和激烈的社会竞争。加强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才是大学德育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挑战的唯一正确的积极应答方式。

素质教育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和能力的加强。它强调

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全面提高人的社会化程度,强调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完善个性的发展,它在注重对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科学思维方法、认识方法等进行全面的引导式培养的同时,重视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素质的培养。强调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协调发展,并重视非智力因素对人才成长的作用。因此,素质教育一般应包括思想素质(包括政治、思想、品德、观念等)专业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知识及相应的能力、治学态度、科学思维方法等)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内容。

加强素质教育,要增强反映时代精神的新要素,培养学生的现代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实现条件。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确立现代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不仅对于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活动有着明显的指导作用,而且还将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当前,在对学生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同时,要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注意培养学生开拓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强化学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忧患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责任与成就意识等。

加强素质教育,要通过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健全人格,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学校德育往往要求人们简单地服从,使人们形成了“循规蹈矩”、“求稳怕乱”的心理。“统分统招”的高校招生分配制度和“论资排辈”的社会用人机制,使学生养成了“平均主义”、“不思进取”的懒汉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高校招生分配制度以及教学管理制度和学生培养方式的改革不断深化,不少学生感到恐慌,难以适应,大学生中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患者不断增加。因此,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学德育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敢于竞争、大

胆创新的精神，帮助学生养成公平竞争、敢冒风险、不怕挫折的心理品质。

加强素质教育，还必须在实践中，注意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首先，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广泛接触社会，了解国情民意，培养学生的国情意识、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成长道路。其次，要促进教育与生产实践的有机结合，注意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的培养。要建立一批校内外的教学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定期到基地去进行见习劳动和顶岗实习，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学生结合专业学习开展课外科技创造活动，这不仅可以强化学生相应专业的基本技能训练，还可以培养学生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大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必然会大大增强。

#### (四)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快德育途径和方法的变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大学德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大学德育仅仅靠调整和充实内容是很难完全适应的，只有解放思想，除旧布新，自觉地转变旧观念和树立新观念，在德育思想、德育途径、德育方法等方面才会有新的突破与发展，才能更好地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首先，要打破统一的人才培养模式，采取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方法，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多规格人才。关于高等学校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的问题，始终是高等教育的带根本性的大问题。同样，关于大学德育的目标和具体规格，虽然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却经常会出现偏差和把握不好的情况。我们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品德现状出发，打破过去旧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多规格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

才市场的发展以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越来越多样化，决定了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意识的日趋强化。大学德育要适应社会人才需要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学生思想观念的变化，引导学生在达到德育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发展自己，完善自己，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分类指导，因材施教，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优势，在个人理想、追求、志趣、性格上的多样化发展，鼓励他们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

其次，要积极拓宽德育工作渠道，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德育的概念是广泛的，德育的渠道也是很多的。要提高德育的社会适应性，就要使德育从少数政工干部的工作圈子里解放出来，树立全员育人意识，进一步发挥全体教职工的育人作用，使德育工作深入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去。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他们通过教书育人，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组织教师深入到学生中去，指导他们处理好在学习、择业、交友、健康、生活等方面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使德育工作与关心指导学生的学习、生活、成长相结合。在高等学校，不仅教师要教书育人，各项管理工作、服务工作都与学生密切相关，都要明确育人职责，在管理、服务过程中培养和教育学生。

加强实践环节，重视培养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也是实施德育的重要渠道。学生是学校的“产品”，“产品”的质量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去检验，因此，对学校和学生来讲如何缩短学用距离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加强实践环节，重视培养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能力，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社会实践活动能力，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学生走向社会实际生活所需要的多方面能力，既包括从事专业实践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也包括社会交往能力、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等。在实践活动中要加强管理和指导，明确教育目的，建立必要的保障

措施，真正抓出实效。

改革德育途径和方法的另一重要渠道，就是要注意探索德育的有效形式，使德育工作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德育能否适应社会的需要，关键要从德育在学生身上产生的效果去体现。因此，要研究德育接受理论，探索德育的有效形式，用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把学生吸引到德育活动中来，并在活动中自觉地学习理论，陶冶情操，接受教育。

其三，正确认识灌输与渗透的关系，强化环境育人观念，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成才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是德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其对智育方法上的指导地位是不容怀疑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德育就是“我说你听，我打你通”。这样一来，就只会引起学生的反感与逆反心理，无法收到实效，这也是大学德育方法上的经验总结。我们要转换教育的角度，让德育更加贴近学生，从居高临下的说教到平等地探讨问题；从单纯的要求、管理到为学生的成长服务，努力为学生成才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目前，要特别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用校园精神去凝聚人、感召人，用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去培养人、教育人，用文明优美的校园环境去陶冶人、影响人。通过这些有意识的活动，德育内容渗透在学生的学习、生活及环境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德育工作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求学校有良好的育人环境，同时也要求社会大环境能为学生的成才提供更多的正面影响。要充分认识和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大学德育的影响作用，把优化社会大环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来抓。宣传、理论、文艺、影视广播、出版、新闻界必须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唯有如此，才能使学校德育与社会德育紧密结合，共同育人。大学德育的社会适应性才能在良好的社会氛围中得到全面的加强。

## 注释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第 780—781页。
-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327页。
- 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48—287页。

## 第六章

# 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发展轨迹

### 一、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基本涵义与历史轨迹

#### (一) 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基本涵义

所谓德育个体适应性，是指德育工作必须适应学生个体品质发展的需要，适应其年龄特征、个体特点和思想品德的实际情况，通过教育和引导，将社会的要求转化为学生个体的需要、动机和行为品质，使其形成相应的社会生活能力。具体来说，在高校强调德育的个体适应性，一是要注意研究教育对象的新特点、新变化。比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德育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情况，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加以引导，把大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这是高校德育个体适应性的一层涵义。另一层涵义是指适应大学生的个性差异，如气质、性格、意志、兴趣、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并针对这些不同个体的不同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形式和方法。

此外，这里所说的“适应”，是按照大学生成长的规律和大学德育的基本要求和目标去适应，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去适应，是一种积极的适应，它包括引导和塑造等德育的固有功能，而不是脱离大学德育目标，放弃德育的基本原则，对大学生中的一切不正确思想、情绪和需求也去加以满足。这不叫适应，而是迁就、迎合，其结果必然会助长大学生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滋生，妨碍

其成才。所以我们所指的德育个体适应性，既是适合大学生整体发展趋势的，又是从大学生的个体需要出发的。

## (二) 大学德育适应个体发展的历史轨迹

强调德育工作必须适应对象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思想特点，这是建国以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坚持的最基本原则，但它也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具体来说，可分为四个阶段：

### 1. 建国初期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发表了《共青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的著名谈话，他说：“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sup>①</sup>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的身心特征和工作原则。他说：“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sup>②</sup>因此，必须坚持“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的原则，“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sup>③</sup>。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号召，得到了出席大会全体代表的热烈拥护。大会决定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好”作为今后团的工作方向。从那时候起，大学的德育工作开始注意到对大学生个性特点的研究，能够从大学生的个体需要出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在教育中给予他们高度的信任和尊重，使大学生在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中增强积极向上的自觉性。各高校不仅开设了体育课，增加了球类、棋类、田径类等体育设施，以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培养学生健全的体魄，还开展了“抵制资产阶级侵蚀，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

德”的思想教育运动和“学习文化、掌握知识、向科学进军”的学术活动，“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 2 1957—1965年

1957年6月，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4月在“大跃进”中，全国各高校又掀起了群众性的“教育大革命”运动。在这两种运动的影响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社会性、轻个体性的倾向日益严重。具体表现在：（1）强调“政治挂帅”，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对那些刻苦钻研业务、学习科学技术的人，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进行批判，严重影响了师生学习科学知识的积极性。（2）混淆政治问题、品德问题、心理问题的界限，对待学生中的问题，无论大小都要提到原则高度，都要挖“阶级根源”，不能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造成相当数量的学生表现拘谨和沉闷，不愿敞开心扉，不敢讲真心话，怕说错了话挨批评。（3）把阶级斗争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课”，社会上搞什么斗争，学校也照样搞什么，背离了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禁锢了学生的思想。（4）在教育方式上，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搞形式主义，缺乏针对性和深入细致的个别谈心，使工作实效不大。（5）不能正确处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发动学生对教师尤其是有关学科的专家、教授、学者进行意识形态的大批判，造成师生关系紧张。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德育的个体适应性。尽管中共中央于1959年在《关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要按照学校特点进行思想工作，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要求对“左”的作法进行局部纠正；1961年又在《高教六十条》中提出：“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逐步实现的自我改造过程，应该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对于不同的人不能一律要求。”但当时从全国总体上看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影响使思想政治工作重社会性、轻个体性的局面无法根本扭转。

## 3 “文化大革命”时期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思想政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十分混乱的局面。主要表现为：无视青年的个性特点，违背大学生成长规律，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扼杀学生的个性，禁锢学生不同的思想言论，采用极“左”的方式（如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大学德育不是适应学生个性的发展，而是变成了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阶级斗争的工具。

#### 4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我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与此相适应，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进入了全面振兴和拓展时期，于是不少好的经验和方法便脱颖而出。

（1）加强了对大学生个体的研究，建立了大学生心理学、大学生社会学等许多新型学科，为德育个体适应性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从80年代初开始，大学德育不仅注重社会性要求和规范，而且注意研究大学生群体自身的思想心理变化规律和可接受程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首先，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为掌握教育对象的真实情况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开始从定性研究转向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如从1986年开始，中共北京市委、北京高校工作委员会等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等对80年代首都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道德面貌等进行了连续的滚动调查研究，这些调研成果为有关领导部门、高校教师比较准确、及时地把握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制定有关决策，加强和改进学生教育工作，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其次，加强了对大学生心理发展的重点研究。因“文化大革命”给大学生内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同时在改革开放、历史转轨时期，各种矛盾不断出现，使身心正在走向成熟又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心理问题日益增多，促使教育工作者开始转移视角，重点研究大学生生理、心理变化规律和个性特点，并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来建

立大学生研究体系。从 80年代初至今，已建立了青年心理学、青年社会学、大学生心理学、大学生社会学等许多新兴学科。第三，针对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生长在不同生活环境、有着不同个人经历的大学生群体，加强了对各个阶段的特殊矛盾的研究。如对大学新生、女生和毕业生教育的研究以及大学生犯罪团伙、非正式群体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在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著和论文中有专门论述，而且有许多高校还形成了独特的作法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如华中理工大学为了加强新生教育，促使新生较好地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第一过渡，专门成立了一年级党总支和一年级工作部，制定了专门的《华中理工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学生管理条例》，从 1989年秋季起，对全体一年级本科学生实行“校内军训，集中管理”。严格的军事管理和养成教育，使新生一入学就逐渐形成了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严谨的学风。

(2) 根据学生的年级特点和思想实际水平，有层次、有步骤地安排德育内容。根据《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除《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两门为必修课外，一年级开设《大学生思想修养》课，帮助大学新生明确学习目的，养成良好的文明道德习惯，以适应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二年级开设《人生哲理》课，帮助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三年级开设《职业道德》课，以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树立选择职业的正确态度，为四年级正确择业做好准备。《意见》规定这三门课可因校制宜有选择地开设。因此，部分高校在课程安排和课程内容上有差异。有些师范院校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民教师，不单独开设《大学生思想修养》课，而是把大学生的基本修养和人民教师的基本要求融合起来，开设了《教师伦理学》课，这些课程能从学生将来的职业选择出发，联系学生最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很受学生欢迎。

(3) 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一个历史转轨、社

会复杂多变和自身身心发展不平衡的时期,心理矛盾日益突出。据1989年初国家教委对全国12.6万名大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心理疾病患病率达20.23%,在许多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心理疾病已成为大学生休学、退学、死亡的主要原因。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渐渐为人们所重视。1986年11月,深圳大学率先成立了心理咨询机构,给予学生心理辅导,解决大学生心理障碍问题。1988年6月,在上海召开首届咨询教育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并筹备了高校心理咨询研究会,编辑了《高校心理咨询通讯》。自这次会议后,一部分高校纷纷建立了心理咨询室,举办心理讲座,开办《社会心理学》《人际关系心理学》等选修课,并免费对大学生进行心理诊断和治疗。1988年,湖北省青年心理研究所成立,并率先创办了第一家心理咨询杂志《青年心理咨询》。1990年11月,中国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经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会批准成立,标志着中国高校心理咨询事业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心理咨询业的发展是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不断深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尽管德育个体适应性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并有新的进展,但由于“左”的影响一时难以清除,在80年代中后期,德育个体适应性又曾出现过一段曲折。1986年前后,西方哲学思潮充斥大学校园,其中对大学生人生观影响最大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这些学说都从极端的自我出发,宣扬“存在就是一切”,“自我存在,自由选择”……这些观点深入大学生头脑,促使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不断膨胀,“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口号在大学校园内流行。可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此并未引起重视,有些人还撰文对此不加分析地表示赞赏,迎合了部分学生膨胀的“自我意识”,以至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精英”意识,强烈要求所谓的“民主”和“参政议政”。于是从1986年开始先后发生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学潮,大学德育工作出现了曲

折。直到十三届四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恢复了对大学生实事求是的评价后，大学德育才出现新的生机。

## 二、加强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实践经验

强调德育必须适应教育对象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思想特点，一直是大学德育的基本原则。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继承优良传统，克服错误的和片面的作法，是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研究的重大任务，也是今后德育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

（一）科学地分析与评价大学生，是加强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前提

大学德育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要加强德育的针对性，提高德育的实效，第一步在于科学地分析与评价大学生的特点，包括大学生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个性差异、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等。只有分析正确，评价得当，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建国以来，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观点，用历史的方法、动态的方法，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与评价大学生，使大学德育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sup>①</sup>这种评价正是抓住了青年大学生的本质和主流，我们党便依此制定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针对青年特点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培养了一批像雷锋这样的优秀青年和一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但“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对知识分子评价极“左”，把他们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要把学生培养成“反潮流”的英雄，这使德育工作走了大弯路。改革开放后，我党又

回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与评价大学生的优点与不足。如 1989 年“政治风波”后，江泽民同志作了题为《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长篇报告，概括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对青年知识分子重新给予了正确评价。他说：“我们的青年知识分子整体上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积极上进，具有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真诚愿望，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可喜的成绩，这是青年知识分子队伍的主流。”尽管青年人涉世不深，实践经验少，存在一些弱点和不足，但是“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江泽民同志的报告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青年学生消除了“六四”后的一些对立思想和情绪，认识到党对知识分子，对青年学生的态度是热情的，评价是客观的，也进一步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正确的思想引导下，当代大学生能以热情、自信的态度努力学习知识，参与社会实践，培养各种能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总之，从历史经验看，什么时候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与评价大学生，我们的工作成效就大；什么时候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我们的评价就会失误，教育工作就会出偏差。

(二) 注意研究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是加强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基本任务

德育要讲求个体适应性，首先一点是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个性是指主体对人对事的稳固的、定型的态度体系和行为模式。青年时期是个性心理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不仅青年的自我意识、思维的独立性、情感和意识都已显著发展，近于成人，而且在个性心理品质方面也显示出很大的差异性。有的学生热情、开朗、活泼，但缺乏意志力；有的学生深沉、内向、多思，但不爱交际；有的学生大胆、自信，但不仔细；有的学生胆小、自卑，但态度认

真。个性鲜明是大学生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大学生发挥创造性的源泉。只有承认这种个性差异，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并通过教育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和良好的个性品质。建国初，毛泽东同志就很注重青年的特殊利益、特殊要求和特殊差异，强调指出，“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sup>⑧</sup> 1956年，林枫同志在“八大”的书面发言中，强调要正确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注意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在实践工作中，学生的个性并未得到真正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把学生的个性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主义，把大学生的特点当作缺点，过分强调社会需求，压抑个人的正当需要，排斥个性的多样性。如习惯于把那些循规蹈矩、听话顺从的学生当作好学生，而对那些有自己独立见解或有某些特长的学生则认为是“骄傲”、“任性”或“异想天开”，使他们在评“三好”、发展党员时受到影响；在德育目标上，轻视或忽视学生的层次性和个体差异性，把“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作为大学生的统一要求，带来了学生实践行为和社会要求的强烈反差；在德育内容上，重视大学生的政治观、政治方向的教育，而忽视了大学生道德修养和个性心理素质的培养，习惯于把“心理问题”、“品德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用政治手段予以解决。这种状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提出了不同要求，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也明显增强，个性发展才开始得到社会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了教育者的任务就在于培养一个人的个性并为他进入现实世界开辟道路。许多高校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的个性尽量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如自80年代起，针对学生兴趣广泛，各有所长的特点，成立了不同的社团组织和协会，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技术咨询以及竞赛、讲座等活动。当学生在自身喜爱的活动中展现才华时，他们体验到了“人格”的力量，激发了自尊心、自信心和上进心，加深了对社会、对他人

的理解和宽容，锻炼了意志力，也陶冶了性格，为他们早日完成社会化，形成健康人格做了准备。另外，有些高校还针对学生关心的学习、就业、交友（包括恋爱）三大人生课题，相继成立心理咨询机构，举办心理讲座，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在解决学生在这三个问题上的疑点和困惑的同时，着力塑造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包括正确的态度，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目前，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素质已成为增强德育个体适应性的一项基本任务，心理咨询也就成为德育工作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

（三）确立受教育者的客体——主体地位，引导大学生增强自我教育和自律行为的自觉性，是加强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种特殊的个体，它具有主体和客体两重属性。他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在人类活动中，人是主体。在特定的领域范围，人又是客体。就德育而言，教育者向学生传播一定的思想道德观念，学生是受教育者，处于客体地位。在一定意义上，主体传授什么，客体就接受什么，这是客体的受动性。但作为客体的学生又是有着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的现实的人，从接受、消化、理解直至外化行为全过程讲，作为客体的学生又是主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教育者传授的理论，并将其转化为个体意识，外化为现实的行动等等，都主要取决于学生自身内部的思想矛盾运动。就德育效果看，教育者对客体的影响和引导只是外在因素，而客体（从对象本身看，又是认识主体、行为主体）自身发展状况和自我教育程度才是衡量教育效果的活的标尺。

历史经验证明，承认学生的客体——主体地位，通过社会实践和自我管理来增强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律精神是增强德育个体适应性的重要途径。在建国初期，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北京大、中学校数万人组成宣传队一起出动，深入工厂、农村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把自己已解决了的问题，帮助群众来解决”，“在向群众宣传中来教育自己”。广大学生

在支援抗美援朝的各种宣传教育、军事学习、物质资助的过程中让自身也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并成为高校学生自我教育的生动教材。改革开放后，大学生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式的自我教育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自 80 年代中期起，各高校相继在一些工厂、农村、部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实践基地和“社会实践建设营”。学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开展智力扶贫，参与铁路、油田、港口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后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形式日益丰富多彩，不仅限于社会考察、公益劳动、基层锻炼，还扩展到科学研究、经济预测、技术开发、知识咨询等领域的有偿性的勤工俭学活动。这些活动现实性强，活动范围广，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内心世界，提高了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增强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责任感，促进了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除此之外，校内自我管理也是发挥学生主动性，进行自我锻炼的良好场所。深圳大学于 1984 年率先创立了学生自己管理勤杂工作的模式。学生生活有困难，不是依赖国家助学金，而是通过学生指导委员会、劳动服务公司找事情做。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学生自立精神、自助能力显著增强，他们一般踏上工作岗位以后，很快就能适应工作，成为受社会欢迎的人才。

总之，在德育工作中确立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给学生提供自我锻炼、自我培养、自我提高的机会，以加深学生对德育目标的领悟和践履，这是增强德育个体适应性的重要途径。

(四)对大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爱护，既不吹捧，又不贬低，这是加强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重要原则

大学生是有着特殊的利益和要求的群体，他们既有像儿童那样好玩的需要、蹦蹦跳跳的需要，也有像成人那样自尊的需要、独立的需要，以及求知、求美、求乐、求偶等的需要。面对这个特殊群体，德育工作者应尊重他们，在思想、学习、生活等各方面关心他们，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对不合理的、暂时不能满

足的，要积极予以引导和调节。另一方面，大学生尚未完全成熟，在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缺乏稳定性和自觉性，任性、放纵、散漫等现象经常出现。因此，还需要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在管理措施上，给以一定的纪律约束，对严重违反纪律的学生给予恰当的惩罚。但是，学生的可塑性很大，这些问题又是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育者必须在尊重和信任学生，诚挚而热情地关怀学生的前提下提出严格的要求，对学生既不吹捧，也不贬低，把“严”与“爱”结合起来，才能有助于学生形成健康和谐的人格。

对大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爱护，这是建国以来德育工作一条最宝贵的经验。建国初，毛泽东同志一方面谆谆告诫青年学生，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另一方面，又极为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他多次对青年学生健康不良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后，提出了诸如增加助学金，改善学生伙食，减少课业负担和社会活动之类的建议。周恩来同志为了让学生懂得生理发育的自然规律，以便健康成长，还提出要向青年公开进行生理卫生教育和性教育。在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怀下，建国初期的大学生们基本上是沿着德、智、体和谐发展的轨道成长的。涌现出了一大批“三好”学生。但是在以后一段时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冲击，“严”与“爱”的原则常被扭曲，对大学生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如1985—1988年间，在社会消极因素和西方哲学思潮影响下，大学生自我意识不断膨胀，要求参政议政的呼声不断高涨，此时理论界和舆论界一些人就对大学生大肆吹捧，说当代大学生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部分”，是“觉醒的一代”，德育工作也放松了对大学生的严格要求和正确引导，结果加剧了大学生“政治精英”意识的形成，导致学潮连续发生。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各高校总结经验教训，摆正“严”与“爱”的关系，逐渐把尊重、信任、关心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结合起来，使德育工作落到实处，

工作更加深入、扎实。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堪称模范。无论是在教室、宿舍，还是在食堂、操场，只要是学生集中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班主任和辅导员的身影。他们主动和学生交朋友，学生有了问题，实事求是地给以解答，不光政工干部如此，学校领导也是这样。负责学生工作的有关领导，都把自己办公室和家庭的电话号码在学生刊物上公布，学生反映的情况，即使很小，也及时处理。教师的关心、尊重与理解以及教师自身的人格感召，赢得了学生的信任，他们对学校的严格管理也乐于遵守，并形成了一种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良好学风。总之，只有把严格要求建立在对学生尊重、爱护、关心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学生的认同与接受，也才能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健全的人格。

(五)针对不同个体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一刀切、一锅煮，这是加强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不仅有共性，而且有个性。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即个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德育工作的对象是人，而人是千差万别的，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人，在年龄、性别、民族、家庭、知识、个性等方面均有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针对这些特点有的放矢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他曾多次讲到射箭要对准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要考虑对象，做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就要了解群众的思想脉搏，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否则就叫“无的放矢”。建国初期，中央一再重申：必须针对学生的思想情况，用具体的事实，采用启发、说服的教育方法，按学生的年龄、经验、接受能力，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地进行教育，不仅在德育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上注意把党员和非党员群众，学生干部和普通学生，劳动人民出身的和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区别开来，而且还经常深入学生宿舍，和学生促膝谈心，一个人一个人做工作，赢得了广大学生的信任和拥护。但是后来，这

个传统被打破，出现了形式主义，对待学生中的问题，“无论大小都要提到原则高度”，都要挖“阶级根源”，结果造成相当数量的学生表现拘谨和沉闷。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在实际工作中，高校逐步改变了运动式的思想教育方式，注意调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心理疑难，分析原因，对症下药；在教育中尽可能照顾学生特殊的年龄要求、身心特点、思想层次和个性差异，融针对性、感染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因而备受学生欢迎，德育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总之，只有区分层次，因材施教，才能把德育工作做到学生的心坎上，使学生从各自不同的起点出发，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前进。

（六）把握青年学生的可塑性特点，坚持正面引导，以理服人，这是增强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基本要求

青年学生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青年时期是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受到他们的生理、心理发展和社会经验的限制，他们的世界观还未定型，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变动性。把握青年的可塑性特点，就要正确看待青年的长处和不足。青年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中既是不断前进的，又是有缺点和不足的，这些缺点和不足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教育、学习、实践而得到克服的。因此，德育工作者应从关心青年健康成长，帮助青年学生养成良好的品德习惯出发，从一开始就对他们进行耐心说服，给予正面引导，通过发扬他们的长处和积极因素，启发他们逐步认识以至克服自己的短处和消极因素，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状不满，

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sup>④</sup>如 1989 年的动乱，许多不明真相的学生卷入其中，给国家的现代化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事后，党和国家并没有因为学生参与“闹事”就对学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除极少数触犯刑律者外，都抱着“既往不咎”的态度，采取正面引导、说服教育的方法，深入到学生宿舍或把学生请到家里，促膝长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过一个多月的耐心说服教育工作，大部分学生都渐渐消除了对立情绪和不安心理，专心投入到学习中。总之，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只有坚持疏导方针，以平等的真诚态度引导大学生克服弱点和不足，才能促使学生思想品德向良好的方面转化。反之，若无视青年学生的身心特点，一味指责，或采用强迫的方法、压制的方法对待学生，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有时还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和上进心，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促使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意识向社会要求相反的方向发展。

### 三、探索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新思路

建国 40 多年来，因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大一统”模式的影响，大学德育带有明显的“重共性，轻个性”、“重社会，轻个体”、“重统一，轻多样”、“重过程，轻结果”的痕迹。德育个体适应性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今天，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面临新的挑战。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对大学生的知识、能力、人才规格提出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要求，而且带来了大学生思想变化的多样性、特殊性。德育个体适应性研究不仅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且要研究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大学生思想变化的新特点，探讨新时期大学生德育个体适应性的理论思路和工作方法。

(一) 确立教育者、受教育者的主导——主体地位，建立一种共同学习、双向交流的德育工作模式

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过程一直把教师放在施教者的地位,领导者的地位,把学生放在受教育者的地位,服从者的地位,因而只有教师对学生、长者对青年人的教育。改革开放后,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在理论上开始得以确立。但是,矫枉容易过正。有段时期,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过度膨胀,视自己为“天之骄子”、“政治精英”,而认为中老年人思想保守,头脑僵化,因而不尊重老师,甚至鄙视老师,这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承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于世界范畴的许多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理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几乎都是站在同一个认识起点上,教育者知之不深的问题,也许正是受教育者思之较多的问题,而受教育者要真正解决这些新问题,又离不开教育者的扶持和帮助。在这里,既有受教育者向教育者请教的任务,也有教育者向受教育者学习的任务。今天的大学德育更具有教学相长的特点,我们不应是站在纯教育者的位置上,向教育对象进行单向的灌输;也不是置教育引导于不顾,一切任学生思想自由发展。我们应将教育对象放在主体位置上,实行双向的信息交流、观念碰撞和思想启迪。

这种模式具体体现在:

### 1. 德育教学双向化

德育教学过程不再是教师一人唱独角戏,而是教师与学生双向交流、教学相长的过程。在当前,当学生和当先生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且学生的自我意识、思维的自主性、独立性与以往的大学生相比都大大增强,对客观事物的动态发展,对理论和规范的指导性、适用性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要改变过去那种单向的信息传递方式,实行平等的交流和共同的探讨。课堂上,教师可向学生介绍理论界对某些问题的研究状况,同时也可以阐明自己的观点,然后采取提问的方式,了解学生对问题的认识程度,并逐步形成几个重点研究的专题,组织学生深入讨论。在专题讨论的基础上,学生写出专题论文,最后由

教师评定成绩，进行讲评，好的论文可推荐发表。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教师与学生的教与学的积极性，真正做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 2 德育管理民主化

管理一般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特点，但要让管理真正发挥教育功能，还须依靠被教育者的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确立受教育者在德育管理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来培养大学生的自律精神、自控能力是加强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有效方式。无论是校系管理还是班级管理，首先管理者要有明确的德育宗旨，阐明其意义，然后与那些有能力、热心为学生服务的学生代表或全体学生共同商定做什么，达到什么程度，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努力制定一个既有科学性，又有较强操作性的管理目标和计划。学生对管理中出现的不合理现象，可以随时向学生代表、管理部门提出疑义或自己的见解，重新商议解决。总之，要发挥每位同学的主动参与精神，运用他们的责任意识和能力去协调管理部门与学生个人的关系，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 3 日常德育隐性化

以往的德育工作是重显性的，除了课堂讲授外，就是开展各种教育活动或进行个别谈心。显形的德育教育并不能达到最佳德育效果。在现代学生思想活跃、自主欲望强、爱好广泛的情况下，可开展丰富多彩的、隐性的教育活动，使学生在自我参与中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能力，并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隐性教育活动可以通过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形成向大学生全方位、高强度的辐射，对其他人具有渗透性影响。在高校最具有特色和优势的隐性教育是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具有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交流信息、培养能力、学会与人相处，达到个性充分发展、才识全面提高的功能。但是，由于缺乏引导和系统管理，这些活动在德育方面功效并不显著，有些活动单纯注重娱乐性，思想性不强；有些活动甚至给学生以错误的价值导向。因此，教师尤其是

德育工作者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参与活动目标和计划的制定,对骨干的培训和活动的具体内容、时间、过程和操作程序的综合管理,使学生在主动参与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德育的熏陶和人格的提升。教师也可以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更清晰地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把握学生的主导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总之,加强德育的个体适应性,促进学生个体的健康成长,既靠教师的引导,也靠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提高。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向交流的德育模式中,当学生和当先生都是相对的,教育者既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需要,考虑受教育者的现有知识结构和思想品德基础,把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理想要求以一种受教育者能接受的形式进行信息传递,同时受教育者也把自己的知识经验总结和思考的答案向教育者进行反向传递,形成一个动态的信息循环流,以提高信息的真实性和可接受性,增强教育的效果。

(二)根据大学生主动参与、平等对话的需求,建立咨询性教育模式

增强德育个体适应性,不仅在总体上要强调师生的双向交流,而且在内容和方式上也要体现学生的主体要求,加强平等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学德育无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内容、方法上,实施的都是社会替代选择模式,即由少数理论工作者或领导人从浩瀚的人类文化智慧中选择或者自己独创一套价值体系、道德政治理想,作为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蓝本,然后,由教育工作者硬性灌输给大学生。这种模式对加强集中统一的教育和管理,树立集体主义观念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弊端很多:其一,过分夸大社会需要和教育者主观需要,压抑学生自身合理需要的正常发展。其二,忽视了个人对价值观、道德信条和政治理想的选择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理想选择的多样性和价值观念的开放性,限制了人们的思想活力,造成了“舆论一律”的窒息气氛,使

人们的思想得不到解放。其三，人为地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树起一道藩篱，出现了“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说教局面，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难以激起对真理的热情和执着的追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主意识逐渐苏醒，精神上独立的需求日趋强烈。在外部世界千变万化，学生接收的信息量与日俱增的情况下，给学生授以现成的结论已不可能，学生自我判断能力和道德选择能力是决定其思想行为的关键，高校德育将从社会替代选择方式向帮助学生个体自主选择的方式过渡，咨询性教育模式就是帮助学生实现个体自主选择的重要方式。它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咨询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针对大学生所关心的专业学习、就业、交友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心理问题，提供多方面的信息和选择方案，让大学生自己学会选择，学会思考。咨询性教育模式既强调了个体的自主选择权，也突出了德育工作的引导、塑造功能，即通过教育者的启发、诱导，使学生自主选择与社会要求一致的价值观和政治理想。

与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相比，咨询教育具有如下特点：

(1)咨询内容的广泛性。咨询性教育一改过去思想工作单纯注重政治教育，忽视学生思想领域和心理状态的缺陷，把大学生所关心的择业、学习、生活、心理卫生以及社会发展和人生观问题等都作为咨询的内容，分别设立相应的咨询指导中心，提供相应的信息和处理方案，以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

(2)咨询关系的平等性。咨询教育一改过去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地位悬殊的缺陷，尊重咨询对象的自主性和自愿性，以朋友的身份与咨询对象平等地交流思想，以“参谋”的口吻提供多种选择方案，使咨询对象在不被勉强的情况下进行自我选择。

(3)咨询方式的渗透性。咨询模式改变了过去教育者单向信息传递方式和空洞的说教方法，根据咨询对象的特殊需要，采用个别谈心和群体性的游戏活动方式帮助咨询对象发泄心中苦闷，予以指导和疏通。咨询教育是通过某一心理障碍的消除来达到解

决多方面问题的目的，具有很大的间接性和渗透性。

(4) 咨询教育的超前性。咨询教育可克服过去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击式、“救火式”的被动作法，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预先从学生和社会中了解各种信息，并对此迅速进行综合处理，确定咨询内容，制定咨询方案，使其更贴近学生实际。因此咨询教育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5) 咨询队伍的整体性。由于咨询内容的广泛性和咨询信息的迅变性，这就对咨询队伍提出了整体性要求，即不仅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参与其中，而且教学人员、管理人员、后勤人员也要投入进去，由不同的人员组成不同的辅导中心，各司其职，彼此沟通，使学生能接受到全方位的信息和咨询，以促进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

### (三) 加强对德育接受过程的研究，建立德育接受理论

增强德育个体适应性，不仅体现在实践中要尊重大学生的个体发展需求，而且体现在理论上要重视对大学生接受德育过程的研究，因为理论对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重视德育传授的研究，习惯从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的角度探讨德育效果。把受教育者单纯作为受体，或者把他们的心理理解为“白板”一块，任由教育者涂抹。实际上，教育效果的好坏，归根到底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接受内容和接受程度。受教育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体，已有了一定的思想、观念、习惯的沉淀，对教育者输送的信息不是什么都能接受的，而是根据自身的期待与接受能力进行选择、加工。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期待的人选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对同一教育方式也会有不同的反应，由此就决定了德育的正效果、零效果和负效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接受的信息、思考的问题远远超过从前，反映在他们的心理机制上，有的是扩大了原有的认知内容，丰富了原有的认知结构，有的可能是修正已有的认知结构，接受新的信息，建立了新的认知体系，这就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对信

息的选择性和接受的深刻程度。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教育达不到预期效果，这不仅与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有关，还与大学生（接受主体）对德育的自我选择、评价和践行能力有关。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中，我们不仅要研究怎样育德，更要研究对象怎样接受德育要求，从而建立系统的德育接受理论。

德育接受理论是指研究大学生接受德育的特点和规律的理论。作为一门新提出的课题，要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国内有的学者是从德育的接受前提、过程、个体差异性去构建其基本体系。而我们只着重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学生接受德育的内部因素及其心理准备；二是大学生接受德育的外在影响及其思想诱因。这些因素和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学生接受德育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基础。

从内在因素看，目前影响大学生接受德育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种：

（1）价值观。大学生已对社会、对人生形成一定的态度和价值观取向，这种价值观越是持久，大学生接受新的思想信息难度就越大，具体表现在对教育内容的接受上。如受西方利己主义价值观影响很深的人很难接受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而一个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共产党员就比较容易接受这种价值观的引导。

（2）思维方式。它是影响大学生接受德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对德育内容的选择上。思维方式比较全面、辩证的人，在接受教育时会有一定的理性思考，对问题基本上能抱着“一分为二”的接受态度；而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的人则容易被表面现象所吸引，不易形成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3）情绪情感。处于青年中后期的大学生已形成丰富的情感，但情绪易波动，具有两极性。情绪情感对德育接受的影响既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方法上。一般来说，自信、快乐、满意、喜爱等愉快的情绪情感体验容易使对象接受教育者的正确引导；而当人处于自卑、嫉妒、厌恶、烦躁等不快的情绪情感体验时，对

教育者的正确教育基本上处于消极应付状态，若方法不适当，还容易造成强烈的“逆反心理”。

(4)个性特征。个性特征包括气质、性格和能力。它是影响德育接受者的又一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对德育方式的接受上。比如对性格急躁的人，不宜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对问题最好点到为止；对性格稳重的人适于有条不紊的说理教育；对性格外向、乐观的人应侧重于表扬和鼓励；而对于性格内向、抑郁或自卑的人，则应进行热情的关怀和耐心的帮助。另外，坚定的意志和信念、健全和谐的人格、广泛的兴趣爱好等等，也对德育的接受程度有重要影响。

从外在因素看，当前影响大学生接受德育的主要因素有：

(1)社会环境氛围。大学生接受德育是在一定的外在环境氛围中进行的。社会环境是影响大学生接受德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外在因素。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还是社会传播手段以及社会风气都影响大学生接受德育的内容和方式。如在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平等和谐的人际氛围中，大学生接受学校德育教育一般比较积极主动，德育内容的选择也比较顺利；而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转折时期或在一个专制的人际氛围中，大学生对德育内容的接受和选择就比较困难和被动。另外，在接受方式上，现代大众传播手段和视听设备要比单纯的语言说教对大学生更具有感染力和渗透力。

(2)家庭影响。家庭不仅是大学生生活的来源、感情的纽带，而且是影响大学生思想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大学生接受德育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在宽松、和谐、民主、友善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并接受了良好的家庭道德教育的学生，对学校正规的道德纪律要求和思想教育都能抱着主动接受、自觉遵守的态度。而在专制、溺爱、冷漠或缺乏良好道德教育的家庭中长大的学生，往往对学校的道德教育抱着对抗或冷漠的态度。因此，要提高德育接受效果，还要积极寻求学生家庭的配合，发挥家庭教育中的正面效应，

克服家庭教育的消极影响，使学生能在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一致配合下自然顺利地接受德育提出的社会要求，从而健康成长。

(3)学校教育者自身的形象。教育是通过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共同完成的，教育者自身的形象和素质对教育对象能否接受其教育有直接影响。一般来说，教育者在工作刚开始时，能给对象留下较好的第一印象，教育者知识渊博、为人正直诚实、富有幽默感、关心体贴学生等良好的形象都易使学生对其教育抱宽容服从的态度；相反，教育者自身待人冷漠，不关心体贴学生或耍两面派作风，则很容易使学生对其教育抱反感态度，或明显对抗。因此，教育者要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学生作表率，这也是促进大学生接受德育的动力。此外，美的校园环境、宽松的文化氛围、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都是促进德育接受的有效因素。

以上是影响大学生接受德育的几个重要因素，怎样克服其消极影响，优化大学德育的接受过程，建立最佳德育接受效果，这些问题还有待人们深入探讨，为建立系统的德育接受学而努力。

## 注释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1页。

②③同①，第699-70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7页。

⑤同①，第701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 第七章

# 大学德育运作方式的变革

大学德育运作方式，是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以及操作方法的总称。所谓运行机制是指大学德育实施的体制、机构和工作制度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活动方式是机制运行的式样。操作方法是在活动方式中所采取的具体手段。随着大学德育运行机制、活动方式和操作方法的变化，其运作方式也将发生变革。由于本书另有章节专门论述大学德育的运行机制，因此，这一章将着重讨论有关的活动方式和操作方法问题。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大学生个体特点的变化，大学德育的运作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革，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形成了一些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新形式和新载体，如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心理咨询等。这样，就使大学德育能够借助新的载体以崭新的活动方式运行，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德育运作方式的变革，总结德育新载体在运行中的经验教训，是加强和改进大学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 一、校园文化的凸现：陶冶式教育的新发展

#### (一) 校园文化的兴起

校园文化是校园内以价值观念为核心，并由承载这一价值体系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氛围。它能以其强有力的感染作用和陶冶作用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产生影响，成为

新形势下最受学生欢迎的德育新载体之一。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校园文化与学校相伴而生。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学校，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校园文化。建国以后，在 50 60 年代，尽管“校园文化”这一概念未在高等学校普遍采用，但是，党和政府要求各高校在努力建设各具特色的优良校风和学风方面，在组织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和社团活动方面，却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早在 1950 年 6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周恩来总理就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理论与实际、团结与改革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要求各高等学校坚持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的方向，努力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建立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学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校风。一方面要坚决克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偏向，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轻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规程》还对学校的团组织及活动作了专门的规定，对指导 50 年代高等学校的社团活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1961 年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条例》总则规定：“高等学校应该努力树立理论与实际统一、高度的革命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统一的学风。”要求在高等学校必须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些规定，对于经过 1958 年“教育大革命”以后恢复和重建高等学校的学风与校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条例》对学生的课外活动和课余生活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提出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充实学生的课余生活，要适当组织各种学术讲座、专题报告、学术讨论会和研究会，吸收教师和学生自由参加。并再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不同观点的自由争论。同时，对学生的课外学习和文娱体育等活动，都要求贯彻自愿参加的原则，允许自由结合，不要强求一律。《条例》的这些规定，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成为 60 年代

前期各高校加强学风和校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在中央一系列文件精神指引下，各高校十分重视自己的校风和学风建设，把校风和学风建设看作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才的重要途径。他们根据学校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全面规划校风建设的目标，在师生员工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落实工作，狠抓研读马列之风、勤奋好学之风、艰苦朴素之风、团结友爱之风、革命进取之风等等，使之成为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作风和群体价值观。同时，狠抓社会主义大学的优良学风，要求在师生中树立坚韧的治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并且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 50—60年代社会主义大学的新型学风，对培养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起了重要作用。

校园文化除了校风和学风之外，还包括校园环境、文化活动和各种文化设施等。建国以后，各高校都非常重视校园环境建设，对学校的建筑风格，对校园绿化美化的标准，对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的构建等，都十分讲究。其目的在于利用自然山水、花草树木、名胜古迹、历史事件，或艺术雕塑、名人画像、警言语录、文化景点等，来陶冶学生的情操，塑造美的心灵，使学生通过耳濡目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历史文化的熏陶和革命传统教育。以清华大学为例，当人们走到水木清华朱自清塑像前时，不仅会回忆起他那脍炙人口的《荷塘月色》，更令人想起他那“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民族气节；当你瞻仰闻亭旁闻一多先生塑像时，无不为他那种不畏强暴，拍案而起的大无畏精神所感染；而当你走到清华英烈纪念碑前，总会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先烈们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热爱祖国，敢于斗争的崇高精神。可见，校园人文景观的建设，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育人的作用。

至于各高等院校组织的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艺活动，构成了其校园文化的另一个侧面。许多学校都组织了合唱团、军乐

队、民乐队、舞蹈团、戏剧社、诗社等文艺团体，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文艺演出活动，丰富了师生的文化生活，提高了审美情趣和文明程度，形成了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成为优良校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后，“校园文化”的概念被正式引入高校。随着高校德育工作的深入发展，校园文化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学校园。由大学生自愿组织起来的各种学术社团纷纷涌现，校园文学创作活动、校园歌曲创作和演唱生机勃勃，各种文艺演出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节、艺术节活动蓬勃发展，以各校特点为标志的校徽、校标、校训、校歌以及纪念册、贺年卡等琳琅满目，反映各校历史文化传统和革命风范的校园文化景观大量兴建。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校园文化已成为高等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这个时期校园文化会在全中国高等学校悄然兴起呢？这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首先，社会的变革影响了校园。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左”的思想文化禁锢；由农村改革带动的整个社会经济变革，促使人们改变思想和更新观念，使视野更加开阔；对外开放的环境，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使人们有可能在这种新的文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过去，思考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参与中国同世界文化的交流。这种开放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心理环境，激发了大学生思维的创造性与灵感。于是，校园成为社会文化思潮的汇合口，成为中外文化交融、碰撞的前沿阵地，校园文化便由此而凸现出来。

其次，社会变革影响校园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大学生参与意识逐渐增强。新技术革命对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传统的教育模式仍然是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重智育完善，轻人格塑造，与现代化所需的复合型人才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单一的课堂教学已经不能满足青年学生求知成才的渴望，他们便把主要的课余精

力投向第二课堂。于是，反映大学生广泛追求的学生社团活动蜂涌而起，大学生参与经济建设、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普遍高涨。随着大学生参与意识的强化和参与行为的出现，大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中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并逐渐成为校园生活中的主体。这是校园文化得以广泛兴起的重要原因。

其三，文化研究由总体考察向多维度操作研究的转换。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发端于 80年代初。“文革”的直接结果引起了人们对文化的思考，并把文化研究正式列入人文社会科学之中。与此同时，国际文化研究的重心也相应转换。以美国“泰勒制”为代表的企业科学管理被以日本为代表的文化管理所取代，应用文化研究日益成为显学，“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区域操作文化理论已经脱颖而出。在这种情况下，校园文化便以独立的姿态空前活跃在大学校园中。从 80年代初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高等院校相继推出了以建设校园文化为宗旨的文化艺术节活动，这些活动迅速影响到全国，并受到大学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到 80年代中期，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活动迅速形成高潮，并成为大学德育赖以实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与此同时，有关校园文化的研究也很快发展起来，并得到教育学、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等理论界的高度重视。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形态，在高等学校迅速发展起来。

## （二）校园文化的结构及其功能

从校园文化的存在形态上看，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组成一个圈层结构，最外面的一层是校貌，中间一层为校规，核心层次属校魂。校貌是校园文化的外显层面，包括校园生态环境、师生形象以及校园建筑布局。它是校园文化的物质形态，这种物质形态并非单纯的实体存在，其中蕴含着一定的情趣、意向和氛围，可以起到控制人的情绪、约束人的行为、潜移默化、启迪智慧以及行为示范的作用。校规是校园文化的中间层面，包括法令的、道德的和行政的各种规章制

度和行为准则。它是校园人在交往过程中缔结的社会关系以及用于调控这些关系的规范体系。校规属校园文化的制度形态，它以强制或非强制的力量维系着校园人文化价值的认同，约束着每个成员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所以校规是校园人互动的准则系统，是联系校园人际关系的纽带，是一切校园文化活动的准绳。校魂是校园文化的内隐层面，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判断体系。它是校园文化的精神形态，它所造就的氛围，弥漫在每个个体周围，使个体的言行举止都染上它的色彩，从而形成某种趋向和定势。这种氛围的辐射与传承，便形成一所学校的传统与风气。校园文化的精神形态是其核心和灵魂，它体现学校的本质和个性特点。精神形态中的价值观念又是校园文化最内隐、最深层的因素，它通过校规与校貌时刻支配着校园人的外显行为。这样，校貌、校规与校魂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校园文化系统。这三个逐级递进的层次是校园文化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我们称之为校园文化的静态系统。

然而，从校园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校园文化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其动态形式不仅表现在各个层次中的有关因素彼此产生相互作用，如在校貌中，学校的生态环境、师生形象和校园建筑布局之间都必须互相适应，相得益彰；而且层与层之间也在互动，如校规总是制约校园人的行为，对校魂和校貌都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校魂又是校规和校貌的价值体现，有什么样的校规和校貌，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校魂。诸如此类的相互作用，强弱兼有，此消彼长，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以校魂为核心，产生并形成一股强烈的凝聚力。这股凝聚力一旦形成，不仅弥散在校园内，而且辐射至校外，使校园文化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校园文化系统既是动态的系统，也是开放的系统。

校园文化作为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系统，有其完整的内在生存机制，即文化传承（同化）、文化互动、文化生产和对外辐射等

环节。文化传承主要是通过校貌对大学生尤其是新生进行感性的同化教育，使之具有初步的校园价值观念和意识。文化互动是通过校园文化各个层面以及各层面的相关因素横向的与纵向的交互作用，形成各种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力量，左右并调整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使其行为纳入校园文化系统之中。文化生产是在各种文化形态互动的土壤上，不断生成和完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内化为大学生的理性认识，再由此导致他们自觉的行动。对外辐射即通过向社会输送人才和各种社会性交流活动，将校园价值观念向社会辐射，在此过程中也吸收社会文化的有关成分，使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在交互作用中，促进大学生个体素质的社会化和校园文化的新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校园文化的生存机制是否能够良性运作，关系到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和人才素质的提高。良好的校园文化能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富有时代精神的校风和学风，反之，则会导致校园风气的败坏甚至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可见，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的道德情操、知识技能、思维方式和心理素质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校园文化与大学德育这种内在的相互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环境的共处与弥散

校园文化与大学德育同处于高等学校这样的校园环境之中。校园文化环境主要包括与校园文化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的校园物质环境和校园精神环境两个方面；大学德育环境就校内来讲主要包括教师的教风、学生的学风、领导的作风以及规章制度、环境建设等，也无外乎是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环境。这就是说校园文化环境与大学德育环境是一致的，校园文化环境就是大学德育环境，反之亦然。这种相同的环境是通过校园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的，因此具有弥散性的特点。

### 2 功能的交合与互换

校园文化重在以文化人，大学德育主要以德育人。以文化人

重在潜移默化，以德育人重在说服教育，这是二者在育人方式上的差别。尽管如此，在对大学生施加某种影响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为校园文化的陶冶、导向、凝聚等功能与大学德育的灌输、塑造、保证等功能基本上是相同的，正确的校园文化价值导向和大学德育的保证功能实际上就是一回事。而校园文化的陶冶功能与大学德育的塑造功能则相辅相成地对大学生产生影响。如一些社团活动，既是校园文化活动，也是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以至于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只属于这两项活动中的某一种。这种状况表明，校园文化与大学德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互换，即采取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来达到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德”的要求。譬如通过尽量发挥校园文化的正面导向作用，控制并减少其负效应，来实现大学德育的保证功能，增强德育效果。同样，通过充分发挥大学德育的塑造功能，来塑造大学生的心灵，发展大学生的个性，完善大学生的人格，实现校园文化的陶冶功能。而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和凝聚功能也可以通过大学德育来加强。

### 3 内核的融合与贯通

校园文化的核心是校魂，即校园精神。校园精神通过校风反映出来，它是全校师生员工为达到既定的教育目标而在长期的教与学、工作与生活等多方面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为大家所认同的一种群体意识。特定时期、特定学校的校风，是该校广大师生员工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的综合体现。大学德育的根本宗旨是要培养大学生具有时代所要求的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这与校园精神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可见，校园文化与大学德育尽管各有特点，然而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其内核是相互融合与贯通的。

校园文化的结构及其与大学德育的关系表明，它与大学德育是有着本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它具有大学德育的载体功能。

### (三) 校园文化影响的特点与趋势

#### 1.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影响的特点

校园文化在影响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方式上有其鲜明的特点：

(1) 渗透性。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来说，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力量。一个优化的校园环境总是以特有的象征符号向人们潜在地灌输着某种思想、规范和道德信条，这种潜在的教育力量虽然不一定让人清晰地感受到，但它确实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地渗透于各种优美的建筑和人文景观之中。对学生影响深刻的还是精神文化。一场高品位的人文讲座，就能把丰富的知识、深刻的哲理注入学生的心灵深处，使他们在接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对其学术思想、理性思维以及人格良知的启迪和感悟，甚至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思想信念和价值取向。这种成功的人文讲座，渗透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

(2) 选择性。校园文化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亚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它必然要对古往今来的社会价值观念、知识体系、道德规范、行为模式进行批判地继承，有选择地吸收，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样式和文化体系。正因为它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体系，所以它具有多样性和选择性的特点。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去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文化形式，组织不同的文化社团，诸如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书法、演讲等等。学生们自主选择的事情，他们会齐心协力地去做。这时，学生已由教育客体变成教育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化活动，受到潜移默化的启迪和熏陶。这与被动地接受教育相比，其效果是不一样的。

(3) 参与性。随着大学生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要求参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而校园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文化，它要求大学生广泛参与，这是符合大学生的心理需求的。大学生通过参与各项校园文化活动，不仅在思想上受到启迪，感情上受到熏陶，而且还有助于培养自身的各种能力，诸如交往能

力、表达能力、组织活动能力等等。因此，校园文化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全面发展素质不可缺少的内容，我们应该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健康有益的活动。实践证明，大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愈广泛，愈深入，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影响就愈普遍，愈深刻。

## 2 校园文化的德育运行趋势

校园文化作为大学德育的重要载体，其影响方式有以下几种趋向：

(1)有形教育向无形教育转化。有形教育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教育课、党团组织生活、形势报告以及政治学习和讨论等专门的德育活动。无形教育指校风、学风、教风、班风等校园文化氛围的潜移默化。有形教育是必要的，但是，若在运作方式上恰当地借助于无形教育，效果可能更好。因为无形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寓教于美，寓教于乐，易于为学生所接受，使学生在无形无声之中受到熏陶和感染。在各种看得见或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感觉得到的氛围或风气的熏陶之下，大学生在不知不觉的活动中受到教育。校园文化就具有这种无形教育的特点，因此，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努力塑造校园精神，弘扬富有时代特色的校园精神主旋律，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强凝聚力的校风，成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力量。

(2)有意识教育向无意识教育转化。有意识和无意识本来是心理学的概念。在这里，有意识教育是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大学生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影响的以理性形式出现的德育活动。无意识教育是指体现一定价值观念和审美意向的、以感性形式出现的各种有声有色的校园文化活动及其物质环境。有意识教育和无意识教育实际上是有形教育和无形教育的另一种表现。无意识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内隐性和潜在性。它在人的认识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个体对知识的选择，对情感的需求，对审美的判断，还是个体对意志的控制和调节，无

意识教育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提供具有教育意义的场景和活动，对大学生施加影响，使其在无意识中得到教诲。有意识教育和无意识教育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意识教育可以通过无意识教育来进行，而无意识教育的强化，又可以转化为有意识教育。例如，在一个清新文明、明净典雅的校园环境中，一般来说可以使一个人自然地避免粗俗的言辞，抛弃野蛮的行为，尽量显得彬彬有礼，高雅大方。这实际上就是从对具体事物的感性之中获得了理性认识的结果，即要讲文明礼貌。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大力绿化、美化校园，发扬为人师表、尊师爱生的风气，完善校园文化设施，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努力营造校园氛围，这是使有意识教育向无意识教育转化的重要条件。

(3) 外在教育向自我教育转化。不管是有形教育向无形教育的转化，还是有意识教育向无意识教育的转化，归根结底是外在教育向内在教育即自我教育的转化。人是文化的动物，作为校园文化主体的人特别是大学生，其活动的主要结果应该是他们自身的发展。而其成长离不开校园特定的文化氛围。校园文化活动就具有一种使外在教育向自我教育转化的特点。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性、自发创造性都会得到充分的调动。他们一方面积极寻找着与环境的认同，对校园文化等自我教育的形式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通过参与各种活动，自觉接受各种影响，并把它内化于心，使之成为自我教育的精神动力。为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该创造各种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文化教育活动，通过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不断提高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

## 二、社会实践活动的兴起：开放式教育的新发展

### (一) 社会实践活动蓬勃兴起

社会实践活动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其中的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就

改造主观世界而言，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同时，社会实践活动运行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以全社会开放的方式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施加影响的，它能使大学生学到许多在校园内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培养大学生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它是大学德育的又一重要载体。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建国初期，各高等学校组织大学生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广大学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1958年中央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根据自己的条件试办工厂、农场，或与当地工厂、农场订立劳动合同，组织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广大师生受到了一定的锻炼。但是，由于“左”的思想抬头，安排劳动过多，出了一些偏差。到了6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林彪、“四人帮”极力贬低书本知识，片面鼓吹“开门办学”，要大学生“与工人农民划等号”，使社会实践活动完全走入歧途。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改革的蓬勃发展和改革初期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学生才兴奋不已，渴望成为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祖国腾飞的有用人才，表现出了强烈的成才欲望和参与热情。1982年底和1983年初，在全国兴起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热，正是在这个主题和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为什么在80年代初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会悄然兴起呢？其直接动因是：

1.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认识论的原理告诉我们，实践是人们认识的来源，是最生动、最丰富的源泉，又是人们认识的目的。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

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sup>①</sup>认识的发展过程,就是首先从生动的直观实践活动开始的,这是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后,亲眼目睹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巨大变化,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从而坚定了他们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是社会实践帮助他们得出的正确结论。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 and 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变成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力量,大学生自身在这种结合中也才能找到一条有利于自己健康成长的道路。

## 2 时代的需要激发了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热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大学生对改革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与热情,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命运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求知成才的渴望。这种成才愿望不仅来源于他们对“夺回失去的时光”的紧迫感,更主要的则是来源于改革浪潮的震撼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正是大学生这种成才愿望激发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投身改革浪潮,要求在参与改革中为四化建设作贡献,从而实现自我价值。事实证明,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能感受到社会和人民的需要,激发起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当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看到基层单位如何急切盼望科技人员的时候,他们看到德才兼备的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如何受到欢迎的时候,深深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决心把自己培养成为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 3 关于人才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80年代初,在人才学领域里,有人提出了“自我设计”的口号,接着又提出培养开拓型、创造型人才的问题。这些观点不仅

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形成了对传统人才观和传统教育观的巨大冲击。争做开拓型人才、创造型人才，一时间成了大学生的热门话题，很快得到了大学生的普遍认同。他们迫切要求从“分数第一”的枷锁下解脱出来，冲破把学生禁锢在书本上、课堂上的封闭式教育体系，彻底改变重知识、轻能力的“书生型”人才模式，使自己成为既有丰富扎实的理论知识，又有熟练操作运用知识的实际工作能力的新型人才。为此，他们选择了走出校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成才之路。

所以，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延伸和补充，作为正确成才道路的一种必然选择，社会实践活动在具有强烈成才愿望的大学生中，终于不可遏止地开展起来。北京地区的大学生率先在1982年底深入基层宣传宪法，在1983年3月组成“好儿女志在四方考察团”赴延安、甘肃、青海、海南等地考察，从此拉开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帷幕。

## （二）社会实践活动的德育功能

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大学德育的重要载体之一，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它所具有的德育功能是非常明显的。认真研究和深刻提示社会实践的德育功能，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德育工作有重大意义。

那么，社会实践活动究竟具有哪些德育功能呢？

### 1. 社会灌输功能

从学校教育的角度讲，灌输，就是把一定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技能有计划有目的地传授给学生。学校内部的一切教育和教学活动都具有灌输的功能，智育有灌输的功能，德育也有灌输的功能，离开了灌输，学校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但是，要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仅仅依靠学校的灌输是不够的，大学生还必须接受整个社会的灌输，吸收来自社会的多方面信息。社会实践就是执行这种社会灌输的一种最集中而有效的形式。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普及，社会信息的传播手段日趋现代化，广播、电视、电影、文艺、报刊、书籍等传播媒介空前繁荣，为向广大青年学生灌输社会意识和信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问题就在于这种全方位、多渠道的灌输是无组织、无计划、无系统的，不仅内容十分庞杂，而且良莠混杂，真假难辨，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使天真浪漫的青年误入歧途。

要把这种无组织、无计划、无系统的社会灌输转化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种有效途径。因为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和学校培养目标的要求，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的，所开展的一切活动和所接受的各种信息都是在教育者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它可以把来自各方面的社会信息汇集起来，引导学生开展讨论和辨析，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处理，帮助学生从大量纷繁复杂的社会信息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不仅能使学生接受正向的社会灌输，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鉴别能力，这是在校园内和课堂上难以学到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这种社会灌输的信息量之大，传递速度之快，吸引力之强，都是学校灌输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学校灌输与社会灌输的相互关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把这两种灌输有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使其对学生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 2 事实疏导功能

多年来，疏导一直是实施大学德育的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疏导，既包括理论的疏导，也包括事实的疏导。理论的疏导就是宣传革命理论，讲清基本道理，坚持说理教育，做到以理服人。事实的疏导，就是引导学生投身社会实践，运用大量的活生生的事实来教育学生，使学生在对事实的认识、理解和体验中解开思想疙瘩，提高认识水平，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这种事实疏导的功能，以弥补理论疏导的不足。

事实的疏导和理论的疏导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必须紧密结合

才能取得理想效果。对大学生中存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疏导，使他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理论的疏导往往不能解决学生的全部认识问题，事实究竟怎样，在他们心目中还是个谜。这就必须借助于社会实践，把理论上所阐明的种种问题和所得出的结论，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去考察、去分析，看它们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事实胜于雄辩。许多学生在学校里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在事实面前找到了答案，并且表示口服心服。这就是社会实践活动所体现的事实疏导功能。这种事实的疏导，又往往是理论疏导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在社会实践中把理论的疏导和事实的疏导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实践的事实疏导功能，使社会实践活动能够产生更大的德育效应。

### 3 自我教育功能

培养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是大学德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大学德育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把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通过教育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实现这一原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在提高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具有其特殊的功能。

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之一，是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喜欢独立思考，不轻易相信别人现成的答案。社会实践活动把学生从狭小的校园里引向社会广阔的天地，投入沸腾的现实生活。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教育的客体了，而是以主体的姿态去参与社会生活，接受社会信息，把自己思想上的种种认识和问题放到实践中去接受社会的检验，进行客观的分析比较，寻找问题的答案，他们的主体地位显著增强。这样经过亲身实践所得出的结论，是学生主动认识的结果，容易为学生所信服。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经受锻炼，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他们看到自己的思想品德、知识才干与社会需要之间不相适应时，就能主动

地以社会规范为标准，自觉地评价、反省和鞭策自己，克服自身的弱点和不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从而增强自我认识、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大学生这种能力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自我教育意识的提高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更加迅速有效的实现。

#### 4. 自觉服务功能

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坚持德育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大学德育的又一重要功能。德育的服务功能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传达给学生，使学生知道应该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同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也可看出学校的“产品”规格是否对路，从而推动教育改革，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二是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参与国家建设事业直接为社会作贡献，为社会创造财富，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知识技能贡献给祖国和人民，增强主人翁责任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可见，社会实践活动既有利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又有利于为社会创造财富，这种双重的服务功能和其他教育形式和教育环节所不具备的。

综上所述，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多种功能，不过这些功能是隐性的，不易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这就需要德育工作者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深刻的揭示，掌握这些功能运行的内在规律，使它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得以充分地发挥。

#### (三) 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化与拓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校、社会和大学生的利益需求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将随着这些变化而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 1.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教育机制

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从大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看，教育机制不够健全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里，社会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既有许多积极的东西充实大学生的头脑，也有不少消极的东西进入大学生的视野。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分析方法，就难免要出问题。大学生的弱点是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和辩证的思维方法，看问题比较简单、片面，往往容易以偏概全，对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对一些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就更难以弄清了。因此，建立和完善良好的教育引导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必须建立完备的教育机构和制度，加强教育力量的投入，把学校教育与社会各方面的教育引导结合起来，保证社会实践活动的教育效果。在组织管理上要有一套正常的运作机制，要规划切实可行的教育步骤和方法。在活动前要对学生进行充分的动员，讲清活动的意义和目的，提出应该达到的各种要求；在活动中要选派一定数量的政工人员和专业教师加以指导，及时了解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状况，回答学生在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引导学生得出正确的结论；活动结束后，更要进行总结、评比和表彰，并对全部问题加以归纳整理，抓住最突出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学生分析讲解，深化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使社会实践活动的教育效果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

2 坚持双向受益的原则，把社会效益、人才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运行中的利益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学校要考虑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支持更多的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实践活动的教育功能，提高投资的社会效益；社会接受单位则要求大学生能解决生产、经营和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本单位带来经济效益。因此，把社会效益、人才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

起来，使学校和社会双方受益，是在新形势下社会实践活动得以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的关键。

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为社会创造财富、为经济建设作贡献的过程。在我国还不很富裕，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才资源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情况下，开发和利用大学生潜在的智力资源是非常必要的。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把知识、信息、技术送给广大工农群众，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直接参加地方经济建设，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大学生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大学生具有较强专业知识的优势，组织他们认真开展科技攻关和科技培训等活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效益，就成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唯有如此，才能使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与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相适应，才会受到社会的欢迎与重视，才有利于为社会实践活动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是，重视经济效益，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社会效益和人才效益。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归根到底是一种教育活动，而不是经济活动，不能以简单的打工劳动获取物质报酬为目的。应当引导大学生到最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地方，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社会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作贡献，从而达到提高思想、增长才干、培养能力的目的。

3 制定合理的政策法规，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保障体系

从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来看，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发展不够平衡。一般说来，结合专业学习与教学计划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目的比较明确，组织管理较好，又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作保障，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在寒暑假期间学生自愿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有些流于形式。同时，在组织领导上主要是学生工作部门在抓，学校整体力量投入少，而且经费不足，常常与教学脱节。这些问题给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带来许多困难。为此，制

定合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和完善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是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深入持久开展的又一重要对策。

为了使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必须尽快制定有关政策法规，促进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如何保障必要的人力投入和经费投入；如何把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纳入教学计划和学生的综合评价体系，使之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保障社会接受单位对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及所应承担的义务；如何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遇到的经济利益和知识产权等问题时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等等，都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社会实践活动产生更大的效益。

### 三、心理咨询的面世：咨询式教育的新发展

#### (一) 心理咨询的产生

心理咨询是指对有心理障碍的人，通过心理商谈的程序和方法，使其对自己与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改变其态度与行为，并对社会生活有良好的适应。大学生的心理咨询是通过语言或文字、情感及表情等人际间交流的办法，对大学生提出的心理困惑等问题，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和讨论，找出问题的症结，分析引起困惑和苦恼的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可能条件和办法，使有心理冲突的大学生能够得到帮助、启发，并调动其个体潜力，进行自我选择和调节，使之在认识、情感、态度、行为等方面有一个适应环境、益于身心健康的积极变化，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意志坚强的人。健全的个性心理品质，良好而稳定的心理状态，是形成大学生良好政治思想及道德品质的基础。心理咨询的特点，正在于它是从心理方面入手来健全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品德素质的，所以心理咨询的产生就充分显示了其德育载体功能，是大学德育在运作方式上的又一新的变革。

在我国，思想品德教育中的心理咨询是从个别教育和个别谈

话的教育方式发展而来的。建国以来，在大学德育中非常重视对学生的个别教育工作，把个别谈话作为思想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首先，教师在同学生谈话时，要分析学生的心理状态，因为学生的不同心理特点在谈话时反映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有揣测心理、防御心理、恐惧心理，也有逆反心理、轻视心理、沮丧心理等等，教师在谈话时，必须首先消除学生的心理障碍，使谈话得以顺利进行。其次，作好个别谈话的准备。教师与学生个别谈话，是用语言进行的一种思想交流和心理接触。要通过谈话来启迪学生的思想，激发学生的情感，使学生受到教育。因此，教师对个别谈话的目的、内容、时机、场合、方式、态度等方面都必须作好准备，使谈话能有的放矢。其三，创造和谐的气氛，引导进入正题。许多有经验的教师在与学生个别谈话时，总是先谈一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态度随和自然，语言亲切自如，在创造和谐气氛的基础上适时引入正题，进行较深一层的心理接触。这时教师要循循善诱，情理与共，晓理以启迪理智，动情以触动心灵，使谈话取得预期效果。其四，争取有一个圆满的结束。不论谈话顺利与否，都要有一个较好的结果，特别是在学生不接受教育时，需要设法留有余地，创造一个继续教育的机会，避免不欢而散。

以上这些作法，就是 50、60年代大学德育工作中一种有计划的个别谈话的教育方式，在这种教育方式中，谈话人已经很注重心理因素的作用了。他们不仅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性别特征以及个性差异，而且考虑学生的思想、道德与知识水平，并以满腔热情、平等诚恳的态度进行交谈，使谈话变成谈心。许多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在德育工作中通过这样富有情感的个别谈话，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尽管这些作法与心理咨询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从心理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教育了。只是后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心理学被作为“伪科学”受到批判以后，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才随之被抛弃，而逐渐为“革命大批判”所取代。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心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恢复和迅速发展,高校德育借助心理学的知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于是心理测量、心理咨询由此产生,并迅速在高等院校形成热潮。为什么心理咨询会在我国 80年代初兴起呢?这是有它的客观基础的。

1. 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心理咨询的产生提出了客观要求  
当代大学生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节奏加快,人际关系日益复杂,价值观念趋向多元化,人们每天处于变化的环境中,心理活动日益复杂,心理冲突异常激烈,心理健康遇到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形势对人才的素质也提出多方面的要求,除了要具备渊博的知识、较高的道德修养以及健壮的体魄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品质。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竞争的需要。为了改善和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其内心稳定性,塑造其健康、完善的心理世界,使之具有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能力,成为心智健全的现代人,心理咨询便应运而生。

2 青年身心发展的特点,为心理咨询的产生提出了内在需求  
在校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一般在 18—22岁之间,属于青年中期。此时其生理发育基本完成,身体外形已具备成人特征。但是,从心理发展角度来看,这时他们正处于“心理断乳期”,即心理结构形成的时期。如果在这期间生理机制与心理机制运行出现障碍,就会产生心理疾病。因此,青年期也是心理疾病发病的高峰期。心理和人格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障碍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各种异常人格和异常行为的出现,所以青年期又是异常行为的多发期。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边际时期的青年与其他人相比,心理态势更急剧多变,特别是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大学生,如果不注意用脑的卫生,就更加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因此,如何帮助青年大学生顺利度过边际时期,就成为心理咨询产生的主体要求。

3 健康观的转变也是导致心理咨询产生的因素之一

以往的“健康”,就是指身体没有疾病。现代的“健康”则是

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化上的完满状态。也就是说，仅仅是身体没毛病还算不得健康。只有在心理上、精神上都美好的人才算完全的健康。事实上，大学生中就出现了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相分离，知识增长与心理健康相分离的现象。然而长期以来，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只是笼统地认为是思想问题，因此，用思想教育的常规运作方式来解决，往往不得其果。据 1988年 11月 13日《中国青年报》报导，天津有关方面统计，全市五万名大学生中竟有八千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心理状态不健康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些人羞于承认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疾病，估计实际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大学生的心理障碍多种多样，如失眠、情绪失控、恋物癖、单相思不能自拔等，致使一些人不得不休学或退学。大学生中的大量心理障碍的出现，使德育改变了只重视思想倾向而忽视心理因素的弊端。为了解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咨询由此产生。

现在，心理咨询已进入越来越多的高校，并在实践中愈来愈显示其新生事物的必然性与生命力。各地的心理咨询所、心理咨询中心纷纷成立，全国已有许多高校创建了咨询服务机构。心理咨询日益成为大学德育的一种新的运作方式，并发挥其显著的德育功能。

## (二) 心理咨询的德育作用

健全的个性心理品质是形成良好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的基础。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心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可见，人的思想与其心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人脑为产生的物质条件，以客观现实为产生的源泉，以感知为产生的基础，都属于意识范畴。但是，人的思想与其心理也有差别：思想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思维活动产生的，属于理性认识，并且是理性认识的核心；而心理既包括感性认识，也包括理性认识。思想主要是通过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政治观等方式来表现的；心

理则通过感觉、知觉、思维、情绪、情感、意志、需要、兴趣、态度、气质和性格等形式来反映。它们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任何一种政治思想品质的形成，没有心理成分的充分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例如，没有健康的情感就不可能形成高尚的道德，没有感觉和知觉就不会有思想，需要和性格影响思想的内容和性质，气质制约思想的表现形式等。同时，人的思想又对心理有决定作用。人一旦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会对他的整个个性心理品质起导向作用，促进和提高心理健康的水平。思想对心理的决定作用和心理对思想的基础作用表明，人们只有处在良好的心理状态下，才能顺利地接受思想教育，从而形成社会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思想教育必须与受教育者当时的心理需求相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心理咨询的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近年来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心理咨询机构，开设了有关心理卫生方面的课程，并举办心理咨询专题讲座，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排忧解难，缓解心理冲突，克服心理矛盾，消除心理障碍，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有一位女同学在初中二年级就对异性敏感，一见异性就精神紧张、出汗、周身无力。后来经几次咨询，咨询人员帮助她树立人生更高的奋斗目标，并指导她看一些自己崇拜的人物的传记，还让她练气功。她终于克服了这一毛病，并且考取了研究生。可见，开展心理咨询是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的途径。

在高校，心理咨询的内容主要有：对躯体疾病的咨询，对各种情绪障碍的咨询，对各种神经精神疾病的咨询，对性知识及婚姻恋爱问题的咨询，对社会适应不良现象的咨询，对不健康心理行为的咨询，对学习障碍的咨询，对专业指导和职业选择的咨询等等。

从心理咨询的形式来看，一般是采取个别咨询的方式，由大学生单独向咨询服务机构提出咨询要求，并一般由单个咨询人员

作为朋友出面解答、劝导和帮助教育，以平等的态度进行交流，这样，咨询对象顾虑较少，可以基本无保留地袒露自己的心理状态，倾吐内心的秘密，有利于咨询人员耐心、深入地对咨询对象进行帮助。咨询者在帮助咨询对象分析思想认识、情感、心理需要、人际关系等问题中，应最大限度地发现和挖掘其心理潜能，以提高大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心理咨询的德育作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给他们以精神支柱；另一方面是帮助大学生增强自我教育的能力。心理咨询使学生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增强遵纪守法的公民意识；不仅指导大学生怎样正确对待生活道路中的各种困难和挫折，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遇事冷静思考，以理智战胜感情，而且还要帮助大学生掌握给自己解除矛盾和焦虑的方法，锻炼自我疏导、自我调节的能力，使他们建立必要的自尊、自重和勇气，经得起各种挫折和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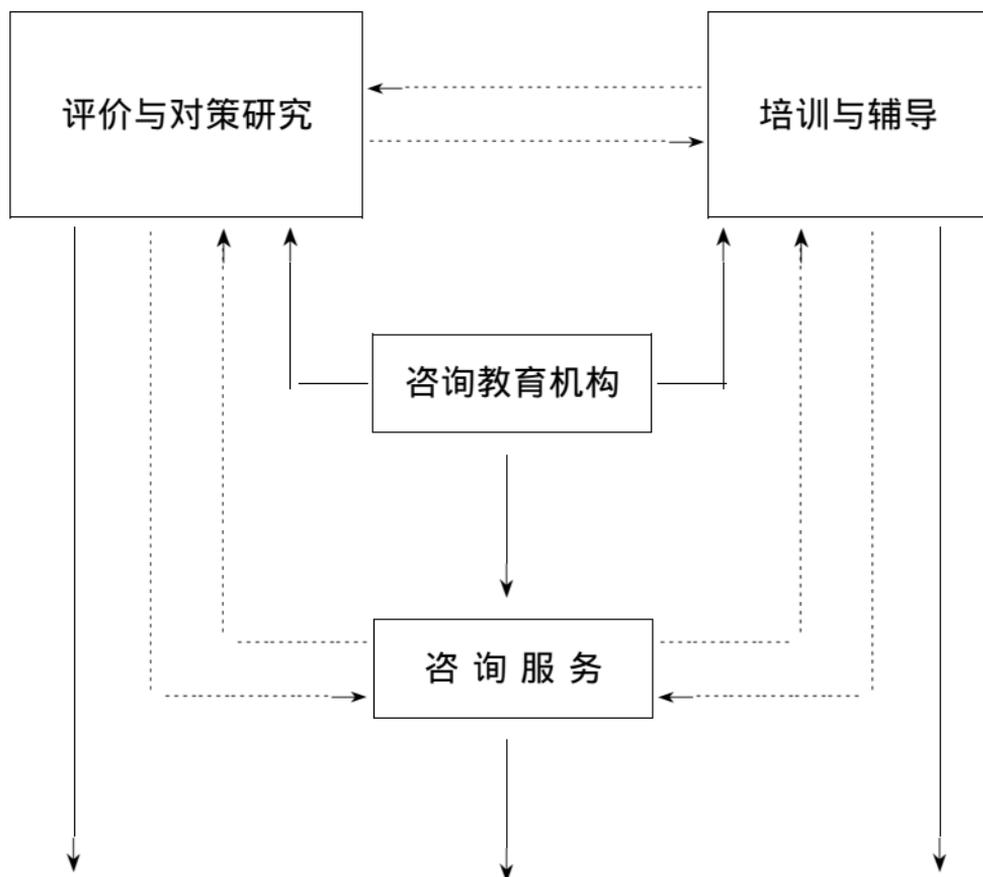
### (三) 咨询性教育模式的建立

#### 1. 咨询性教育模式的构想

心理咨询工作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已经不再满足于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其工作重点逐步转入对人的心理潜能的研究。心理咨询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教育模式；另一种是发展模式。换句话说，心理咨询不仅仅是一种治疗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帮助、启发和教育的过程。大学生要在校园当中进行社会化的准备，心理咨询的启发、帮助与指导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心理咨询的运行趋势就是向咨询性的教育模式扩展，以满足学生多方面的需要。咨询性教育模式构想，如下页图所示。

这种咨询性教育模式，是通过咨询机构在开展咨询服务的同时兼有评价与对策研究以及培训与辅导在内的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现在对这三个部分加以说明：

第一，咨询服务。它是整个咨询机构的首要任务。其内容涉及到与大学生有关的诸多方面，不仅是心理领域，如理想、人生、



常规测评内容与方法研究	职业素质咨询	学生综合素质情况分析 及对策研究	新生素质评价分析
-------------	--------	---------------------	----------

人格问题	学习生活	能力培养	社会适应	人际关系	职业选择	恋爱问题	法律问题
------	------	------	------	------	------	------	------

注：“→”表示所包括的内容；  
“----->”、“-----<”  
表示相互作用或双向作用。

社会实践活动辅导	专项技能培训	学生社会工作技巧培训	社团学术活动辅导
----------	--------	------------	----------

人格、社交、友谊、爱情、学习以及某些病症（神经症、焦虑、性角色错乱等），而且涉及法律知识、工作方法与能力培养等其他一些咨询内容。

第二，培训与辅导。包括社团学术辅导，旨在按照某种特定的要求，依据人的心理形成、变化和发展的相关原理，通过一定的背景与技术手段训练与辅导某个群体或个体达到某种特定的要求，从而增加一些现有教育在培养学生心理素质或其它方面的不足内容。学生社会工作技巧的培训，则是为有志于社会工作的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这不仅能使学生更好地从事社会工作，提高工作能力，同时也为学生更好地适应环境奠定了心理基础。而对于一些能力较弱，或社会适应不良，或人际关系不佳的学生，通过设计相应的社会工作机会，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佐以相应的帮助，是能够得到改善的。专项技能培训可以拓宽学生适应社会的途径与方法。对于学业成绩很好但缺乏创造力的学生，经过科学的培训，改进其不足，以适应工作的要求；对于学习方法不当的学生，通过听“大学生应该如何学习”的讲座，在学习方法上使之有所改进；而对于擅长文科却进入理、工科大学学习的学生，在保证学好本专业的同时，若能给予文科方面的特别培训，既减轻了因专业问题而引起的心理矛盾，又造成了文理渗透的环境，从而有可能造就出一个文理兼通、适应性强的复合型人才。

第三，评价与对策研究。咨询性教育要科学化与正规化，评价与对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这项工作是建立在咨询案例的积累与总结上的。因此，咨询档案的建立成为首要的任务。结合高校的状况，可以进行这几方面的评价与对策研究：一是新生基本素质的评价与分析，目的在于把握学生的素质倾向性，并依此提出合乎科学的教育方法，真正做到因人施教。二是学生基本素质的评价与教育对策研究，目的在于科学地预测与把握学生的发展趋势，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并为学生的择业倾向提供指导性的意见。三是常规测评内容与方法的研究。这

是辅助咨询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一些量表来对学生进行评价。

在咨询教育机构中，咨询服务、培训与辅导、评价与对策研究这三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咨询服务工作为培训与辅导提供了个案教育方法参考，为评价与对策研究积累了第一手的咨询案例素材；而研究工作的展开又为咨询服务、培训与辅导提供了具体的技术帮助和方法指导，提高了工作的实效。同时，研究的结果为学校其他部门所采纳，又有利于扩大咨询教育机构本身的工作成效，从而使咨询教育工作成为大学德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2 咨询性教育的运行特点和趋势

咨询性教育作为大学德育载体而言，其运行的趋势亦有其特点，表现在：

(1)从被动接受向主动要求转化。思想教育基本上是单向的教育，即通过灌输让学生接受一定的思想道德要求。而心理咨询则将这种单向教育变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间的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即是用民主的方法讨论学生中出现的问题。因而，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所处的气氛是宽松和谐的，双方的交流也是畅通的。这样，教育者的角色被淡化了，而教育的功能则被强化了。另一方面，心理咨询的最大特点不是咨询者要求去解决学生出现的问题，而是学生自己有了问题主动去寻求帮助与解决。因此，咨询式教育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学生越来越主动地解决自己所出现的思想问题，为学生自主完善人格、提高思想品德素质提供了条件。

(2)从共同教育向个性教育转化。大学德育的运作基本上是从统一的要求出发，采取集中的形式进行的，对任何人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也有个别教育，一般是出了问题或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才找学生个别谈话的。然而，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孕育出来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内在素质的人要达到相同的教育目标，就必须贯彻针对性强的个体化教育原则。咨询式教育注重因材施教，其运作的趋势是个性化的教育。它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3)从经验化向科学化转化。大学德育运作的轨迹表明，其方式虽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多半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当然，经验也是科学的，无数经验的积累，促进了大学德育的科学化。心理咨询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它不是在大学德育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依据，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知识，研究人的心理障碍问题，并采取咨询的方式来实施的。它是通过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队伍，结合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心理倾向来进行的，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诱导和思想教育的好形式、好方法，它将导致大学德育的运作方式越来越科学化。

## 注释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9页。

## 第八章

### 大学德育考评科学化的探索

大学德育考评是根据我国高校德育的性质和要求，通过科学的反馈，对德育的过程和效果进行定性定量的评价，以促进德育工作的改进和完善的一种方法。它是大学德育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大学德育目标的基本保证。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并把德育工作作为评价一个地区、一所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少高校建立了德育的考核评估制度，通过考评，全面了解和衡量大学德育工作状况、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等方面的表现及其实际发展水平，以检查大学德育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促进了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深入研究大学德育考评工作的基本状况，认真总结其基本经验，对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德育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大学德育考评的意义和作用

##### （一）大学德育考评的简要发展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对大学德育工作的评价，一直是采取总结鉴定、写评语的定性方法进行的。这种考评方法的主要特点是群众性的自我教育，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方式，达到充分肯定成绩，找到主要问题，明确今后努力方向的目的。其缺点是模糊性较强，客观标准性差，主观随意性大，有时仅凭一句话、一件

事就定性定论的情况是常有的事情。形式也比较单一死板，对中间状态的鉴定评语几乎一个面孔，缺乏可比性，透明度低，可信度也低。

80年代初期，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我国一些企业开始引进了国外的人员测评工程，以加强对人才的管理、利用和开发。受其影响，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率先在学校进行了学生品德评定等级的尝试。1982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教委《关于高校学生品德考评工作的通知》，对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的尝试予以肯定，并建议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试验，通过实践摸索、实验，逐步制订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校德育考评工作的制度和办法。当时部分学校开始了这项工作，但试点多数未能坚持下去，对品德评定等级，人们的看法未达成一致。就在这时，上海起重运输机械厂把量表计分法正式用于本厂的人才评估实践，在全国引起了一定反响，也引起了高校德育工作者们的极大兴趣。不少同志开始对量化方法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相关学科的评估理论进行了借鉴和移植，出现了目前仍占主导地位的量表计分法或累积积分法的量化方法，也称“积分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促进了高校德育考评的试点工作的发展，许多学校逐渐开始采用量表计分法进行学生素质综合测评。交通部、河北省的一些院校还下文进行推广。1987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对高校德育目标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提出，对大学生应当有一个合理的严格要求，要建立健全思想品德考核评定制度。为了落实《决定》精神，国家教委同年11月在广州召开了学生思想品德考评的专题研讨会，会议认为在全国推广量化考评方法的条件尚不成熟，但肯定这种做法的方向是对的，提倡继续试点。此后，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在全校继续推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德育考评方法，部分院校如华中师范大学等则在少数系进行试点、逐步推广。与定性考评方法相比，

量表计分式考评有着自己显著的优点：它把德育考评的“软指标”变为“硬指标”；它在众多的考评内容中把握方向，分清主次，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它能较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价学生，促进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考评中的公开原则提高了考评工作的透明度。但是，在推广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指指标体系中政治、思想、品德方面的要求还不明确、不具体；测评标准上不能兼容每个学生的特点；操作起来也比较烦琐。因为思想品德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形成受到生理因素、主体能动因素特别是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企图主观地用精确的数据去描述它们还有许多没有攻克的难题。而且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为追求定量而定量的倾向，容易忽略那些无法用数据直接测量的德育因素。再者，对德育（特别是对政治态度）进行精确的测量尚未找到有效的数学工具，这也是量表计分法的作用受到限制的原因所在。

从1989年《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颁布至今，我国大学德育考评方案的设计和施行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国家教委《关于颁发〈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的通知》为依据，探索如何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品德素质进行更为科学的测量和评定。在这期间，模糊考评法异军突起，并和微机技术紧密结合，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模糊考评的实施结果表明：通过考评，能切实解决德育“一手软”的状况，有利于把德育目标落到实处。评价内容和标准比较全面、具体、明确，并具有群众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因个人偏见所造成的过于褒或贬的影响，提高了考评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促进德育工作的科学管理。

## （二）大学德育考评的意义

德育的考核与评估，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实践中对落实德育目标，巩固德育效果，起了很好的作用。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 1. 大学德育考评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德育工作是一个有序的控制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解为若干道程序，每一道程序都有其特定的任务和内容。大学德育考评是德育工作程序控制的中间环节，通过考评可以迅速实现德育工作的信息反馈，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可见，德育考评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改进和加强大学德育工作的必然要求。我们在德育工作中所制定的目标是否正确，所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所采取的方法是否有效，只有经过德育考评才能知道。同时，只有通过正确的评估，才能分清哪些是积极的因素，哪些是消极的因素，哪些是成绩，哪些是问题，以便施教者能更好地从实效出发来改进德育工作，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益，以促进整个工作的加强和创新。事实上，大学德育考评过程与高校德育过程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考评的过程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在教育中有考评，在考评中有教育，教育与评估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不断地推动整个高校德育工作向前发展。

### 2. 德育考评是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德育考评的实质和核心是把德智体诸方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目标，并以此来要求和评价学生，而这个整体目标的功能并不等于德智体几方面的机械相加。因此，大学生要想获得理想的德育考评分，就得努力实现德智体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克服偏废现象。同时，考评体系中明确的定量成绩和显性的量极，对大学生来说既是一种压力，又是一种动力，考评的具体指标也使大学生努力的目标更为具体，自我教育的意识更容易得到强化。近年来的德育考评实践已证明：凡列入考评指标内的要求，通过考评，特别是将考评结果与学校的奖惩政策挂钩，必然激发学生要求上进，追求全面发展的积极性，对于形成学生正确的思想与行为将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

### 3. 德育考评是德育科学化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一，德育考评是建立和发展德育学理论体系的需要。当前，

德育学这门科学仍处在实践和探索阶段，许多感性认识还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对以往的经验 and 资料缺乏系统的总结和研究，更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sup>①</sup>德育的复杂内容，为数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而数学和数学方法的引进，又必然促进德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之成为一门适应时代发展的、独立的新型学科。

第二，德育考评是提高德育管理水平的需要。德育科学既是一门教育的科学，也是一门管理的科学。科学的管理工作不仅要求制定正确的管理目标，而且要求在整个管理活动过程中不断通过监督检查，获取反馈信息，修正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管理目标。但是，当前大学德育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这一环节。学生的思想道德发展水平如何？政工人员开展工作的效果质量如何？德育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程度怎样？这些问题尚缺乏定性 with 定量相结合的分析。通过建立科学的德育考评体系，有利于对德育工作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必将为德育的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促使高校德育管理水平再上新的台阶。

第三，德育考评是实现德育工作科学化的需要。高等学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是帮助学生确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主要力量。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陷于事务堆，经常充当“救护队”，无法将自己的主要精力与时间用于研究和处理自己所承担的主要工作。改变这种状况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建立科学的德育考评体系，将政治思想品德的要求具体化、规范化，具有可操作性，使大学德育工作成为一个在明确的教育目标导向下，及时收集信息，分析信息，进行决策实施，进而达到目标实现的良性循环过程。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德育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同时也必将促进德育工作日益走向科学化。

### （三）大学德育考评的作用

德育工作是由德育工作者组织实施的一项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对大学生产生了什么作用，有些什么经验教训，都必须通过评估来进行总结和检查，从而不断寻求新途径，充实新内容，形成新机制，取得新效果。实践表明，对高校德育工作定期进行评估，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 1. 教育作用

高等学校德育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大学德育考评作为实现德育根本任务的手段，其教育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合高校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行全员考评，有利于调动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落实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任务；二是大学德育考评的过程也是考评对象进行自我评价、自我教育的过程。因为从自评、他评到表彰，以及贯穿全过程的日常行为考核等，始终离不开考评对象的积极参与。考评对象通过抑恶扬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强化正确的思想与行为，抑制不良的思想与行为，从而促进自身政治思想和品德的健康发展。

#### 2. 导向作用

目前较科学的德育考评体系中都明确规定，考评结果与每个学生的奖惩、分配等切身利益挂钩，因此，学好学坏、表现优劣就是不一样。通过德育考评，学生中德育的优、良、中、差明显分开，使学生感到每个人在德育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结果，而德育考评的不同结果又产生各自不同的后果。如德育优良，则在招生、奖学金、优秀毕业生评定、优先推荐就业上得到鼓励和促进；而德育考评差者，与各种评优无缘，甚至不能毕业。有了这些相应的政策规定，就在德育过程中形成了激励机制，使德育考评的过程成为引导、促进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过程，使德育考评的结果成为鞭策和激励大学生在政治思想和品德方面严格

要求自己的强大动力。

### 3. 管理作用

德育考评是高校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科学的德育考评有内容，有规范，有考核，使之对学生的要求制度化。能使学生针对考评内容，根据考评结果自觉地加强对自我的约束和管理，扬长避短，规范自己的言行，养成良好的习惯。完善的德育考评系统，有利于及时发现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获得德育效果的信息反馈，全面掌握工作中的优势和薄弱环节，并及时采取措施，加强有效管理，使学校的德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4. 激励作用

进行德育考评，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通过奖优罚劣、抑恶扬善来激发高等学校内部的积极性，增强动力、活力和压力。在考评中，还可进行校际之间、领导干部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横向比较，这更有利于调动大家在自我修养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挖掘自身的内在潜力和创造性，使德育考评的要求内化为师生自觉的行动，成为激励自己奋发向前的重要力量。

### 5. 监督作用

德育考评体系为学生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师生间的相互监督，学校对德育工作者的监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标准；而且通过德育考评获取的大量第一手反馈信息，又为大学德育工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大学德育监督机制的加强，保证了德育实施的正确方向，对于增强德育效果，提高德育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大学德育考评的方法与效果

### （一）大学德育考评的基本方法

在长期的德育考评实践中，高校德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创造或移植了众多的考评方法，最主要的是以下三种：

#### 1. 评语鉴定法

评语鉴定法是在一个教育周期结束时，由本人和他人依据一定的考评指标和标准，对考评对象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以评语的形式进行定性描述的考评方法。依鉴定主体的不同，它又可分为自我鉴定和他人评估两种。

自我鉴定就是评价者对自己的思想品德和行为表现进行评价。它包括平时的思想小结、汇报，活动后的自我反省和总结，以及学年鉴定和各种评比、推优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评价和总结等。它是对个体考评不可缺少的环节。既有利于发扬民主，增加评估过程的透明度；又有利于大学生将自己的言行与考评标准进行比较，找出差距，迎头赶上；还能提高大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和自我评价的能力。其缺点是：缺少外界参照系，容易出现对成绩或问题评估的偏高或偏低等倾向，考评的客观性较差。因此，可用他人评估法加以修正。

他人评估法是指他人对考评个体的评价和鉴定。包括一直沿用的小组评议、学年小结、毕业鉴定等各种组织鉴定。它简单易行，容易掌握，能够反映被考评者的主要特点和发展状况。特别是这种评议、鉴定往往能引起对象强烈的情绪体验，激起行为动机，强化良好的品质，抑制不良的行为，起到扬善抑恶作用。因为被考评者得到肯定的评价时，就可能引起愉快的感受，反之，则引起内疚、羞耻的情绪体验。这种情绪体验使符合规范的思想品德行为得到强化，进而激励、促进对象积极向上、积极向善，发扬成绩，纠正缺点，不断进步。可见，评议、总结、鉴定还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它不是直接向对象传授道德知识，但能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的思想观点，明辨是非善恶；它不是直接训练对象的行为，但可以促使他们改变不良的行为习惯。因而，评语鉴定法作为一种好的传统方法一直被人们广泛采用。当然，这种方法也存在局限性。其缺点是缺少量的分析，模糊性较大，不利于对比分析，尤其是在政治风云变幻、偏离客观标准、民主遭到破坏（如“文革”时期）的情况下，这种鉴定便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和片面性。即使拨乱反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尚未得到全面恢复和发扬，因而，鉴定评语脱离实际的情况还是难以避免。这就使得对大学生的审查、分配、评比、教育等缺乏科学依据，以致造成不良后果。为改变这种状况，许多高校进行了一些改革的尝试，这就是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品德等级评定、计分的方法——量表计分法（或积分制）。

## 2. 量表计分法

量表计分法是一种由考评者依量表给定的指标和标准，对考评对象进行评分，进而对考评对象作出分析和判断的德育评估方法。量表计分法的基本工具是量表，关键在于计分，即根据对考评对象的认识，分出层次、等级，进而用数学的形式加以描述，给人以量的概念。计分方法在实践中经历了单因素计分——多因素简单计分——多因素加权计分的逐步发展过程。

单因素计分，即在考评指标单一化的条件下对考评对象按给定标准进行计量打分。以对大学生的集体主义思想考评为例，其方法见下表：

指标	考评标准	计分区间	评委意见
集体主义思想	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顾全大局，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	76—100	
	努力为人民服务，服从大局，较好地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51—75	
	愿意为人民服务、尚能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个人主义思想	26—50	
	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不能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0—25	

评分后将所有评委的计分进行平均，最后得出该生的集体主义思想考评分。当然，计分区间也并不一定要用百分制，可用等级制依次定为 6、4、2、0 四种分数，也可用 0—5、6—10、11—15、15—20 来计分，组织者可灵活掌握。

由于在实践中遇到的德育考评都是多指标的，故单因素计分法难以适应。于是便扩展为多因素计分法。多因素简单计分法就是单因素计分法的最初扩展，它是将复杂指标的得分相综合的考评方法。下表为某校学生德育考评结果的计算实例，共设 5 条指标，每条指标的标准分为 20 分，计分为各评委计分的均值。

指 标	计分( $Y_i$ )	综合得分( $Y$ )
思想品德	15	按公式 $Y = \sum_{i=1}^n Y_i = Y_1 + Y_2 + \dots + Y_n = 15 + 17.2 + 13 + 16 + 10 = 71.2$ 按公式 $Y = \frac{\sum_{i=1}^n Y_i}{n} = \frac{Y_1 + Y_2 + \dots + Y_n}{n}$ $= \frac{71.2}{5} = 14.24$
政治理论水平	17.2	
文明道德	13	
学习态度	16	
组织纪律	10	

然而，由于多因素简单计分法没有考虑不同的考评指标在考评过程中的不同重要性，因而又出现了多因素加权计分法。它是在实践中对考评对象的本质与属性的认识及对这种认识的描述进一步深入和客观化的结果。接上例，设表中各指标的权重依次为 0.15、0.15、0.25、0.25、0.20，则由公式：

$$Y = \sum_{i=1}^n P_i \cdot Y_i,$$

可得

$$Y = 0.15 \times 15 + 0.15 \times 17.2 + 0.25 \times 13 + 0.25 \times 16 + 0.20 \times 10 \\ = 13.08 \text{ (分)}$$

这样所得的分数与多因素简单计分法计算的结果是有区别的。

为改善计分的质量，实践中还采取了下列一些措施：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评委人数，以利于在统计处理中排除更多的偶然因素。一般以 12—15 人为宜。为减少考评计分中感情色彩的干扰，在所有评委的计分中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然后取中间值进行平均，较为接近实际。

由上可知，评语鉴定法过于强调定性，量表计分法又过于强调定量，而德育考评则要求有一定的精确性和可信度，这就需要做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模糊数学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途径和手段。

### 3. 模糊考评法

模糊考评法是指把模糊数学引进德育领域，并通过模糊数学模型来考评大学德育绩效的一种评估方法。它是近几年来我国一些有识之士把模糊数学这一数学领域的新兴分支用于德育领域，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模糊考评从定性的角度入手，通过精确的计算，得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归属结论。实践的结果说明，模糊考评并不模糊，采用这种方法有较高的可信度。

运用模糊考评法必须要建立数学模型。首先确定考评指标因素的集合  $U$  和等级评语的集合  $V$ ，如  $U = \{\text{思想品德, 政治理论水平, 文明道德, 学习态度, 组织纪律}\}$ ， $V = \{\text{优, 良, 中, 较差, 差}\}$ 。在实际评估中，各等级评语要赋予明确的含义，即确定评估标准。其次，建立单因素评估矩阵。如对大学生的德育素质，可设计出如下考评表：



习态度为例,若评委人数在各条评语等级间的比例分布如下表,即说明该生的学习态度属于“优”的可能性为 24%,属于“良”的可能性为 36%,依此类推,按最大隶属原则,该生的学习态度应属于“良”。

评语等级	优	良	中	较差	差
评委人数分布	0.24	0.36	0.30	0.10	0

求出评委在各条指标、不同等级间的比例分布后,我们可得到新的矩阵  $\tilde{A}$ ,即单因素模糊考评矩阵:

$$\tilde{A} = \begin{bmatrix} a'_{11} & a'_{12} & \cdots & a'_{1n} \\ a'_{21} & a'_{22} & \cdots & a'_{2n} \\ \vdots & \vdots & & \vdots \\ \vdots & \vdots & & \vdots \\ \vdots & \vdots & & \vdots \\ a'_{m1} & a'_{m2} & \cdots & a'_{mn} \end{bmatrix}$$

其三,确定权重系数矩阵,将不同的权重值分配到  $i$  条指标中去 ( $i=1,2,\dots,m$ ),就形成了权重系数矩阵即  $P=(P_1,P_2,\dots,P_m)$ 。

在模糊评估中,要求权重分配满足归一化条件,即  $\sum_{i=1}^m P_i=1$  ( $0 \leq P_i \leq 1$ )。最后,将单因素考评矩阵与权重矩阵进行复合运算,就得到了德育模糊考评的数学模型,即  $B=P \circ \tilde{A}=\{b_1,b_2,\dots,b_n\}$ ,其中“ $\circ$ ”表示复合运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b_j = \bigvee_{i=1}^m (P_i \wedge a'_{ij}) \quad j=(1,2,\dots,n)$$

“ $\vee$ ”、“ $\wedge$ ”是“取大”和“取小”符号,即  $a \vee b$  表示从  $a, b$  中取大者;  $a \wedge b$  表示从  $a, b$  中取小者。  $b_1, b_2, \dots, b_n$  表示考评对象的综合素质对各评估等级的隶属度。如果更精确一些,还可以将等级评语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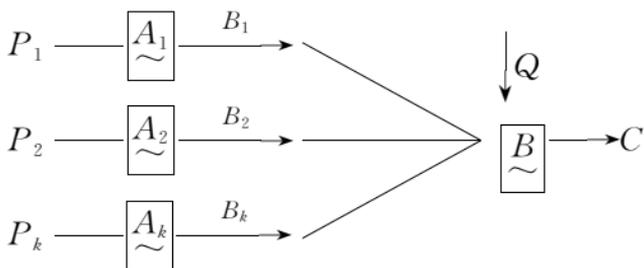
$V$  分别赋予特征值  $f_1, f_2, \dots, f_n$ , 这时, 可利用公式

$$x = B \cdot F = (b_1, b_2, \dots, b_n) \cdot \begin{bmatrix} f_1 \\ f_2 \\ \vdots \\ f_n \end{bmatrix}$$

求得评估对象的综合分, 据此, 便可对评估对象按分排序, 或与给定的阈值进行比较来确定评估对象的等级。

由于模糊考评法数据处理量大, 所以它一开始就与计算机技术紧密结合, 特别是在考评对象较多的情况下, 就必须借助于现代化的计算工具。目前模糊考评数学模型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运用, 给考评工作乃至整个德育工作都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数学模型是一阶模糊考评模型, 因为它赖以建立的模糊考评矩阵是单因素的。但在实际考评中, 有些问题是一阶模型所解决不了的。大学德育考评指标从大的方面可分为思想品德、政治理论水平、文明道德、学习态度、组织纪律等五项, 而这五项又可以细分, 如文明道德可分为社会公德、集体观念、寝室卫生, 而社会公德还可以再分为诚实性、正直性、相容性、服务性、礼仪性等等。对这样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 要考虑的指标很多, 用一阶考评模型权重难以分配, 即使一一分配了, 由于要满足归一化的要求, 每一指标所分得的权值必然很小, 而较小的权值通过模糊运算中的“ $\wedge$ ”或“ $\circ$ ”运算, 实际上便“泯没”了所有单因素评价而得不出有意义的结果。为此, 应将考评指标按某些属性进行分层, 先对每一层内的具体指标用一阶模糊模型进行一级综合考评, 然后用类似的方法对一级运算的结果进行层次间的高层次综合考评, 由此就可建立多阶模糊考评模型。多阶模糊考评的计算并不复杂, 与一级考评相同, 在计算机计算中通过多次调用子程序即可。以二级考评为例, 其运算过程如图所示: 先进行一级考评, 然后用考评结果构成的二阶考评矩阵  $B$ , 与二级权重  $Q$  进行模糊综合运算, 即可得到二级综合考评的结果  $C_i$ 。



其数学模型为：

$$C = Q \circ \underset{\sim}{B} = Q \circ \left\{ \begin{array}{c} P_1 \circ \underset{\sim}{A_1} \\ P_2 \circ \underset{\sim}{A_2} \\ \vdots \\ P_k \circ \underset{\sim}{A_k} \end{array} \right\} = (C_1 C_2 \cdots C_n)$$

模糊考评的过程是一个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的过程。它将定性考评与定量考评有机结合,开辟了德育考评的新领域,适应了德育考评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它的结果不仅能给出归属评语,而且能显示出考评结果在各评语等级间的比例分布,故能充分显示出考评结果的全貌。它应用广泛,不仅适用于对个体的考评,也适用于对校、系、年级、班组等单位的考评。而且通过对模糊考评模型的逆变换,可以反求权重向量,这对于强化人才培养,针对薄弱环节和重要环节加强德育工作,以及为德育工作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都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运用模糊考评法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要求考评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数学知识;二是要求具有并适宜使用的现代化计算工具。这些,正是广大德育工作者应该为之努力的方向。

## (二) 大学德育考评的绩效

大学德育考评是在深化教育改革中提出的一项新课题,是高校德育工作科学化的标志。评语鉴定法、量表计分法、模糊考评法

三者的效果并不一样,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共同的:

第一,德育考评较好地扭转了一些学生重才轻德的思想,增强了考评对象在德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积极性。比如某校实行考评后,学生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嘴上说全面发展,但实际上还是埋头专业学习、不愿参加体育锻炼和各项社会活动,而热心于社会工作的却不大重视专业学习,同学中凭个人意愿发展的偏废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一个科学的办法。现在学校有了综合考评条例,谁要想考评成绩高,就要在各方面都表现好,如果一个方面上不去考评成绩就高不了,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从该校两个学期的考评结果来看,两次名列前10%的同学,全部是在德智体几方面都表现十分突出的同学。相反,一些“重智轻德”或“重智轻体”的同学,尽管他们在学习方面很突出,但综合考评分却落在后面。所以,考评结果公布后,许多教师高兴地说:“过去我们一再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一些学生不听,反倒认为这是空话,现在实施综合考评,使这些要求落到了实处。”有一所大学自实行量化计分法考评以来,部分学生对德育要求不严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变。近三年来学生参加党课学习的人数占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比依次为13.8%,20.8%,25.7%,呈上升趋势。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把考核的项目作为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从考评的结果中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不足,并自觉努力去改变,逐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第二,增强了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全面实行德育考评工作,不仅要依靠辅导员和班主任,还必须调动学生干部的积极性,明确干部的职责,做好平时的观察、记录和监督。检查一旦出现问题,则具体追查到班级乃至个人,这样就形成班级之间,学生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对比、共同提高的局面。有的学校自实行德育考评以来,学生吸烟、酗酒、赌博、打斗、考试作弊等现象明显减少;珍惜时间,刻苦学习,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踊跃参加集体活动,坚持体育锻炼和早操的人明显增多,寝室文明建设达标率一下

子由 37% 提高到 92%，很多不良现象学生干部都能及时发现和处理。

第三，德育考评使德育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随着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的增加和学生平均年龄的偏小，大学德育工作的任务趋重，难度加大，使德育工作者整天忙于应付随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效果不甚理想。而实施德育考评以后，由于考评方案中对学生的要求明确具体，既便于考核，又便于督促检查，通过考评能及时了解每个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做到胸中有数。这样，就使德育工作者有可能从忙于应付中解放出来，把主要精力用于调查研究，针对学生考评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加以解决。如过去为解决一些学生上课迟到，不出早操，不参加集体活动等问题费尽了口舌，学生还是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实行综合测评后，把这些内容列入考评指标，解决这些问题就变得容易了。

另外，实行德育考评以后，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广大教师、干部教书育人和管理育人的积极性，增强了德育的全员意识，提高了德育工作的信誉。而且随着德育考评方法的不断完善和科学化，其效果一定会日益提高。

在长期的德育考评实践中，各高等学校都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大学德育考评必须紧紧围绕德育目标和高校培养目标来进行。《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指出，高等学校德育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德育考评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这两个根本任务，离开了这个目标，德育考评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了。德育考评是一根指挥棒，评什么，就直接影响学生重视什么，向什么方向发展，因此德育考评一刻也离不开培养目标。而且除了共同的培养目标外，还应该结合不同类型学校的特点有所侧

重。如对师范院校来说,就应当把专业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纳入德育考评的指标体系,根据不同类型学校的培养目标提出不同的要求。

(2) 大学德育考评要将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相结合。定性评估是通过对考核对象的整体及其性质进行分析综合乃至鉴别和确认,以把握德育实践的社会效果。它通常所注重的是考评对象质的方面。定量评估则是运用数据的形式,通过对考核对象表现出来的一些量的关系的整理和分析,从数量上相对精确地反映考评对象的局部或整体面貌,以把握德育实践的社会效果。在德育考评实践中,绝大多数单位是做得较好的。但是,也有少数单位对二者的关系认识不太正确;有的认为,鉴定总结是优良传统,是比较全面、科学的;有的又认为,只有量化是最科学的,甚至简单地认为,“定量评估是德育评估的基础”,操作时把量化手段当成目的,以分数完全取代鉴定和评语,以致在毕业分配中用人单位无法从分数上去了解到学生具体的情况,也无法作比较和选择。可见,片面强调定量评估是不可取的。实践证明,定性分析是评估的直接目的,是评估的出发点和归宿。考评者首先从定性出发,规定考评的范围和方向,确定合理的数量关系,然后收集整理考评对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量的分析、比较,再进行归类综合,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定性评估,得出合乎规律的写实结论。这是一个完整的由综合到分析,再到综合的评估过程,完全符合认识的客观规律。事实上,在考评中引进量化方法,一定意义上正是为了克服鉴定评语中存在的人为拔高、不写缺点和千篇一律、公式化等弊端,使鉴定评语更加真实、准确和客观。可见,片面强调鉴定的传统作法,离开定量分析也是不可取的。总之,只有把定性考评与定量考评有机结合起来,才是德育考评的科学方法。

(3) 大学德育考评必须坚持动态考评与静态考评相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属于意识范畴,但内在的思想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可以通过思想者的言行举止去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品德状

况不但是无形的,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动态过程。作为培养大学生政治思想品德的德育工作同样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开展大学德育考评必须在动态中进行,即把考评对象及德育的实践活动放到整个德育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去进行评估,在考评中既要看到被考评者思想品德的起步基础,也要看到它的现状,还要看到它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发展的潜能。这样才能从动态的变化中看出成绩,找出缺点,探究其发展态势。当然,在进行动态考评时,也不能忽视静态考评,即将考评对象放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相对稳定的情境中,对其行为表现作相对值的评估,并通过一定数据、文字、图表等方式表示出来。这有利于对考评对象的品德现状和德育工作的实际效果作出客观的评价。静态评估是进行动态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对现实状况的评估,就不可能了解它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但是,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只有动态中进行考评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动态考评则是静态考评的落脚点和必然结果。我们只有把静态与动态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考评工作具有科学性。

(4) 大学德育考评要注意把形成性考评与总结性考评结合起来,立足于教育和自我教育。形成性考评一般是在德育过程中进行的,目的在于了解德育实施过程中的现实效果,及时发现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与缺陷。由于学校的德育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内的整体与部分、外部与内部、层次与环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效果是德育过程的内外诸要素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考评者要认真做好形成性评价工作,对德育工作的全过程进行连续不断的考评,及时掌握考评对象的实际表现及达到预定目标的程度,以便进行与德育目标相符合的教育指导。在做好形成性考评的基础上,也应重视总结性考评工作。它具有诊断、导向、强化的功能,特别是学生德育考评的评语,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价值导向和实现德育目标的驱动力量,而毕业班学生的总结性评语更是学生升学、就业的重要依据。因此,总结性评价应以形成性评价为基础,体现较强的

针对性和指向性,同时又具有总体评价的作用。

无论是形成性考评,还是总结性考评,都要立足于教育和自我教育,要把考评的过程变成群众性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过程。我们过去进行学年总结、学年鉴定中,着重抓好自我总结、自我鉴定、小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这种好传统不仅不能丢,而且还应做得更好。如果没有这些自我总结鉴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考评缺乏足够的客观依据和群众基础,也是很难做好的。

(5) 大学德育考评要切实将考评结果与学生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德育考评的结果,不是写个评语,评个分数或等级就完了,而必须与学生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以形成不断促进的激励机制。目前多数高校在评“三好学生”时主要只看学习成绩,评优秀毕业生及各种奖学金时也是如此,德育方面马马虎虎过得去就行了,这是很不科学、很不全面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的高校在“三好学生”评比中,把德育考评结果作为首要的决定因素。规定凡评为“三好学生”的,德育评定应为优,至少是良,或定量评估得分在80分以上。有的学校还规定,凡评为“三好”的学生,德育评定成绩应在班前六名之列,评不够数的宁缺勿滥。这样就把德育目标真正落到了实处。还有的高校把德育考评与大学生就业挂钩,对德才兼备的大学生,优先向社会推荐。实践证明,德育考评只有与评优、就业等学生切身利益结合才有生命力,才能深入持久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当然,对考评结果与奖惩挂钩也应慎重,因为不同的工作、不同的领域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把一个指标体系指导下的考评得分与许多其他工作轻率挂钩,到处套用,有时并不妥当。如考评得分高的允许自由挑选工作,国家最需要人才的重要部门和地方得分高的不去,让得分低的人去,以此作为对得分低的人的变相惩罚就不太妥当。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是根据各项具体工作的特殊要求,对部分考评指标进行增减、变通使用。

### 三、逐步建立和完善大学德育考评的科学体系

长期的德育实践表明,加强大学德育工作,提高德育效果,不仅要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方法,还要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这是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德育工作自身循环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没有科学的考评体系,德育过程的循环就会中断,从而使德育工作者在规划指导上产生盲目性。科学的德育考评体系应包括德育考评的原则体系、指示体系和考评标准体系。只有建立了科学的德育考评体系,开展规范化的德育评估,才能及时把握德育过程的实施情况和功效,从而不断提高德育质量。

#### (一) 德育考评的基本原则

##### 1. 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是指在进行德育考评时,必须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可主观臆断或掺杂个人感情。客观性原则是由党的思想路线和德育评估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是党的思想路线在德育评估中的具体运用。客观性原则首先要求考评标准客观、科学。确定标准时,不能为了照顾某个评估对象,把不应列入的条件列入,也不能为排斥某个对象把应列入的条件不列入,更不能在考评过程中随意确定标准或随意脱离既定的教育目标,改动考评标准。客观性原则也要求考评的过程和结果是客观的。大学生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考评结果是客观的,会使他们增强信心奋发向上;如果考评不客观,含有偏见、成见或个人感情色彩,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他们失去努力的信心。因此,必须在大学德育的考评中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大量有关德育状况的第一手材料,使评估客观、公正和准确。

##### 2. 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是指在确定或运用德育考评标准时要多角度、全方位,综合平衡,不可片面。全面性原则是由德育工作的复杂性和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方针决定的。学生德育方面的每一个进步,都

是多种要素促成的,在确立考评标准时,必须包含各方面的要素。在具体运用考评标准时,更不可片面地强调考评标准的某一要素或某几个要素而忽视、抛弃其它要素。但强调德育考评的全面性,并不是在考评时不分主次,对构成考评标准的各要素等量齐观。在注意全面性的前提下也应适当注意重点性。如对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考评,可适当加大在行为表现上的权重;而对大学四年级学生的考评,则宜在思想进步上加高要求,从而使德育考评在全面中有重点。

### 3. 发展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就是德育考评要根据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变化的特点、德育考评本身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完善和科学化。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发展趋势是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螺旋上升,逐步深化的过程,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德育考评本身在实践中也应根据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制定出相应的考评原则和指标体系。社会在其进步中也会不断对大学德育考评提出新的内容和要求。而且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如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德育考评的标准、组织实施原则和对结果的处理一成不变,就难免脱离实际,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因此,大学德育评估既要具有开放性,又要体现改革精神,既要反映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新趋向,又要促进大学德育水平的提高。

### 4. 透明性原则

透明性原则有三层含义:一是重视自我考评的作用,承认被考评者在自我剖析方面的优先地位,承认被考评者在完善自己的工作方面,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要加强评估过程中的民主性。在德育考评中,考评主客体之间应平等相待,协商对话,民主讨论,加强疏导,造成一种宽松协调的考评环境。三是注意考评结果解释的明朗性。考评结果应以恰当的方式通知被考评者,并对其德育状况进行严谨而科学的分析,既不抹煞成绩,也不掩盖缺点,使

被考评者能全面认识自己,并在考评中受到鼓舞和鞭策。

## (二) 德育考评的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是系统化的、具有相关联系的一系列指标的总和。它完整地反映德育目标的内容和要求,是德育目标规定的德育规格的具体化,体现着德育的质量标准。

对大学德育进行考评,重要的是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它是德育考评的基本依据,直接涉及到德育考评的质量。大学德育考评的实践表明,指标体系的作用,不仅决定着对大学生思想和品德评什么、不评什么,而且也促使学生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不仅有利于引导学生按照培养目标规定的要求约束自己的言行,而且有利于大学生的个性发展,自觉培养健康的人格。

### 1. 建立指标体系的科学依据

大学生德育的考评是以高校培养目标为准绳的价值判断过程。一般说来,高校的培养目标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根本要求,从整体上规定了高校学生的培养规格和人才的质量,是科学考评的唯一标准。但是,以此作为德育考评的直接依据,还显得比较抽象,难以具体和准确地测出学生德育的状况和水平。为了提高考评的科学性,就需要把抽象的培养目标具体化,进行德育分项、分细目地考评。指标就是根据这一需要提出来的。

德育考评的指标反映了整体目标的一个方面,相对德育整体目标而言,指标总是具体的、可测量的。德育指标所规定的内容必须是通过对学生政治、思想和品德的表现,能直接或间接进行观察和测定的。学校的培养目标、德育的整体目标和大学生的实际状况,是确立指标的基本依据。

### 2. 科学指标体系的结构和特点

指标体系对德育结构及其内容的分布,具有特殊的组合方式和层次特点,它可分为整体、项目、细目三个层次,整体由若干项目构成,项目又由多个细目构成,给各细目赋予特定的内容就构成指标体系。指标各分项、细目的内容应有较强的系统性,各分项、细目

之间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统一。

德育考评指标体系的整体结构必须包括政治、思想和品德三个方面,其中政治是核心,思想是本位,品德是基础。

指标体系的项目应分成若干项,每一结构要素进行逐步分解。如政治方面,主要是政治方向、国家意识、党的领导、马列理论,贯穿着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思想方面,主要是学习态度、人生价值、劳动观点、社会实践,体现科学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的内容;品德方面,主要是品德修养、文明行为,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对个体的具体要求。

指标体系的细则还应分解为很多细的项目,每个项目可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表现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政治项目着重是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观点、政治原则、政治品质和政治行为;思想项目主要是人生目的、人生修养、人生态度、人生责任、人生道路;品德项目则是道德品质、道德责任、道德义务和文明行为。

指标体系的结构要素、分类项目和细则是多重分解、逐步深化的,一直到满足可测性的要求为止。但指标体系的分解不是无限的,指标体系的总体设计应优化选择,精练和便于操作,每项指标要求内涵明确,意义清晰,具有针对性。其主要特点是:

(1) 一致性。指标体系要始终与目标保持一致,决不能使指标游离于目标之外。一致性还蕴含着体系内各项具体指标的一致性,不能把两项相矛盾的指标放在同一体系内。

(2) 独立性。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是相互独立的,在同一层次的各项指标之间不能相互重叠,不能表现为因果联系,不能从一项指标推导出另一项指标。

(3) 完备性。指标体系不能遗漏任何一个重要内容,它必须全面地再现和反映德育目标,使德育目标存在于指标的总和之中。

(4) 可测性。它是指把人的意识活动这一不可测的目标化为许多具体的、可测的目标,从而由分项考评到综合考评,完成对考评对象的总体认识和把握,获得明确的结论。

(5) 同质性。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只有在同质的条件下,才便于在结构要素项目、细则中确立度量和权重。指标同质性要求在提出一项指标的同时就应对其规定相应的评价尺度,要求通过等质、等距的标准,比较同一指标体系内不同指标的量 and 质的差异。

(6) 可行性。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必须符合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品德的实际水平,能为广大学生认可和接受,太高太低都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同时,指标的可行性还需要有可靠的信息来源、科学的技术手段及多样简便的操作方法,否则就难以做到科学考评。

(7) 可比性。它是指德育考评的指标体系定出的具体要求、目标和规范,不但应有利于对全体大学生进行比较和竞争,也有利于每个大学生前后对照,自我促进。

(8) 针对性。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根据不同学校学生的特点,有意识地选择指标,加强某些指标的权重,引导学生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影响,适当调整某些指标的权重,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克服某些薄弱环节。

在德育考评实践中,德育工作者还总结了许多掌握和运用德育考评指标的特点和方法,其中不少方法体现了对立的统一。如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结合,可比性与针对性相结合,全面性和少而精相结合等等。这些原则和方法的运用,说明目前大学德育考评的指标体系,在科学化方面又迈进了一步。

### (三) 建立科学的考评标准体系

与考评指标紧密联系的是考评标准。标准是鉴别和衡量事物的原则。在德育考评中,所谓考评标准,就是对考评对象的德育各方面进行价值判断赖以进行的尺度。

考评标准有定性标准与定量标准之分,定性标准的表现形式是文字,它适用于模糊考评法。这种标准在目前仍然是运用得比较广泛的。定量标准的表现形式是分值,它适用于量表计分考评法。实际上定性标准与定量标准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对定性标准的几个等级都分别赋以分值,则定性标准就转化为定量标准。不

过这种转化十分粗糙,要达到科学合理的水平难度很大,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慎重。

考评标准的制定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科学、正确地建立德育考评标准体系,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做到先进性与群众性相结合。考评标准与考评指标一样,对考评对象具有行为导向作用。因此,考评标准的设计必须与德育的总目标相吻合,要有利于培养一代“四有”新人,体现先进性。但这种先进性又必须建立在群众性的基础上,如果要求过高,使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及,失去信心,也就失去了其导向作用。在以往的考评实践中,有的把“大公无私”作为普遍适用的考核要求,脱离了大多数人的实际水准,不便于考核。有的又认为大学生的社会公德水平较低,思想教育中常常是在解决中学阶段就应当解决某些问题,因此确定的标准多是一些“起码”要求,这又难于充分发挥考评的育人功能。可见,科学的考评标准要把先进性与群众性结合起来。

第二,讲究概念统一。指标与标准之间,不同等级的标准之间所使用的概念必须一致。如果在指标中概念使用的是“政治素质”,而标准中的概念则换成“政治态度”,就会使考评者无所适从。概念统一的另一层含义是概念必须明确,不能模棱两可,这就要求在建立考评标准时,措词严谨,逻辑清楚。

第三,各考评等级之间要具有程度和数量上的连续性。考评标准必须层层递进,不能跳跃或跨档。若一个考评标准编制出来后,某级考评者的行为没被包含在任何一级标准内,或者同时与两级标准相当,那么这个标准体系就是失败的。

第四,通俗易懂,讲究策略。考评标准要尽量采用大众化用语,切忌专门术语。语言应简练,要讲语言艺术,对等级标准的描述切忌用语过褒或过贬,避免引起考评者的偏见。

第五,等级划分要适当,不可过细。一般认为,考评等级划分得越细,考评的结果就越精确。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德育考评的模糊

性较大,等级划分过细,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反而显得不准确。目前一般采用四级(很好、好、差、很差)或五级(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划分。五级划分的考评标准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但当考评对象不易区分时,考评者往往选择中间等级。四级划分能克服五级划分的缺点,但考评时要动脑筋,难度较大。当考评对象确实处于中间等级时,考评者难以选择考评等级。

德育考评的原则体系、指标体系、标准体系,都是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的。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德育考评行列,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德育工作者对德育考评的研究和探索不断深入,德育考评的体系一定会更科学、更合理、更完善。

##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第364页。

## 第九章

# 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sup>①</sup>“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sup>②</sup>建设一支专兼结合、功能互补、信念坚定、业务精湛的德育队伍，是落实高校德育任务的关键。建国以来，高校德育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曾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回顾建国以来高校德育队伍建设的历程，并认真加以总结，对于提高我们对这支队伍建设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克服困难，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队伍建设，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 一、建国以来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发展历程

#### （一）建立和探索时期

建国以后，大学德育队伍建设是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大学德育工作，承担着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逐步提高师生的政治觉悟、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加强对学校的政治领导的重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有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队伍。1952年10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地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强调政治辅导处设政治辅导员若干人，在主任领导下，辅导一系或几系学生的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组织推动教职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和社会活动；政治辅导员应从教师和学生中选择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政治品质优良者充任；在政治辅

导员中应选若干人兼任政治理论课助教，以便逐渐培养成为政治课教员。从1953年开始，经高教部和人事部批准，清华大学开始在学校设立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从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较高、有一定工作能力的高年级学生党、团员中选拔，坚持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初步形成了该校独特的“双肩挑”的德育队伍建设的格局。全国其他高等学校也根据文件精神相继建立了政治辅导处，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政治辅导员。这一指示的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高校德育队伍的初步建立。

随着高等学校规模的发展和壮大，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机构的变动，1955年12月，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配备高等学校政治工作干部的指示》，对高校政工干部的编制比例、补充来源及条件等都作了详细规定，这是建国后关于高校德育队伍建设的第一个专门性文件。它指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党在高等学校中的政治工作，才能保证高等学校改革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才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重大任务。”为此“必须为高等学校配备一批质量较好的政工干部，……以增强高等学校的政治工作质量。”《指示》还明确规定了配备政工干部的比例和要求。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又明确规定：“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二年级设政治辅导员或班主任，从专职的党政干部、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其他青年教师中挑选有一定政治工作经验的人担任。同时，要逐步培养和配备一批专职的政治辅导员。”1964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的《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政治工作和建立政治工作机构试点问题的报告》提出，“为了适应高等学校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高等学校应该有步骤、有准备地建立政治部”，“负责领导全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报告》特别对高校德育队伍的建设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指出“不论目前是否进行政治部的试点工作，都要积极地充实和加

强政治工作干部队伍”，“除校、系两级专职政治工作人员外，班级的专职政治工作干部的编制，我们建议平均每一百个学生至少配备一人。所需增加的政治工作干部的来源，除一小部分可以从校内调剂解决外，主要从高等学校毕业生中间选留解决，在今后两三年内配齐”。

从1952年至1966年，我国高校德育队伍建设处于建立和探索时期。全国高校德育队伍建设从无到有，在不断探索中得到了巩固、充实和提高，并逐步走上正规化、制度化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也是我国高校德育队伍建设最好的时期之一。它的主要特色在于：一是除清华大学一直坚持“双肩挑”外，其他高校基本上采用专职德育队伍模式。实践证明，在高校配备一定的专职德育干部，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实际，不仅加强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为高校培养了一批专职政工干部和向校内外输送了一批党政领导骨干。二是专职政治辅导员实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制度，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是对德育队伍的素质要求始终突出了政治素质。在初期对文化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一大批军队转业干部加入到德育队伍行列，这既反映了对德育队伍在政治素质上的高标准、高要求；同时也补充了高校德育干部的不足。这批军队转业干部来到学校后，带来了部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保证学校和学生的政治方向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也应看到，他们对于高等教育的规律和大学德育的特点知之甚少，文化素质相对偏低，不了解学生所学专业，因而与工作对象思想沟通显得困难，有些同志工作方法亦比较简单。这些问题的存在，难免不使德育工作的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随后高校毕业生中党员逐渐增多，便停止了这种做法，而主要在毕业生中选留德才兼备的党团员做德育干部。

## （二）严重破坏时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高校的各级党政

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在学生工作第一线的德育干部更是首当其冲。“四人帮”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组织完全瘫痪。代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和管理高校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均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广大德育工作者也作为“保皇派”、“修正主义的苗子”遭批斗，有的甚至受到摧残。建国十几年来高校党委从无到有精心建立起来的一支德育工作队伍遭到了全面破坏。

“文革”后期，随着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高校又开始恢复配备学生政工干部制度，在青年教师和青年干部中选派政治条件好的到学生年级负责思想政治工作。但是，由于“左”的路线仍占统治地位，“工农兵学员”是带着所谓“上、管、改”的任务来上大学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被颠倒。在这样的条件下，广大德育工作者虽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在学生中开展了一些工作，但也难以摆脱当时“左”的路线的影响，有时甚至不得不违心地在学生中宣传错误路线，工作中困难重重。当时的政工干部一方面有教育学生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是“被改造者”的身份，随时准备接受学生的“批判”。这种尴尬的处境实在令他们难以大胆开展工作。总之，林彪、“四人帮”不仅败坏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声誉，也败坏了德育干部的声誉。

### （三）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高校党组织建设全面走上正轨，政治辅导员制度得到全面恢复，大学德育队伍有了很大发展。虽然工作中也曾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来说，德育队伍建设是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其主要表现在：

#### 1. 提出了加强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主要思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下，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正。首先，中共中央于1979年3月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撤销了1971年由“四人帮”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推翻了“两个估计”，使极“左”思潮在德育队伍建设中得以基本清算。广大德育干部放

下包袱，轻装上阵，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其次，高校各级党组织陆续正式建立，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原有德育干部，或继续留任，或重新安排，并且选留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大学毕业生补充德育工作队伍，增加了新的活力。第三，自1980年起，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教委）、团中央连续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加强德育队伍建设。比如，1980年，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1986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教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1987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1984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1984年至1987年，国家教委相继颁发了关于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兼职人员若干问题的规定》；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在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中聘任教师职务的实施意见》等等。这些文件提出了建设大学德育队伍的主要思路，那就是：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应由专职人员与较多的兼职人员组成；要把好入口关，从政治和业务都好的毕业生中选留或从教师中选任；对政工干部在工作上要提出高要求，在素质上要坚持高标准，在生活上要提高待遇；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是教师队伍的组成部分，应列入教师编制，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有条件的政工干部可以实行“双肩挑”；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政工干部的培养，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教授和理论家。以上这些基本思想，对新时期高校德育队伍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确认“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和学生政工干部是教师队伍的一部分，使大学德育队伍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不过是耍耍嘴皮

子的事，思想政治工作者都是些“万金油”；也有人认为，政工干部是“打杂工”、“消防队”。这些非议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德育工作和德育干部的正确认识。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出了“思维科学”和“思想科学”的概念，并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作了初步的论述和概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需要的理论”。列宁提出政治工作这一概念时，又明确提出了政治和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和艺术的思想，要求布尔什维克研究政治教育学。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就提出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问题，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又提出要学习和研究思想科学和教育学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根据革命导师的这些思想，总结了几十年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经验，在1980年前后明确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和“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这两个概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列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论断。198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思想性、政策性很强的科学。”1987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再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提出，对于政工干部也给以明确的定位。1980年，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第一次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学生政治工作干部，既是党的政治工作队伍的一部分，又是师资队伍的一部分，担任着全面培养学生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对于有专业知识并担任一定教学任务的政工干部，应与专业教师同样评定职称”，“对于不担任教学工作的专职政工干部，可以按本人的条件，评出处级、科级，享受同级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1987年相继颁发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在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专职人员中聘任教师职务的实施意见》和教委职改领导小组的补充通知，对德育工作队伍评定教师职称的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制定了具体条件，各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都建立了专门机构。现在全国各高校的德育干部基本上都有了相应的教师职称，这就初步打破了高校德育干部地位低下和待遇不公的状况。

自从思想政治工作和高校德育工作人员定位以来，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思想政治工作者，也包括钱学森等科学家，发表了一次次讲话，一篇篇论文，出版了一本本专著，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实践中和理论上的发展。中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研究会相继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对大学德育工作的研究和探索，一大批热爱高校德育工作的同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于是，全国和省、市、自治区研究会办起了自己的学术刊物，德育工作人员有了交流、切磋的阵地，开拓了德育工作者的思路，促进了科研成果的推广利用，促进了这支队伍的发展和提高。一批专业理论教材和较高质量的论著不断问世，一批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教授涌现出来，这标志着我国大学德育工作队伍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 3. 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高质量的专职德育人才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的地位的确立和高校学生政工干部是“师资队伍的一部分”的定位，对高校德育工作队伍已不能再满足于通过工作实践来培养了，在高等学校设置相应的专业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的要求便成为历史的必然。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1983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这个文件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筹办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为目标的政治院校。现有的全国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专修班。”并明令由中央宣传部、国家经委会同国家计委、教育部作出实施的规划。根据

这一指示精神，教育部便于1984年4月发出了《教育部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决定在南开大学等12所院校首批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进行试点。“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大专生、本科生和第二学士学位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有条件的还可以培养研究生。”并在当年招生。1988年，又开始在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10所大学招收硕士生，培养“具有适应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新兴专业，国家一直给予大力扶持，强调“特殊专业特殊办”，在招生、考试、师资等方面都制订了倾斜政策，使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短短的10年中迅速发展，教学科研成果累累，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对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到1994年为止，全国共有66所高校设置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其中综合大学21所，师范院校18所，理工科院校27所；办学层次也从1984年的本科和第二学士学位两个层次发展到今天的大专起点本科班、四年制本科班、第二学士学位班、硕士生等四个层次；全国18所高校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26所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已拥有教授119名，副教授282名，讲师322名。他们先后共培养了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549名、第二学士学位生2579名、本科生9506名。这些毕业生已遍布全国各地，成为各行各业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职政工人才。从80年代后期开始，大学德育工作队伍建设已进入专业化的正规培训阶段。

## 二、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德育队伍是加强大学德育工作的组织保证

建国以来，高等学校曾经建立了一支比较坚强的德育工作队伍，对培养上百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专门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事

实表明，德育干部在完成高校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军，是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这支队伍，在党的多年教育和培养下，逐步树立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自觉地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将德育放在首位。他们大多数战斗在第一线，坚守岗位，辛勤工作，任劳任怨，承担了日常学生思想教育的大部分任务，并结合思想教育做了大量的管理工作，有的还担任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在非常时期，他们能分清是非，辨明方向，站稳立场，做好化解矛盾的工作，是保持学校稳定的一支可靠的骨干力量。

这支队伍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中选留的，是政治上的骨干和业务上的尖子，在经过一段时间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锻炼之后，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克服困难的毅力，思维能力、文字能力和表达能力以及组织管理才能也都有较大提高，因而不仅源源不断地为学校各级领导和党政管理部门输送了大量人才，而且还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其中不少人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仅以清华大学为例，建国40年已培养的1600多名学生辅导员中，通过毕业分配或调动到校外工作的共有850人，有相当一批同志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例如，现任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原国家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现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等，均在学校担任过辅导员。

正因为高校德育工作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支队伍的建设，始终得到党和国家及其主管部门的关注，这在我们的工作回顾中已经得到证实。历史上在德育队伍建设中也出现过某些偏差，当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时，就出现过盲目增加德育队伍编制的现象；在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冲击时，就出现了“取消学生辅导员”的呼声。这些都应引以为戒。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大量措施加强这支队伍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

于种种原因，高校德育队伍“数量不足，思想不稳，后继乏人”，思想和业务水平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下大决心，采取坚决措施加快高校德育队伍的建设，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最近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优化队伍结构，建设一支专兼结合、功能互补、信念坚定、业务精湛的德育队伍。”这是建国40多年来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经验总结，也为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以少数专职人员为骨干，大量兼职人员为主体的专兼结合，是建设大学德育队伍的基本思路

坚持以少量专职人员为骨干，兼职人员为主体，专兼结合，精干、高效和有利于工作的原则，是搞好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基本思路。本着专兼结合的基本思路建设高校德育队伍，是建国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全国高校德育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已为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有关德育文件所肯定。1984年11月，《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就明令“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必须实行专职和兼职相结合”。1986年和198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教委分别颁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决定中更是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应由精干的专职人员与较多的兼职人员组成”。在建国初期，当专职德育队伍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但数量很少时，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靠教师、行政干部和学生中的党、团员骨干来做。以后学生年级配齐了辅导员，才主要依靠专职政工干部来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中央和政府有关文件的精神，全国各高等学校在全面恢复和加强专职德育队伍建设的同时，积极动员教师、干部，特别是青年教师兼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许多学校还把担任学生工作做为培养青年教师的重大措施之一，明确规定青年教师必须兼任一定时间的年级辅导员或班主任。为了加

强兼职德育队伍的建设，1986年12月，国家教委还专门颁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兼职人员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从教师、干部和研究生、高年级大学生中选拔兼职学生政治工作人员的条件、待遇和工作要求等具体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从实施情况来看，全国高校发展不够平衡，有做得好的，像清华大学等一些院校，始终如一地坚持专兼结合的基本思路，着力加强两支德育队伍的建设，不仅使大学德育工作得到了加强，而且还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又红又专的教师、干部和品学兼优的学生党团骨干。但是也有些学校对于兼职教师能否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心存疑虑，不敢大胆启用教师和党政管理干部，特别是不敢启用学生骨干兼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或者虽然配备了一定的兼职人员，但由于政策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格，或是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工作往往不够得力，甚至有些名存实亡。这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德育工作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党性、政策性、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工作；高校德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面临的对象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处在成才关键时期的青年大学生，工作任务繁重、层次高、难度大。它需要一批经过专门训练的、用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的、具有较为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并熟悉德育基本规律和学生思想、心理发展特点的专门人才作为骨干，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课题，需要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人员集中较多的精力去探索，去研究，去解答，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高等学校必须着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强、业务精、作风好的专职德育队伍，并且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教授和理论家。他们既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又是德育教师，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是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这支专职队伍人数不宜过多，需要精干，但一定要有。

从高校实际出发，不应该也不可能配备大量的学生德育工作专职人员，而必须从专业课教师和其他党政管理干部中选拔大批优秀人员兼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还可以从优秀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中聘任。他们是学生德育队伍的主体。之所以这样做，这首先是由德育工作的特点决定的。高校德育既有相对独立性，又具有广泛渗透性，是一项系统工程，渗透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仅靠少量政工干部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依靠广大教师、干部和职工，乃至学生骨干。以大量从事业务工作的专业人员和学生干部为主体，有利于将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业务工作中去，结合业务工作来做，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和业务“两张皮”的问题；有利于树立“全员育人”意识，动员广大教师、干部、职工都来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专职德育干部的精干和优化。实践已充分证明，兼职人员作为德育的主体，以其良师益友的形象活跃在学生工作第一线，为德育工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三）坚持“双肩挑”是专职德育工作队伍建设的基本方向

高校专职德育队伍建设要努力坚持并进一步推行“双肩挑”。所谓“双肩挑”，即在思想政治工作岗位上的人员以主要时间、精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兼做一定的业务课教学或科研工作；或在思想政治工作岗位上集中时间和精力工作若干年后，再转换到教学和科研岗位。其中，定向长期从事德育工作的人员可兼做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或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要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人员兼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也称“双肩挑”。“双肩挑”是清华大学坚持40多年的行之有效的德育队伍建设制度，已愈来愈取得更多高校的共识。

1953年清华大学率先建立“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在40多年实践中，形成了“双肩挑”模式。他们的基本做法是：从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较高、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党员中选拔政治辅导员，也有一部分

由青年教师中的党员担任，一方面从事专业学习或教学、科研，一方面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比较全面地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建设，实行定期轮换。从1978年恢复政治辅导员制度后，又从研究生、博士生中挑选。每个政治辅导员一般联系二至三个班，其中一部分兼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和系分团委书记等职务。一个具有1000名左右学生的系，一般除配备一、二名专职的德育干部外，都有十几名“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分担全系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实践证明，这种“双肩挑”的德育队伍模式与专职型德育队伍模式相比有以下好处：一是有利于密切和学生的联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同时有利于将德育工作深入业务领域，培养、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更好地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二是有利于形成一支符合学校特点的又红又专的党政干部队伍和教师队伍。政治辅导员是学校“双肩挑”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大部分系级党政干部、教研室主任、支部书记也“双肩挑”，一边搞党政工作，一边搞业务工作，符合学校教育发展的要求。专业教师实行“双肩挑”，有利于朝着又红又专方向健康成长。该校相当多的党政领导干部和不少骨干教师，都是“双肩挑”的学生辅导员出身的。不少同志在回顾这段经历时，都谈到“数年磨炼，终身受益”。三是德育工作人员“双肩挑”，可以减少学校人员编制上的矛盾，避免专职政工队伍过于庞大。四是有利于德育干部的合理分流。五是有利于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一批高质量的又红又专的干部。

清华大学德育干部“双肩挑”的做法，得到了中央领导和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早在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就希望“党委书记和委员力求担任政治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听取清华大学情况汇报时就肯定：“在学校工作的干部，本身要懂行，最主要的经验是这个。清华过去从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选出人兼职做政治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

这个经验好。”<sup>③</sup>改革开放以来，1984、1986、198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或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的有关高校德育工作的文件中，都明确指示：“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在任职期间，必须以主要精力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也可以根据需要与可能，安排一定的时间从事专业学习和工作，其中许多人可以成为既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又能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学者，即通常说的‘双肩挑’干部。”并认为这种“双肩挑”的做法是培养和造就符合“四化”要求的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也相继改变过去政工人员单纯的专职模式，逐步建立了一支以专职德育工作人员为骨干，以兼职人员为主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一些专职学生德育干部也都兼任一些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或马列主义理论课程。但是，专职德育干部的“双肩挑”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

#### （四）把好“选拔关”是搞好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

大学德育工作者是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是高校德育队伍的骨干力量，又是学校党政干部的后备军，一定要严格加以选拔，而不可降格以求。

如何发现和挑选适合从事高校德育工作的优秀人才呢？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sup>④</sup>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化”标准，就是新时期我们选拔和任用高校德育工作人员的根本标准。1986年，《国家教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对选拔德育干部提出了具体要求，这就是“应选拔那些政治品质好，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较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较强的组织活动能力的人”。我们在选留和输入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专职人员时，一定要坚持高标准，进行严格而科学地考核。考核其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组织、管理能力，以及业务水平。从那些志愿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品学兼优的本科生、研究生中择优选留；也可以从外校、外单位适量

优选工作急需而本校又短缺的某些专业毕业生和在职人员；还可以像清华大学那样，从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选拔品学兼优的党员，一边学习、一边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毕业时择优选留。高等学校要下决心舍得将一些政治、业务素质都好的优秀青年教师选到德育工作队伍中来。

德育干部的选拔无疑应该把政治素质放在第一位，但也要防止轻视业务水平的倾向。历史上在配备学生辅导员时，曾有过降低业务要求的状况，这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近几年，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少高校也出现了难以选留品学兼优的优秀毕业生补充德育队伍的状况，致使高校德育干部整体素质有所下降。这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事实证明，仅有一股政治热情而业务水平偏低的德育工作人员，是难以树立威信和全面履行其职责的。更何况新时期高校的德育工作，无论其深度、广度和难度，都远非过去所比。从建设一支“管理型”和“学者型”相结合的高质量的德育工作队伍出发，从有利于这支队伍的适度分流着想，都应该坚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标准，选留或引进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拔尖的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毕业的学生。天津大学在选留德育干部时，规定在专业上应达到留校教师所应具备的业务水平，这是明智的举措。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逐步发展和提高，要更多地从该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拔。

#### （五）全面提高德育干部的素质是搞好德育队伍建设的关键

思想政治工作要真正说服人，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这里所谓的“人格的力量”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形象和素质问题。德育队伍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高校德育工作的水平和育人质量，也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的历次有关文件中，都反复强调要加强对高校德育干部的培养，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培养措施。这些年来，中央和地方以及各高等学校在培养德育干部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例如，举办各种短期培训班，选派德育工作者出国访问、考察或进

修。尤其是1984年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来，更是使德育干部的培养步入了正规化的道路。这一系列举措，对提高德育队伍的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少高校对德育队伍往往使用多，培养少；抓稳定的多，抓提高的少，对其素质的提高依然是个薄弱环节。当前德育队伍建设最尖锐的矛盾，就是这支队伍的素质和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德育工作的要求。

专职德育干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呢？基于高校德育的性质和任务的要求以及德育工作对象的特点，考虑到德育学科建设的需要，德育干部应该具有较高和较全面的素质。具体地说，在政治素质方面：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思想素质方面：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德育工作，并具有为之奋斗终身的献身精神。品德高尚，思想敏锐，不断进取，勇于创新。在知识素质方面：具有较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熟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知识，又了解其工作对象所从事的专业；还要有较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在能力素质方面：既要具有作为一个教师的教学能力，又要具有一个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管理能力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艺术，还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最后，还应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

大学德育队伍建设应该本着以上要求，按照高学历、高水平的方向来进行。根据一些学校行之有效的经验，应该抓好以下工作：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和高校领导要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德育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克服重使用、轻培养的思想，切实把这项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像抓教师队伍建设那样抓德育工作队伍建设，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建设一支跨世纪的青年德育队伍上。其次，采取脱产和在职的办法，积极支持青年德育干部攻读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研究生或第二学士学位，努力提高现有青年干部的学

历水平。还应有计划地选送一部分骨干出国考察、进修或攻读学位。第三，通过短期脱产培训、日常学习、参加学术活动等途径，不断提高其政治业务水平。第四，坚决实行“双肩挑”，一面做学生思想工作，一面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或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并结合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全面提高政工干部素质。第五，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德育干部到工厂、农村，到生产第一线进行社会调查和实际锻炼，提高思想，增长知识和才干。

（六）合理解解决德育干部的物质待遇问题是搞好德育队伍建设的必要条件

工资、住房、职称等物质待遇问题是影响德育工作队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合理地解决德育干部的物质待遇问题，是搞好德育队伍建设的必要条件。近几年来，党和政府以及高等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努力改善政工干部的物质待遇，如评定教师职称，实行岗位津贴，分配住房给以政策倾斜等等，对于稳定德育工作队伍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力度还不够大，不尽完善。例如，在职称评定中，有些学校是初、中级职称解决好一些，基本上与专业课教师持平；而高级职称的比例则偏少，正高职更是寥寥无几。不少学校则把它作为非教师系列对待，给的指标很少，使德育干部的职称明显低于同期毕业的教师。由于职称上的差别，所以在工资、住房等方面均受到影响。加之他们几乎没有“额外收入”，所以实际收入普遍低于教师。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激励机制，在教师中实行的一系列激励政策，如破格提拔职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出国进修等等，在德育干部中很少实行。其结果是不仅使德育干部的物质待遇低于同期毕业的教师，而且在他们心理上形成较大压力，严重影响这支队伍的稳定和提高。

合理解解决德育干部的物质待遇，首先要正确认识德育工作者的劳动价值。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当提倡奉献精神，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塑造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德育工作干部更是应该大力倡导这种精神。然而当劳动仍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实行按劳

分配时，一个人所获得的物质待遇的多寡就成为对其劳动价值肯定的程度。所以，必须使德育工作干部的物质待遇与其工作的付出相匹配，使他们在心理上得到平衡。其次，要理顺关系，真正把德育工作干部按教师来对待，在职称评定、住房分配、工资待遇、出国考察、留学等问题上都享受教师应该享受的政策。要按照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教委 1993 年联合发出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所指出的，要“重视组织和吸收党务和政工干部出境、出国考察，了解世界，开阔视野。他们的留学、进修，列入教师公派出国计划”，“党务、政工干部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的要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可在总的评聘指标中按比例划出数额，进行评聘”，“党务和政工干部的住房、工资、津贴和其它生活待遇要与同届毕业的教师基本保持相当”。此外，在德育队伍建设中还应引进激励机制，鼓励优秀青年德育工作干部脱颖而出，并享受相应的物质待遇。

### （七）适度分流，保持相对稳定是搞好德育队伍建设的重要原则

德育干部的适度分流，是建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校德育队伍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在 1984 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对此作了充分肯定，并对德育干部如何分流都作了具体规定。文件指出：“担任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要求年纪较轻，因此这支队伍要有计划地更新。学校领导对这些同志在适当时候应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逐个予以定向。他们的发展方向可以是：1. 党政干部；2. 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教师；3. 业务课教师。转为业务课教师时可给予一定时间脱产进修。”1993 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联合发出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又进一步指出：“优秀本科生、研究生毕业留校从事二至四年党务和思想政

治工作后，实行分流，或向党政干部发展，或安排在职攻读学位，或向业务教师发展，着力培养一批熟悉教学、科研业务的青年党政工作骨干。”从全国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文革”前那种学生辅导员难以流动的封闭状态或几乎只能向学校党政干部发展的单向流动局面，出现了流动快和多向分流的势头。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德育干部队伍极不稳定，这支队伍的分流在大多数高校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一是更新周期过短，流动面过大。大学德育队伍常常成为“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大多数留校德育干部工作二、三年就离开了本职岗位，致使年年留干部，年年缺干部。特别是留不住骨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也有不少人回不到这个岗位。二是带有自发性，缺乏计划性。谁分流？何时分流？分流到什么岗位？往往不是根据工作需要和考虑本人条件有计划地安排，而是挽留不住，被迫同意分流。这种分流的盲目性加剧了高校德育队伍的不稳定状况。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也将按照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进行流动，想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或半封闭状态，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仍然应当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加强宏观调控，本着工作需要和个人志愿相结合的原则，正确处理分流和稳定的关系，做好工作，真正做到适度分流，保持德育队伍的相对稳定。

所谓相对稳定，主要指德育队伍规模、在岗年限和人员思想稳定。大体上讲，根据有关文件规定，专职人员和学生的比例以1：120—1：150为宜，任期一般保证4至5年，并通过政策和思想教育，让其愉快服从组织安排，严格要求自己，集中精力，尽职尽责，扎实地做好工作。

所谓适度分流，主要指德育工作干部工作4至5年后，要根据工作需要、个人志愿、工作实绩和组织推荐，可以分流一部分人到不同的岗位，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继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也允许报考各专业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班或帮助安排相关的教学、科研等工作。努力做到各尽其能，各显其长。

保持德育工作干部的相对稳定和适度分流有很多好处：一是有利于新老交替、自我调整，从而使德育队伍实现动态稳定，焕发生机和活力。专职人员工作几年适度输出，新生力量不断输入，在相对稳定的骨干力量带动下，始终保持队伍的朝气蓬勃。二是有利于调动德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培养竞争意识。因为既有稳，又有动，既有保持，又有分流，可以有效地激励政工人员在横向比较和纵向发展趋势上，通过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三是有利于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根据“四化”要求，干部经过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锻炼是十分必要的，不仅使他们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而且增强了组织管理能力。事实上，高校或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中，不少人都有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经历。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探索，高校德育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许多方面仍不适应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德育队伍不稳定。高校德育工作干部队伍不稳不仅表现在人才流失上，更主要表现在人心不稳，隐性流失严重。据某省部分高校的调查表明，愿意长期从事德育工作的只有 24.3%，不愿意从事现职工作的则有 41.1%，态度不明朗（没有考虑）的占 29.9%。可见，多数人只是以一种暂时的服从组织分配的心态在工作，而并未把它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职业，因而多抱有“走着瞧”的临时观念。在日常工作中，只有少数德育工作干部抱定初衷，笃信德育工作的光明前途，积极认真地投入工作。不少人却积极性不够高，用心不够专一，他们或苦闷彷徨，消极等待机会改行；有的甚至对本职工作敷衍塞责，对“考硕”、“考博”和调动十分热衷；或准备“下海”，到外面兼职创收；或得过且过，熬资历、等提拔。这一切都说明大学德育队伍仍然存在人才流失、人心思走、后继乏人的严峻局面。

从大学德育队伍自身的状况来分析，当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思想上的“失落感”。德育干部的“失落感”是改革开放

十几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的转变。由于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思想政治工作从“帅位”转到“服从”的地位，不少人思想上还未能适应这种转变，所以产生了“失落感”。其二是投入与产出的反差。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尽管广大德育干部尽心竭力，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社会评价和德育干部自我评价都不高。对此，有些同志感到不安和痛心。其三是成就上的挫折。在广大德育工作干部中有相当一批人原本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很多留校的德育工作干部毕业时都是优秀毕业生，他们有远大抱负，追求事业与学术上的成功，许多人寄希望于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现实打破了这种期望。

(2) 精神上的“负重感”。德育工作干部一系列物质上的难题逐步转化为精神上的沉重负荷。这些精神上、心理上的压力主要有：事业期望压力、岗位创造性压力、学历压力、职称压力、家庭和经济压力、社会舆论压力等等。这些都给政工干部造成“负重感”。

(3) 实际工作中的“不适应”。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大学德育工作长期处于被动局面，就德育工作本身来讲，其原因是大学德育工作的内容和方式以及德育工作干部的素质“不适应”，不能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来说，一是理论不适应。大学德育工作所需要的理论落后于现实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理论还不成熟，因而在工作中缺乏理论说服的力量。二是内容不适应。大学德育工作习惯于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进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现代素质，对这些问题德育工作者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三是方式方法不适应。在德育工作中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教育管理手段，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法律的、经济的、文化传媒的手段还没有为思想政治工作所广泛采用。四是环境不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使得人们越来越注重经济利益，人们的价值目标多元化，社

会调节手段也多元化，而思想政治工作对此准备不足，常常跟不上形势，用单一目标、单一手段去教育学生，就会遇到困难。五是德育工作干部本身素质不适应。从学历层次上看，目前，各高校的德育工作干部与教师相比，学历都偏低。本科院校德育工作干部多是本科毕业生，还有一定数量的“文革”期间的毕业生；专科院校的多是专科毕业生，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很少。从知识结构上讲，德育工作干部多是本校留校毕业生，且多半未经过专门训练就上岗，更替又相当频繁，所以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比较薄弱，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知识缺乏；知识面也较窄，外语、计算机、社交等基本技能训练欠缺。所以，他们在人才济济的高校缺少优势。

### 三、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发展趋势

从以上总结的建国后高校德育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预示今后德育队伍建设的发展趋势是：

#### （一）从小德育队伍向大德育队伍转变

专家们认为，教育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由全社会承担教育年轻人，而没有专门教育机关的教育模式；第二阶段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学校教育模式；第三阶段则是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融为一体。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sup>⑤</sup>的教育发展方向，正是基于世界教育发展新阶段的出现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提出的。教育的社会化毫无疑问也包括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德育在内，因此，德育的社会化也是势在必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树立一种大德育观，即开放的德育观，因为德育工作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近几年，大量调查数据表明，对学生思想发展构成影响的不仅仅是学校思想教育的主渠道，而且是校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德育工作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有两

层含义：一是学校德育系统工程，这是指校内的德育工作；二是社会德育系统工程，这是指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德育工作。

大德育的建立对德育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树立大德育队伍观，着力进行大德育队伍的建设。从校内来看，就是要建立一支以少量专职政工干部为骨干，以大量兼职政工干部为主体，广大教师、干部、职工和学生骨干共同参与的德育工作队伍。也就是说，除了充分发挥专兼职政工干部的作用之外，还要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以及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教师教书育人的作用。从校外来看，就是要与社会和学生家长密切配合，建立校外德育网，聘请热心青年教育又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离退休老干部、现役军人、企业家、工人、农民等为兼职德育教师。

建立大德育队伍，决不是要取消或削弱专职德育队伍，相反，要更加重视专职德育队伍的建设。这支队伍数量虽然不很多，但是质量要求很高，他们是德育的专家。只有以这支德育专家队伍为骨干，并充分发挥其主导、组织和协调作用，才谈得上大德育队伍的建设。否则，大德育队伍的建设只是一句空话，大德育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二) 从“管理型”向管理者和学者相结合的“复合型”转变

高校德育通常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一部分是日常思想政治工作。长期以来，这两部分工作分别由两种人担任，前者由政治理论课和思想教育课教师担任，属教师编制；后者主要由专职德育干部担任，属干部编制。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但还有大量的组织管理工作。因此，专职德育工作队伍多数是按管理干部的要求来建设的，他们大多属“管理型”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80年前后明确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和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命题。随之而来提出了德育工作队伍建设的新思路。按照这些精神，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高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鼓励学生政工干部兼任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在专职学生政工干部中评聘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等等，着力按专业化、科学化的方向建设德育工作队伍。然而，由于80年代后期高校学潮比较频繁，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大量精力用在稳定高校局势上，学校德育内容不甚稳定。也由于大多数高校学生工作主管部门管理职能日益强化，其管辖的学生政工干部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做学生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还由于一些高校领导认识上的误区以及这支队伍不够稳定，更替频繁。所以，高校德育工作队伍专业化的进程十分缓慢，多数政工干部仍停留在“管理型”状态。

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谈话为标志，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教育和高校的改革也日益深化。新形势对学校德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德育工作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德育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要求更为迫切；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政局的稳定，也为德育的任务和内容的稳定以及德育科学化的进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德育工作的高标准，要求德育干部应该加速专业化、科学化的进程，真正做到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深厚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能胜任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又能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研究工作，尽快实现由“管理型”向管理者与学者相结合的“复合型”转变，使德育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 （三）从“单肩挑”向“双肩挑”转变

如前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高校德育队伍长期分成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政治工作干部两大阵营，实行“单肩挑”。尽管清华大学从50年代起建立学生辅导员制度以来就实行“双肩挑”，并且用铁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80年代以来，在党中央及

国家有关部门的德育工作文件中更是多次肯定这种做法。然而，在多数学校实行起来仍然困难重重，常常发出“清华经验好是好，就是学不到”的叹息。当前，德育工作干部“双肩挑”难以在高校全面推开，究其原因：一是有的学校领导担心德育工作干部“双肩挑”后会“一头沉”，影响工作，因而不敢鼓励干部“双肩挑”；二是有的高校缺乏战略眼光，对德育工作干部长远建设考虑少，对目前使用考虑多；三是有的高校重管理，轻思想教育，德育工作干部大量时间用在学生日常管理上，从事思想教育的时间少，更无精力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四是多数德育工作干部自身素质受限制，难以胜任“双肩挑”。

专职德育干部实行“双肩挑”是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需要，也是稳定和全面提高政工干部素质，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专职德育队伍的根本途径。高校德育工作日益科学化、规范化，要求德育干部不仅具有优秀的政治素质，还必须有精湛的业务水平，掌握了解学生思想变化的特点，熟悉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掌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艺术，不仅善于从事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能够从事思想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因此，要求这支队伍不仅是“管理型”的，而且必须是“学术型”的，做到政工干部学者化。同时，高校德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的进程，也需要一批既具备德育理论，又具备德育工作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来参与和推动。实行“双肩挑”也是稳定德育队伍的根本措施。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加强德育队伍建设，也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稳定这支队伍，但总感到队伍建设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措施和政策只解决了他们的短期利益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的长远发展问题。目前多数政工干部有较高的热情，但在发展前景上却感到有些茫然，因而影响这支队伍的稳定。要从根本上稳定这支队伍，不仅要使这些同志真正感到德育是一门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其发展前途是非常光明的；而且要在具体措施上为他们创造条件，真正达到新时期德育工作者

和德育教师的水平。实行“双肩挑”，还为德育干部的未来开辟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工作路子，有利于这支队伍的分流，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促使这支队伍的稳定。

总之，无论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学者型和管理型相结合的复合型的德育工作队伍出发，在专职德育工作干部中实行“双肩挑”，特别是鼓励他们从事与思想政治工作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德育队伍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在最新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要“积极支持和发展‘双肩挑’制度”。为了在高校全面推广德育工作干部“双肩挑”制度，首先，要提高认识，排除思想障碍。其次，要建立必要的制度，防止“一头沉”的现象发生。最后，要提高德育工作干部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双肩挑”的需要，使实行“双肩挑”的过程，成为全面提高德育工作干部素质的过程。

## 注释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 ③ 引自《双肩挑——清华大学学生辅导员工作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扉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 ⑤ 同④，第35页。

## 第十章

# 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变革

改进和加强大学德育工作，关键在于党的正确领导与科学管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制度。”<sup>①</sup>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高等学校的德育工作，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党对高校德育工作的领导，逐步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和管理体制，把各方面的力量统一起来，形成合力，加强对学生一致性的影响，为提高德育效果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回顾和研究建国以来大学德育工作领导体制的历史变革及其特点，总结对大学德育领导与管理的基本经验，对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德育的领导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德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 一、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建国40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和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领导体制，曾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进行过几次调整和变革。与此相适应，作为高等学校领导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德育领导体制也走过了一条调整与变革的发展之路。

#### （一）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建立

建国初期，政府有计划地接管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并向这些学校选派了一批校长，实行校长负责的领导体制。1950年8月，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大

学及专门学校采取校长负责制”，同时规定，由校长“领导全校（院）教师、学生、员工、工警的政治学习”。经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以后，各高等学校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整顿了教师队伍，师生员工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政治领导，改进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教育部于1952年10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地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指出“亟需进一步在高等学校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应有准备地在校内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根据《指示》精神，高等学校设立的政治工作机构名称为政治辅导处，其任务是：指导全体教职员工的政治理论学习；协助教务处指导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指导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社会活动；掌握教职员工和学生政治思想情况，管理他们的历史、政治材料；主持毕业生的鉴定和分配工作；参加教职员的聘任、升迁、奖惩工作。《指示》同时还规定：“政治辅导处设立主任一人，必要时得设副主任一人，在校长领导下进行工作。”这一《指示》的实施，形成了包括德育工作在内的大学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和领导管理体制，即在校长领导下，由政治辅导处负责实施政治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与当时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是一致的。

随着党的组织在大学内公开化和学校党委的建立，高校党建工作得到加强，一批党员干部走上学校领导岗位，使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作用得到实现，党的政治核心地位得到保证。当时，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体系已基本建立，团的建设也得到加强，学生会组织在全国高校已经普遍建立。鉴于高等学校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等负责干部和主要工作部门多已配备了较强的党员干部，已有条件直接从健全行政和党的工作机构着手，来加强全校的政治思想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4年10月8日发出通知，高等学校“可以考虑撤销政治辅导处”，但“系里的某些必

要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干部仍须保留”，“政治辅导员是深入学生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基本力量，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酌量保留全部或一部，在教务处或系主任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宣部这一《通知》精神的落实，促进了由校长全面负责，以政治理论课为主体，行政部门具体实施，共青团、学生会组织分工配合的高校德育工作机制与体系的建立。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当时学校中党组织和学校行政互相间都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学校德育工作明确由行政负责。学校通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贯彻党的意图，学校行政系统通过执行上级的指示来体现党的领导。因此，党组织仍然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发挥着政治核心作用。

## （二）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演变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的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积极地实现上级党组织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不断地改进本单位的工作。”“八大”以后，我国各条战线基层单位的领导体制都开始发生变化，大学德育的领导体制也开始进入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根据“八大”通过的党章的精神，高等学校党的组织得到进一步健全，特别是1957年整风反右之后，学校的一切工作事实上是由学校党委领导的。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学校领导体制作出了明确规定，即“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从此，党委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正式确立。1961年9月，中央转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进一步对高校领导体制及校长和党委的任务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列为学校党委的主要任务之一。《高教六十条》，对于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加强大

学德育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进入60年代后，党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在党的工作中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教育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过分夸大了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在德育领导管理体制上更加强化党组织的作用。1964年以后，一些学校还根据中共中央批转的《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政治工作和建立政治工作机构试点问题报告》的精神，设立了政治部，行使学校党委的工作机构和学校主管政治工作的行政机构的双重职能，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校长和学校行政对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使大学德育逐步走向“一元化”的领导管理体制。

诚然，党的“八大”以后，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但基本上强调的是党委的领导作用，形成了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和学校行政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的工作格局。由于德育自身鲜明的阶级性，在当时政治运动不断开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突出政治教育在德育中的地位是必然的，用政治工作甚至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德育也就不可避免。在教育实践中，人们在认识上逐渐淡化了“德育”的概念，德育从教育的整体中分离出来，成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同义词。因此，大学德育（当时实际上是单纯的政治工作）的领导与管理任务逐步由校长负责及行政系统为主实施向党委和党务系统转移，形成了党委领导、党委负责、党务系统和党的基层组织负责实施的领导管理体制。

这种领导管理体制的主要优点在于：第一，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要求，突出了德育即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教育的党的领导地位；第二，适应了当时高等学校党委统一领导的工作格局，有利于集中组织教育力量、统一教育内容和提供工作保障；第三，有利于形成一支思想稳定的骨干队伍，信息传递与反馈较快，便于处理各类紧急事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气候。但是，这种领导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削弱

了行政及教学系统的德育责任，导致了德育与业务工作彼此游离的“两张皮”现象。学校党委既是德育工作的领导者，又是实施者，不利于对德育过程的监督调控和效果检验，也不利于树立全员育人意识，不可能调动更多的力量来共同完成德育任务。此外，这种体制还在实际上造成了人们对德育工作认识上的偏差，误导了人们对德育内涵的理解，影响了大学德育科学化的进程。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大学德育工作队伍、机构均遭到严重破坏。1968年8月以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工宣队集大权于一身，取代了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也同样取代了党委领导下的高校德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宣队不可能不犯“左”倾路线的错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高等教育战线在全面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开始整顿教育秩序。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之后，十分重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整顿恢复工作，在他的亲自关怀下，1978年4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再次重申了毛泽东在1957年的一段话，“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要求各级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工作都要建立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这次会议还对1961年制订的《高教六十条》进行了修改并重新颁布，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这一切并未引起各级领导的足够重视。当各高校党委相继建立以后，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但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仍由党委领导和组织实施，重新恢复了“文革”以前党委领导和管理德育工作的体制。

### （三）新时期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新探索

1980年4月29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就新的历史时期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工作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意见》指出：“学校党委要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把它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校系两级都要有一名副书记主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校党委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如学生工作部或青年工作部。要把行政、共青团、学生会、工会、教师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共同做好工作。”根据这一精神，各地高校党委认真抓德育工作，在德育机构、德育队伍建设以及德育具体措施上都出现了不少很好的做法。如从大连工学院（现为大连理工大学）开始，不少高等学校建立了德育教研室，开设思想品德课程；一些高校成立了学生工作部或青年工作部，把学生的日常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共青团和学生会组织积极倡导学生开展以社团活动为主的“第二课堂”和社会考察、勤工俭学等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开辟学生自我教育的新渠道，等等。80年代初期的高校德育工作呈现出崭新的局面，为新时期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4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单位联合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必须以改革的精神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努力研究80年代青年的特点，不断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创造新经验。会议还总结推广了党委领导下，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综合育人的经验，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推进了大学德育领导体制向党委领导下的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方向发展。

1985年3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高等学校领导体制改革也被提到议事日程。根据《决定》中“学校要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的要求，国家教委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在部分高校中进行校长负责制的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了

试点范围。试行校长负责制的学校，本着改革创新的精神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调动行政工作人员做思想政治工作、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经验，但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的状况。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高等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尚不十分适宜。1990年7月，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除个别高校外，校长负责制的试点工作停止进行，高等学校继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国家教委确定少数高校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工作的同时，其他高校则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关于“学校中党组织要从过去那种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上”，着手调整学校党政关系。党委不再直接插手学校的行政工作，但仍然对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直接负责，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种校长管行政、党委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双轨制”格局。这种格局带来的明显问题是，由于党政分工，使德育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象更加突出，德育与行政管理、教学业务工作难以紧密结合，行政管理和教师等教学业务人员基本上不承担德育责任，而德育工作者也难以运用管理手段来保证德育工作。为了克服上述弊端，各高等学校在改进领导体制上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从1985年以来，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变化虽然比较复杂，但就学校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体制的探索情况看，基本上是沿着“党委领导、齐抓共管”的方向进行的。1987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对此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作出明确规定，指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负有领导责任。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会同行政统一协调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方面的力量，做好学生和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决定》强调“校长要对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负责，结合各项业务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推动教职工教书育人、服务育人”。这个时期，在德育领导体制的具体构成上，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基本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德育工作领导体制模式。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党委领导，由党委副书记主管，设立党委学生工作部作为党委主管学生工作的职能部门。学生工作部作为主要的参谋、执行机构，会同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团委、马列主义理论课部（教研室）、思想品德课教研室以及行政有关部门，处理各种不同的具体事务。不少学校还采取学生工作部和学生工作处合一的办法，把学生的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工作统一起来。系党总支作为直接执行机构，由总支副书记组织分团委（团总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具体实施学生的日常思想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这种工作体系继承了党委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又建立了主管学生德育工作的专门机构，系统内部高度统一，反应灵敏，在处理各类紧急突发事件时有很强的反应能力。但也明显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校长和学校行政机构的作用发挥不充分的弊端。学生德育工作过分集中在一个部门也弱化了全员育人意识，学工部同党委宣传部和团委在德育工作中关系如何处理，也没有很好解决。

二是党委领导，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副校长）或副校长（任党委常委或兼任副书记）主管，设立受党委、行政双重领导的学生工作部和学生工作处合一的机构，作为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职能部门。这种工作体系，有利于把思想工作与有关管理工作融为一体，有利于党政密切配合统一指挥，也便于调动行政系统的力量来支持、参与德育工作。但学生工作部（处）集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于一身，如何处理好同党委宣传部和团委的关系问题，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且更加弱化了全员育人意识。

三是校长负责，党政协调的体制。在校长下面设立学生工作委员会或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或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负

责。系一级建立学生工作小组，作为落实机构。德育和学生工作的决策来自党委和学生工作委员会（领导小组），实施则按党政组织机构的职能分头进行。这种模式是在试行校长负责制后相应产生的。停止校长负责制试点后，这种模式大多向第二种模式转变。但这种模式所体现的在统一协调的前提下，党政工团依职行事，构成系统综合效益的指导思想是十分重要的。但由于学生工作委员会（领导小组）不是实体而是一个虚设的松散机构，成员都是兼职，在制度保障不充分、运行不正常的情况下，其目的难以实现。

总的来看，这三种体制模式都有比较明确的决策中心，都体现了加强党政协调、齐抓共管的指导思想。为了体现这一指导思想，各校在具体机构的设置和党政机构的协调方式上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做法，以适应各校不同的情况。但在体制的运行过程中，仍然普遍存在一些不太适应的地方。比如，成立学生工作部（处）这种党政合一的机构，赋予它思想教育、日常管理、招生与毕业分配、学生宿舍管理等教育和管理的职能，体现了党政都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负责的思想，强化了学生工作的集中指挥，便于处理学生中的突发事件，在教育与管理的结合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职责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形成了“什么都管，都难管好”的状况，不利于强化其他部门的德育职责，削弱了学校的德育与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这种从理论上似乎有利于改善党政协调关系的机构模式，实际上不仅增加了学生工作部门与教务管理、后勤服务等方面的矛盾，同时又出现了党群系统内部如何协调的问题。

总之，党的十四大以后，高等学校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在探索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大学德育领导管理体制。第一，在坚持党委领导的前提下，更加明确地树立校长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负责的思想，学校德育工作坚持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党政齐抓共管，尤其注意调动和发挥行政系统的育人积极性。第二，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特别重

视以教学管理为中心环节，通过组织教师教书育人来实施德育任务。第三，注意树立全员育人、环境育人意识，重视调动党、政、工、团及学生会组织的育人积极性，发挥各自在德育中的作用，注意加强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建设，对学生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新的特点，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德育领导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新的趋势。

## 二、大学德育领导体制变革的历史经验

我国现行的大学德育领导体制，是经过建国以来 40 多年的实践探索逐渐建立起来的，虽然存在某些弊端，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回顾建国以来大学德育领导管理体制的变革之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自身的特点与要求。这就是：大学德育领导体制既要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与高校领导体制相适应，又必须有利于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学校德育工作的领导；既要有利于调动学校各职能部门及广大教职员工的育人积极性，组织他们主动参与学校德育工作，又必须能做到统一指挥，互相协调；既要有必要的工作机构和干部队伍，但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又必须贯彻精简与高效的原则，与学校内部结构协调一致，有利于保证大学德育工作的效益。这些特点与要求，既是建国以来大学德育领导体制变革的经验总结，也是今后大学德育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一）大学德育领导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德育工作的领导

我国高等学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担负着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光荣任务。今天在校的大学生将是明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政治思想素质、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修养状况，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关键在人，在于我们培养的人是否坚信社会主义，是否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可

见，致力于培养和提高跨世纪人才的政治素质，是高校德育工作带有根本性的任务。高等学校党委必须始终坚持对学校德育工作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大学德育的正确方向。

回顾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主要原因在于国外反动势力对我实行“和平演变”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但就主观原因来说，也是与当时不少同志，特别是党的主要负责人淡化党的领导、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张分不开的。血的教训告诉我们，高等学校如果淡化党的领导，不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忽视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立场的教育，后果就不堪设想。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在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时期，在高等教育面临许多困难和高校师生思想状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就更应该加强和改善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特别是要加强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

但是，加强党对大学德育工作的领导，必须充分尊重和发挥校长及行政系统在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能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再次出现。“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党中央和各级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学校德育工作，从上到下，从社会到学校都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一切怀疑或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言论都将受到坚决的抵制。这样，为大学德育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学校内部，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部门有较好的声誉和较高的权威，形成了在党委领导下，以党委部门为主，共青团、学生会组织都能发挥较好作用的德育工作体系，大学德育为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大学德育在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有重德轻才的片面性，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包揽行政事务过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发挥行政系统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不够，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因此，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改革，既

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大学德育工作的领导，又要有利于发挥行政系统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

党章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改善学校党委对德育工作的领导就是要在党委统一部署下充分发挥校长及行政系统的作用，建立和完善校长及行政系统为主实施的德育领导体制，把党委从过去包揽具体事务太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研究解决学校德育中的重大问题，切实保证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对学校德育工作的领导。具体来说，学校党委主要应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有关高校德育工作的政策，创造性地确定本校德育工作的奋斗目标、任务与规划，研究决定德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二是通过细致而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努力，保证学校德育任务的完成；三是通过严密而审慎的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把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安排到学校德育工作的岗位上去，并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形成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德育工作队伍；四是通过管理教育好教师、干部、工人以及学生中的党员，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觉做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

## （二）大学德育领导体制改革必须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

大学德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德育的原则、内容、途径与方法，还是德育的领导体制，都必须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符合大学德育的规律。建国以来，高校领导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曾先后实行过“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与此相适应，大学德育领导体制也经过了几次大的变革。建国初期，党的组织还不太强大，学校工作由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德育工作也由校长负责。当时，学校的政治工作机构在校长的领导下工作，政治辅导员也是由校长派出的。党组织则主要开展

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以及领导共青团组织搞好团的建设，通过培养、选拔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同志担任学校各方面的负责工作，保证党在高校的政治核心作用。这种德育领导体制与学校领导体制相一致，学校的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紧密结合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进行，有效地保证了当时党的中心任务在高等学校的贯彻落实。

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先后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对大学德育工作的领导，逐步建立和健全了高校政治工作机构，初步建立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大学德育与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当时，德育直接成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通过各级党的组织“一杆子插到底”，形成了以党组织为轴心的运行管理机制。这种机制适应了当时实际上存在的党委对学校工作统一领导的领导格局，思想政治工作在学校的地位很高。但是，由于党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左”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大学德育与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教育内容，以政治运动为特点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使大学德育逐步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违背了大学德育的规律。虽然这种领导体制适应了当时的学校领导体制，但因其违背了高等教育和德育的规律，仍然造成了行政、业务工作与德育的脱节。这种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工作的格局一旦受到冲击，党委不再直接插手行政工作，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德育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象。这一历史的教训是需要我们予以正视的。

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建设大学德育领导体制，根本问题在于正确认识大学德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于正确协调好党政关系，与现行高校领导体制相适应，切实做到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下，校长对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负责。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是学校育人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校长在对学生的智育和体育负责的同时，也必须对学生的德育负责。大学德育同思想政治工作一样，也具有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它不仅有相对独立性，还有渗透性的特点。大学德育的这种作用和特点决定了它必须与学校教学、科研、后勤等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全体教职工都应做好德育工作。如果仍然把德育仅仅看成是政治教育，甚至理解为政治运动，显然无法正确处理好在德育工作中的党政关系。根据中央的决定，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高等学校仍将主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德育工作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对学生德智体全面负责。校长要在党委的领导下，把德育工作摆到自己的议事日程，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结合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做好德育工作；要把德育工作纳入学校的整体工作中，经常督促检查各个职能部门德育任务的完成情况；要把德育工作的具体要求列入岗位考核指标，作为干部、教师晋升职务、职称的必备条件之一；要加强德育队伍建设，把德育工作队伍建设纳入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并具体组织实施；要负责解决德育的投入问题，保证学校德育实施过程中必要的物质条件。

（三）大学德育领导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克服“两张皮”的弊端，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回顾我国大学德育领导体制 40 多年的探索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高等学校中政治运动不断，学生的德育同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样，都以运动为中心，成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并逐步从学校教育的整体中分离出来。于是，党委领导下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和实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逐步形成，并在 60 年代以后不断得到强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教战线对大学德育领导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和试验，但基本上没能改变党委领导下以党委职能部门为主实施的德育领导体制模式。虽然这样的体制基本上适应了学校德育的实际要求，对

保证大学德育实施过程和效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弊端也是明显存在的。其一，这种体制使人们形成了“德育只是党委的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德育”的错误观念，在教育实践中就出现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相脱离、德育与智育相脱离、教书与育人相脱离的现象，使学校德育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二，这种体制使得党委承担德育工作的具体事务过多，一方面增加了学校有关行政部门的依赖性，削弱了这些部门对学生的行政管理职能和教育作用；另一方面又使得学生工作部门和人员陷入大量的行政事务，降低了应有的德育工作水平。其三，由于党委直接负责德育工作，容易使学校行政领导忽略自身应有的德育功能。在制定学校发展计划，特别是在进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时，不能综合考虑德育工作的需要，自觉对德育负责，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要求因缺乏得力措施普遍难以得到落实。这些弊端的克服有赖于大学德育领导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建立起党委领导、校长负责、行政系统为主实施、群团参与的党政群系统齐抓共管，教职员工全员育人的新型德育领导体制。

学校的行政、教学管理部门，是学校德育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寓德育于管理工作中，是加强学校德育工作，克服德育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的弊端的重要措施。教学、后勤、行政管理部门结合自己的业务对学生进行德育，可以把理想和纪律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and 职业道德教育具体化。教务部门可以结合教学管理，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教育，使他们端正学风，培养进取精神。学校生活服务部门可以结合生活管理，对学生进行纪律教育、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教育，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思想。直接担负学生教育管理职责的学生工作部门，结合招生、入学、毕业等阶段以及奖学金评定、日常学生行为管理等方面，协调教务处等其他职能部门，认真做好学生的日常教育工作，实现学生思想教育与管理有机结合。

为了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德育力量，发挥学校德育工作的整体优势，大学德育领导体制必须做到纵向指挥统一、横向协调一致。大学德育工作是一个多渠道、多层次的有机整体。如何使参与德育活动的各个部门、各级组织和发挥德育作用各类活动形式，能有序地组织在德育过程之中，各尽其责，各展其能，互相补充，形成合力，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既要有纵向统一指挥的能力，又要有把各方力量充分调动起来的横向协调能力。否则，就会出现德育力量分散，甚至迷失方向，重新走上党管思想政治教育，政管业务的老路，难以克服“两张皮”的弊端。

### 三、建立和完善大学德育管理的科学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若干意见》指出：“不管学校实行何种领导体制，各级各类学校的校长都要对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负责；在党委（总支、支部）的统一部署下，学校要建立和完善校长及行政系统为主实施的德育管理体制。要把德育贯穿在教育的全过程，落实在教学管理、后勤服务的各个环节上。”这是对建国以来学校德育领导管理体制建设与改革的经验总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改革确立了正确的目标。

#### （一）大学德育领导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

大学德育领导体制改革，应遵循继承与发展的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利于加强学校德育工作，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新的体制模式与运行机制。新的大学德育领导体制，应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学校德育工作的领导，必须与高校现行的领导体制相适应，有利于德育工作与学校其他工作的渗透与结合，有利于调动学校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全员育人、齐抓共管的局面，具体构想模式如下图：



(1) 学校党委是学生德育工作的领导中心，它负责决策，统一部署，调查研究，组织队伍等领导工作。校长应对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负责，按照党委的部署，组织以行政为主的校内各职能部门负责德育的实施。

(2) 为了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德育力量，更好地落实党委和校长的德育思想与规划，可在校级设立学生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学校党委和校长委派组成的一个专司学生管理和德育的综合性机构，主要职责是贯彻党委和校长的意图，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进行整体协调和调研决策。可由校长任主任，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任副主任，党群系统、行政系统有关部门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部等教学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委员。

(3) 学校可设立学生工作办公室或学生工作处作为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承担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上对校长及委员会负责，下行学生工作的指挥协调权。为保证办事机构的权威性和宏观协调能力，除部分综合性很强的教育及管理职责外，学生工作办公室（学生工作处）应将日常思想教育、学籍管理、学生宿舍管理等职责分散到学校相关的职能部门去，以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及时掌握学生工作的情况，代表学生工作委员会指导、检查、督促面上工作，协调各方面关系上。

(4) 学校机关党政部门按职责分头承担德育工作，面向学生，面向基层。例如，党委宣传部要统筹规划师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规划和主持校园文化建设；党委组织部要抓好学生党支部建设和学生党员教育工作以及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和组织发展工作；教务部门要采取措施促进教书育人活动的开展，同时要通过教学管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人事部门负责配备德育教师（干部）；财务部门负责提供德育经费保障，等等。

(5) 马列主义教研部（室）、思想品德教育教研室，担负着对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法纪观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教育，以及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抓好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注意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6) 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组织要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自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工会要通过做好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共青团要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开展生动活泼、富有教育意义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第二课堂活动，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学生会要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学术、科研、文化、体育活动，在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中发挥作用。

(7) 各院、系成立学生工作组，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实施德育工作。学生工作组由院长（系主任）任组长，由党总支副书记和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任副组长，分团委（团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以及辅导员（年级主任）等人员参加。该组在院、系党政和校学生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全面负责本单位的德育工作。

(8) 年级主任（政治辅导员）、班主任（班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教育课教师等都是学生班级教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是在第一线的专职或兼职德育教师，应在院、系学生工作小组统一组织、指挥、协调下，充分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把德育工作落实到学生班级。

## （二）完善大学德育管理的科学体系

大学德育领导管理体制的基本构想，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和大学德育工作的基本要求而提出的，也是在回顾总结建国 40 多年来我国大学德育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发展、完善。

### 1. 优化大学德育管理决策指令系统

决策指令系统是整个高等学校德育管理体制的灵魂，担负着高校德育工作的决策、计划、部署、指挥的重任。高等学校德育

的决策指令系统由学校党委和校长构成。学校党委担负着德育的领导责任，要根据教育方针的要求和学校的育人规格，根据学生的思想实际，经常性地提出学校德育的任务。校长要根据这些任务要求，组织力量进行科学决策，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要保证德育决策指令的科学化，学校党委要定期研究党的政策、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理论动态和社会思潮，要经常深入学生中间进行调查研究的，以便根据党的要求和社会对青年学生素质的要求以及学生的思想实际提出学校德育的任务与规划，保证学校德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提高学校德育的社会适应性和个体适应性。

要保证决策指令的科学化，校长要根据德育目标和党委确定的任务进行科学决策。在进行决策时，首先要对德育任务进行研究，弄清具体要求。要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学生的思想水平和道德品质状况以及学校德育工作的现实条件，拟定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方案。通过对不同方案进行综合评价，即对它们进行比较、权衡和论证，最后从中选择出最佳方案。

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个人说了算。一般问题的决策，可由主管校长在职能部门提出的方案中进行比较，作出选择。重大问题的决策，则应将决策的依据、过程和可供选择方案的利弊向校长办公会议汇报，由校长办公会议作出最后决策。要充分发挥学生工作委员会在决策中的作用。因为学生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来自学校的各个方面，掌握信息全面，能够从各自的角度对提出的方案进行利弊及可行性分析，有利于作出最优化的选择。这些人员和各自的工作部门担负着一定的德育责任，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可以更加明确自己的任务，增强对所作决策的认同感，有利于决策的实施。

为了保证德育决策指令的有效性，校长要进一步明确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负责的思想，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德育工作的基础建设，保证学校德育决策得到实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加

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建设；采取激励政策，使学校各部门切实承担起自己应负的德育责任；运用校内奖励、教师职务聘任等手段，调动教职员特别是教师育人的积极性，真正做到全员育人；加大对德育的投入，改善德育工作条件，保证德育工作正常运行。

## 2. 强化大学德育的质量管理系统

大学德育质量，包括两个范畴，即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纪律等方面的素质（学生德育质量）和为保证和提高学生德育质量所做工作的水平（德育工作质量）。学生的德育质量取决于德育的工作质量，后者对前者起保证作用。因此，强化大学德育的质量管理，关键在于加强大学德育工作质量管理，不断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水平。

第一，建立大学德育的目标管理系统。大学德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工作质量的保证来自各个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协同配合的整体效应。通过推行目标管理，赋予学校各部门和有关人员以明确的、实事求是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工作目标，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通过目标管理，可以使德育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指标化，从而克服德育工作的盲目性、随意性，改变大学德育的软、虚状况。建立大学德育目标管理系统，首先是要把学校总的德育工作目标分解到学校各个工作机构和有关工作人员的身上，建立一个相互制约的德育工作责任制体系，使学校各部门和全体教职工，特别是有关职能部门和德育专职人员，能自觉地根据各自承担的德育责任，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式实施德育，形成合力，从而实现学校总的德育目标。其次是要建立与目标管理相适应的保证体系，要通过聘任制、奖惩办法和工资分配方式，对德育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有效的调控，保证德育目标的实现。

第二，完善大学德育的制度管理系统，确保大学德育的质量。大学德育管理体系中的各责任单元，都各自承担着一定的德育任

务，要保证德育工作的质量，就必须有相应的工作制度来规范各责任单元的德育行为，既做到各负其责又保证协调一致。这些制度包括党委、行政的议事制度，各单位的岗位责任制，检查督办制度，辅导员、班主任工作条例，“三育人”工作条例等。此外，大学德育制度系统建设还要求不断完善保证学生德育质量的学生管理制度，通过“三好”学生评比制度、奖学金制度、违纪处分制度等一系列组织制度，规范学生在校期间的行为，保证德育过程正常进行，养成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德育目标。

第三，强化大学德育工作系统的层次管理。大学德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保证工作系统的整体优化，提高德育管理系统的工作水平，必须强化层次管理原则。大学德育工作系统由领导层、管理层、执行层构成，各层次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但各自有不同的职能作用和特点。领导层由学校党委和校长组成，其职能是规划和决策，提出德育任务和目标，指导各层次的活动。管理层即学校机关各职能部门，其责任侧重于组织实施学校德育工作的目标和计划，进行经常性的检查、指导、协调、控制等方面的工作。执行层即各院（系）党政工团组织负责人组成的学生工作小组，负责直接处理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使学校提出的任务和目标在本单位得以完成和实现。强化层次管理，就是要求各管理层次按照自己的责任范围独立自主地工作，不断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整体水平。

### 3. 健全大学德育的效果反馈系统

随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品德现状，了解学校德育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是决策、领导中心正确指挥、正确领导的保证。没有足够、准确、及时的反馈信息，就难以保证学校党政领导德育决策的科学性。因此，德育效果反馈系统是大学德育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逐步建立和加强。

作为大学德育的反馈机构，学校可设立由党政直接领导下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室（所），收集和来处理来自学生中的有关信

息，为党政决策提供依据。这是大学德育工作的智囊机构，也是学生工作规律和方法的科研机构。学生思想教育科（研究室）除在德育执行系统内建立信息上报的反馈途径外，还可以设立信息员收集多种反馈信息。近几年来，不少高校的学生工作部门招聘学生工作助理，对于学校及时掌握了解德育和学生工作反馈信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工会、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等群团组织，在大学德育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学校党委要把它们合理地组织起来，领导它们加强各自系统建设，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使有关学校德育的反馈信息能通过这些群团组织反映上来，使这些群团组织成为学校德育效果反馈的重要途径。

要建立大学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学校德育工作的效果应体现在基层工作的绩效上，体现在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变化上。因此，健全大学德育的效果反馈系统，必须不断完善学生的德育考评和院、系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估办法。通过对德育素质的测评和对基层工作的考核评估，更好地了解学生思想、道德、价值观等实际状况，了解学校德育措施在基层的执行落实情况，从而进一步明确学校德育工作的目标与方向，调整或重新制定学校德育的计划与有关政策，实现大学德育的动态管理，不断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管理水平。

##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

主 编 龚海泉

副主编 饶定轲 张耀灿 万美容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 新登字 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 龚海泉主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8

ISBN 7-5622-1716-5

I. 当...

II. 龚...

III. 大学德育—德育教育研究—中国

IV. G410

##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

◎ 龚海泉 主编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

责任编辑:祝翠轩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张 钟

督 印:方汉江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80千字

版次: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22-1716-5/G·823

印数:1-1000

定价:14.80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

罗 国 杰

龚海泉等同志所撰写的《当代大学德育史论》一书,即将出版。这是一项“八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由于我参加了这一课题最后成果的评审和鉴定工作,龚海泉同志希望我能为该书写一个序言,向读者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认为这是一件我应该做的工作,于是欣然接受了他的要求。

加强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对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即将来临的充满竞争的21世纪,人才的竞争,占有特殊的地位,而思想道德教育,对高素质的人才来说,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此,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道德,具有社会主义觉悟,从而保证我们的现代化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应当头脑清醒,有一个正确而明晰的认识。我们之所以重视德育,强调德育的重要,归根到底,都是同这一根本目的相联系的。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虽然只是整个学校德育工作中的一部分,但无论从其重要性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从事这一工作的难度来说,都是尤为值得重视的。因此,对建国以来我们高校德育工作的历史作一番认真的研究,总结其中的一些最基本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改进和加强高校德育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作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反思与评价,是一部以论带史、

史论结合的专著。它不但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德育工作的成绩和失误,而且还力图探索我国新时期德育工作的规律,其中的不少论述,都会从不同方面,对我们今后的德育工作有所启发。我们一面回顾过去的历史,一面思考今天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看到我们德育工作在过去所取得的重要成绩的同时,也认真思考着曾发生过的某些失误,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好地前进。从这一意义上说,由于作者在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本书对我们德育工作的改进,就有着更好的参考价值。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的作者,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科学的理想信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建国以来的德育工作,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全面的回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我们德育工作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确实,对我们建国以来的德育工作,应当全面地加以审视,我们德育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如果不能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就不能前进;同时,也要很好地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在德育工作中的成功经验,使这些成功的经验在新的形势和新的条件下发挥更好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是我们大学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出现,是同我们当前的经济情况相适应的。对我们大学德育工作来说,应该很好地根据这种情况,改进我们的工作;但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仍然是我们德育工作中应当坚持的原则。正因为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因而更应当强调价值导向的一元化。应当看到,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金钱拜物教,把个人的私利当作

是发展经济的杠杆和动力,把追求享乐看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明智之士,也曾不断地提倡要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但生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总是以各种形式,花样翻新地不断滋生发展。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不是两极分化,而是消灭剥削和走向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决不能把个人的私利,当作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杠杆和动力,决不能以追求享乐的高消费来刺激我国经济的发展,更不能把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推广到人和人的一切关系中去,从而出现那种把金钱看作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去崇拜。当前,思想、道德、文化领域所出现的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某些反对集体主义,宣扬个人主义、个人本位的思想,都是同我们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目的不相一致的。在今后的德育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仍然是我们应当强调的。

在大学德育工作中,在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思想过程中,更进一步加强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教育,是一个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道德传统的民族,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们曾产生过忽视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教育的情况,这是今后应当改正的。对于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批判地加以继承,不能无批判地“复古”。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决不是去无保留地宣扬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是要增强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更加具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自“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建国以后,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革命道德方面,有着更加值得我们学习的优良传统。革命道德传统,是对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只有体现在当代革命传统之中,才更显现其所蕴含的

强大的生命力。江泽民同志指出：“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这也是我们大学德育教育中应当遵循的一个原则。”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在叙述历史、总结经验和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中德育教育规律的同时，还提出和分析了一些在当前进行大学德育工作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例如，大学德育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思想发展的具体特点，如何从新时期大学德育的个体适应性出发来改进我们的德育工作，如何进一步研究和改进我们大学生德育测评的手段和方法，如何巩固、发展大学德育的工作队伍，如何改进我们大学的德育课程，……作者所提出和分析的这些问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当代大学德育史论》对这些问题，没有能够一一作出全面的回答，仅仅是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某些还不算太成熟的看法，但它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有帮助的。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是本书的任务，这是有待于今后广大德育工作者作出努力的。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一书，由于它系统、全面和比较准确地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德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的一个空白。我希望这本书的问世，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进和提高我们的德育工作，能够有所裨益。

1996年 2月

# 目 录

总论 建国以来大学德育的发展历程 .....	1
一、奠定基础时期的大学德育 .....	1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大学德育 .....	8
三、严重破坏时期的大学德育 .....	17
四、恢复发展时期的大学德育 .....	23
第一章 大学德育地位的历史演变 .....	33
一、大学德育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 .....	34
二、大学德育地位演变的历史经验 .....	39
三、新形势下大学德育地位的走向 .....	48
第二章 大学德育目标的形成与发展 .....	58
一、建国以来大学德育目标的确立与发展 .....	58
二、确立大学德育目标的基本原则 .....	66
三、大学德育目标的实施 .....	70
四、跨世纪人才培养的德育目标导向 .....	76
第三章 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确立与实施 .....	81
一、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确立及演变 .....	81
二、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实施效果 .....	93
三、大学德育方针、原则的发展趋势 .....	104
第四章 当代大学德育内容透析 .....	109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	109
二、关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	117
三、关于理想与人生观教育 .....	125
四、关于民主与法纪教育 .....	131
五、关于道德教育 .....	137

第五章	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发展轨迹 .....	143
一、	建国以来大学德育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 .....	144
二、	大学德育适应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 .....	153
三、	加强大学德育社会适应性的新思路 .....	157
第六章	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发展轨迹 .....	167
一、	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基本涵义与历史轨迹 .....	167
二、	加强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实践经验 .....	173
三、	探索大学德育个体适应性的新思路 .....	181
第七章	大学德育运作方式的变革 .....	190
一、	校园文化的凸现 :陶冶式教育的新发展.....	190
二、	社会实践活动的兴起 :开放式教育的新发展.....	200
三、	心理咨询的面世 :咨询式教育的新发展.....	209
第八章	大学德育考评科学化的探索 .....	219
一、	大学德育考评的意义和作用 .....	219
二、	大学德育考评的方法与效果 .....	225
三、	逐步建立和完善大学德育考评的科学体系 .....	239
第九章	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	246
一、	建国以来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发展历程 .....	246
二、	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 .....	253
三、	大学德育队伍建设的发展趋势 .....	267
第十章	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变革 .....	272
一、	大学德育领导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	272
二、	大学德育领导体制变革的历史经验 .....	281
三、	建立和完善大学德育管理的科学体系 .....	287
后记	.....	295

## 后 记

《当代大学德育史论》是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建国以来高校德育工作基本经验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该课题是由华中师范大学龚海泉同志负责主持的,从1992年开始组建课题组,开展研究工作,经过四年的努力,在取得大量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后完成此书,并顺利通过专家鉴定,一致认为此项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其成果“填补了德育学科领域的一项空白”。

我们写作此书的整体构思是:坚持把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结合起来,既研究建国以来大学德育的发展历程,又注重分析德育方针、原则、目标、内容和方法等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演变状况,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视角中去总结德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在纵横交错的研究中探讨大学德育的基本规律,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进和加强大学德育工作提供新的借鉴。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采取了以论带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史明论的方法,既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概貌,又从这些史实的研究中进一步丰富了大学德育的基本理论,较好地处理了论与史的关系,从而形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我们非常感谢成果鉴定组的各位专家对本书的全面评审和鉴定。他们是:国家教委党组成员、全国德育学科规划组负责人朱新均同志,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全国德育学科规划组负责人王殿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罗国杰教授,武汉大学王玄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严正教授。他们在百忙之中审阅了书稿,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为本书的最后修改定稿起了重要作用。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全国著名伦理学专家、博士生导师罗国杰教授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放下了手头的许多重要工作,欣然为本书作

序,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共分十章,参加写作的人员(以章次为序)有:龚海泉(总论、第四章),徐志远、刘欣(第一章),刘华蓉(第二章),张耀灿、齐振宏(第三章),万美容、陈正祥(第五章),梅萍(第六章),何献青(第七章),王茂胜(第八章),饶定轲、廖卫鹏(第九章),万美容(第十章)。另外,曾乐堂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并讨论了书稿的原始提纲。李丽华同志还参与写作了部分章节的初稿。在成书过程中,龚海泉同志负责总论、第四、六、七、八章的统稿工作,张耀灿教授负责第一、二、三章的统稿工作,饶定轲教授负责第五、九、十章的统稿工作,最后由龚海泉同志负责全书的统稿定稿工作。

此项成果是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华中师范大学科研处的直接领导下取得的,他们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科研处前处长梁其健同志、副处长石挺同志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支持。当然,本书的出版,还得益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委员会的鼎力相助,在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另外,我们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还借鉴了同类研究的一些优秀成果,谨向有关作者表示感激。在该书出版过程中,得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不胜感激。

该书虽已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肯定,但作为大学德育学科建设仍属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对于史论的研究更显得幼稚,因此,书中的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从事德育研究与实践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6年 1月